

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

卡尔·考茨基著

(供内部参考)

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

卡尔·考茨基著

馬清槐譯

~~~~~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請核对原文，并  
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

出版者說明

《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是考茨基在一九一八年为攻击列宁和列宁主义而写的一本书，一九一九年六月写成发表。这本书实际上是考茨基一九一八年发表的《无产阶级专政》一书的續篇。早在一九一七年，列宁就在《国家与革命》中对考茨基的机会主义論点进行了詳尽的揭露。一九一八年十月，列宁为批判考茨基的《无产阶级专政》，写了《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但是，考茨基完全不理列宁的批評，紧接着又写了这本小册子。写作这本书的目的，据考茨基自己說，是要“討論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对布尔什維克方法的态度”。他采用了《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书名，妄图把它作为“声討”布尔什維克“罪行”的“檄文”，以此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一九一九年九月，当列宁看到考茨基《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出版消息时，立即写了《资产阶级如何利用叛徒》一文（《列宁全集》第三十卷），无情地揭露了考茨基直接为资产阶级效劳的真面目。

全书共八章，前七章是考茨基对法国十八世紀以来历次革命运动中所謂恐怖主义所作的“历史考察”，說什么“正統的馬克思主义”是历来反对恐怖主义的，而布尔什維克正是犯了“殘酷恐怖主义”的罪行，认为“只有一味訴諸暴力的雅各宾的恐怖主义，才和布尔什維克有着某种继承的关系”。

考茨基在这部分历史說教中，甚至不惜歪曲历史，直接曲解馬克思主义經典作家的言論。

在一些章节里，考茨基还打着“历史唯物論”的幌子，发表了一系列的謬論。他“探討”所謂“恐怖主义的淵源”說，在早期社会，农业居民是定居的，所以习尚和平，讲究人道；而畜牧业、商业是流动的，所以牧民和商人慣于掠夺，崇尚殘暴。到了資本主义社会，在资产阶级中也有两种傾向，商业资产阶级傾向殘暴，工业资产阶级則傾向和平。认为在法国大革命以后，所有革命都摒棄了恐怖主义，这表明十九世紀人道主义傾向的发展，但是进入二十世紀，布

尔什維克又違反了这种傾向，这是“历史的倒退”。

如果說在前七章考茨基还作了一些“引經据典”的工作来为自己的謬論辯解，在第八章他已找不出任何論据而只能进行誣蔑和咒罵了。在考茨基的笔下，苏維埃政权被描繪成漆黑一团。

对布尔什維克的攻击，考茨基首先是从“分析”所謂“时代的特点”談起的。他說，“我們看到一个世界正在沉淪于經濟破产和自相殘杀之中”，“无产階級中最缺少修养的分子”，“被放到运动的最前列”，所謂苏維埃，只不过是“純粹独裁和专断統治的基础”。指責布尔什維克迷信暴力，“把單純的权力”看作是“世界上的决定因素”，誣蔑布尔什維克开展的“用赤卫队进攻資本”的运动，即“剝夺剝夺者”的斗争是“彻头彻尾的反馬克思主义”的“暴力論”，說什么布尔什維克“不会考虑实际的局势”，不懂得什么是“社会化”政策。据考茨基說，剝夺資本必須和經濟改組一起进行，而布尔什維克却把两者“一分为二”，“截然分开”。指責布尔什維克放手发动农民、沒收地主土地、征用富农粮食是犯了“走上劫富济貧的俠盜式道路”的錯誤，詆毀領導农民起来斗争是布尔什維克听任群众“自由行动”，說什么已經把“剝夺的过程从对于生产資料的剝夺扩展到对于消費資料的剝夺”，“很容易走上搶劫的道路”。

布尔什維克的肃反政策，也是考茨基攻击的目标。他說，“枪毙——是共产党政府的全部智慧”，“它們具有专断的权力，可以宣告任何被控到它那里去的人的罪名，随意决定枪毙那些不受欢迎的人”。在“‘反革命’这个集合詞下，把各种各样的反对者都包括了进去，不問这是发生在哪一类人中間，产生的动机是什么，用的是什么手段，抱的是什么目的”。

考茨基把布尔什維克实行的“不劳动不得食”的原則，誣蔑成苏維埃政权在面临經濟破产前强行的“强迫劳动”，“实际上是要把現在的資產階級变成一个新的奴隶階級”。

考茨基还搜集了不少“材料”，攻击布尔什維克貪污腐化、蜕化变质；批評布尔什維克虐待知識阶层；斥責布尔什維克“控制报纸”，侵犯“出版自由”，以宗教裁判所的态度，以絕對独裁的形式，强制群众絕對服从；責难布尔什維克敗坏无产階級道德，如此等等。一句話，在考茨基看来，布尔什維克是十恶不赦的罪魁，苏維

埃制度是“革命的黷武主义”，俄国成了“兵营社会主义”。

考茨基由此得出結論說，这“证明俄国在革命爆发的时候，时机并未成熟，不宜立即实行社会主义”，布尔什維克“已經牺牲了自己的原則，表明自己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者”，他們虽然在俄国取得了胜利，但“社会主义則已經遭到了一次失敗”。他喋喋不休地一再誣蔑苏維埃政权是所謂軍事官僚机构，說布尔什維克“一开始就决心要摧毁現成的国家机器，以及它的一切軍事和官僚机构，然而他們在解决了这个問題之后，发现他們自己不得不为了自保而重新建立同样的机构”。这个机构的統治者是“把一切实际的和事实上的控制权都抓在自己手里”的“新官僚階級”。在这个国家里，“資本主义正在复活，但它所采取的形式对于无产階級來說，是比旧的形式更加暴虐和更加有害的”。說什么“現在政府和資本家的官僚体系已經合并成为一个体系。这就是布尔什維克所推行的社会主义大变革的最后結果”。这个政权眼下虽然没有垮台，也只能“苟延殘喘”，因为“像旧的資本主义一样，这个新的‘共产主义’已經自行产生了它自己的‘掘墓人’”。叛徒考茨基就是这样来咒罵无产階級专政的。

考茨基在书的結尾还談到了世界革命的問題，极力抵制布尔什維克在国际无产階級中的影响，离間各国社会主义者的团結，妄图說服他們脱离布尔什維克世界革命的路綫。他把布尔什維克对形形色色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說成是“自相殘杀”，是“兄弟鬩牆”。說“布尔什維克从一开始就是党派紛爭的产物”，“照俄国人看来，世界革命宣傳者的主要任务是在全世界无产階級群众中掀起一場自相殘杀的战争”。考茨基提出他自己的一套世界革命的路綫說：世界革命實現的道路“不会按照独裁的路綫，也不会利用大炮和机枪，也不会通过消灭自己的政治和社会的敌人，而只会通过民主制度和人道主义”。說什么“民主制度是賴以實現較高生活方式的唯一方法，也是社会主义所說的文明人的权利”，民主制度“为西欧和美国的社会主义提供远为美好的远景”，等等。最后考茨基还把矛头指向第三国际的成立，认为第三国际对社会民主党宣揚资产階級民主的批判是极端錯誤的，叫嚷“沒有一种說法比这更为錯誤的了”。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革命与恐怖	3
第二章 巴黎	5
第三章 大革命	12
第四章 第一巴黎公社	18
巴黎无产阶级及其斗争的方法	18
恐怖统治的起源	21
恐怖主义的失败	26
第五章 恐怖统治的传统	35
第六章 第二巴黎公社	43
公社的起源	43
工人代表会议和中央委员会	53
巴黎公社中的雅各宾派	58
国际工人协会和巴黎公社	61
公社的社会主义	70
中央集权和联邦制度	77
公社的恐怖主义思想	84
第七章 文明对于人类风俗习惯的影响	92
残暴与人道	92
两种倾向	97

杀戮和恐怖手段	101
十九世紀行为的倾向仁义	106
战争的影响	112
第八章 共产党人的活动	119
剥夺和组织工作	119
无产阶级的發展	129
独裁	137
贪污腐化	141
布尔什維主义的改变	149
恐怖	156
苏維埃共和国的前途	160
世界革命的前途	166
譯名对照表	175

序 言

这本著作是大約一年以前动手写的，但由于十一月九日的革命而中断了；因为革命給我带来了不屬於純粹理論和历史研究范围的新的任务。过了几个月，我才能够繼續动笔，在偶然間断的情况下把这本书写完。

最近局势的发展并没有增加这部著作的完整性。这一点所以比較难办，是由于随着時間的进展，对于这个論題的研討多少有些改变。我的出发点是討論現代社会主义的中心問題、即社会民主党对布尔什維克的方法抱什么态度。可是，既然布尔什維主义自动提到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认为巴黎公社在某种程度上是它的先驅和雛型，认为巴黎公社已經得到馬克思本人的贊許，同时鉴于現在这一代人还不大認識和了解巴黎公社的真实情况，我就把巴黎公社和苏維埃共和国作了对比。

为了使讀者能对公社有所了解，我不得不論及巴黎公社，以后又論及法国革命及其恐怖时代。这給了我从另一个角度来比較苏維埃共和国的新的方法；因此研討公社之后就必然要进一步研討恐怖主义、它的起源和它的后果。

这样，本书就由两条思想路綫合并而成，但其中的一条又間或离开了另外的一条。起初，我觉得这个办法多少有一点叫人发生混乱，甚至考虑到是否还是把这本书分成两个不同的部分，一部分闡述巴黎公社，另一部分討論恐怖主义。然而，就我的出发点而論，苏維埃共和国同历史上的这两件大事密切相关，在我看来似乎不可能分別加以論述。因此我希望，虽然存在着本书的二重性所固

有的困难，我終於能够保全书中所包含的思想的結構的完整性。

讀者可能认为我的許多例证和解釋是学究式的，但無論如何，它們都有十分重要的实际意义，特别是在目前这种紛扰动乱的时候。这并不是說我仿佛已經使历史上的真情实况适合于当前的需要了。相反地，甚至在我論述一个过去的遙远时期的那些段落里，我也經常力求只討論問題的似乎有助于闡明我們周圍的混乱局面的那一个方面。

只要我們注意一下現今存在于俄国和德国的这种混乱局面，我們当前的形势和我們的前途就一定是很不可乐观了。我們看到一个世界正在沉淪于經濟破产和自相殘杀之中。在这两个国家，我們发现政府下面的社会主义者作出不利于其他社会主义者的行动，其殘酷的程度与半个多世紀以前屠杀巴黎公社成員的凡尔賽劊子手們的暴行没有什么不同，而那种暴行是一向引起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值得称道的憤慨的。

但是，当我們考虑到国际的时候，前途就立刻显得比較光明了。西欧的工人們已經起来。唯有他們才能取得实际的成績，如果他們采取的方法比东方至今所采用的方法来得高尚的話。

因此他們有必要向我們吸取經驗，知道怎样凭成效来認識不同的斗争方法和建設方法。这倒并不是盲目地恭維那些直到現在为止占相当优势的革命方法，而毋宁說是提出必要的、尤其在目前必要的最严格的批評，因为在目前这个时候，革命和各社会主义政党正在經歷一个十分严重的危机，各种不同的方法都想在这危机中力爭上風。

革命的成功将大部分取决于它是否能发现正确的方法来把革命的使命传达給无产阶级。研究各种方法是我們目前最崇高的职责。本书的目的就在于帮助这种研究，从而促进革命的向前发展。

卡尔·考茨基

1919年6月于夏洛騰堡

第一章 革命与恐怖

在世界大战爆发以前，社会民主党最广泛的范围内流行着这样的想法：不仅对于西欧，而且对于德、奥两国来说，掀起革命的时期早已过去了。无论是谁，只要他抱有不同的想法，就被嘲笑为革命的空想家。

现在我们碰到了革命，这次革命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狂暴的姿态，是连平时设想得最出奇的革命空想家都料想不到的。

对于每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来说，废除死刑是一种十分明白的要求。可是，这次革命却已带来了由一些社会主义政府实行的最残忍的恐怖手段。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是始作俑者，因而受到了一切不同意布尔什维克观点的人们的最严厉的谴责。其中就有德国多数派社会党人。但是，在这些社会党人采取了作为东方革命特征的由恐怖统治实施的同样的手段以前，他们并不感到自己的权力遭受威胁。诺斯克已经冒失地仿效托洛茨基的榜样；当然其间还有这点不同，即他本人并不认为他的专政是无产阶级的专政。但是这两个人都以革命的权利为理由来为他们的屠杀作辩解。

事实上，认为恐怖手段是革命的一种要素，以及谁要革命谁就应当设法向恐怖手段作某种让步等想法，是流传很广的。作为这一说法的证据，人们一再援引法国大革命的例子。它被看作是最出色的革命。

要探讨恐怖主义及其种种情况与后果，最好是从叙述无套裤党所建立的恐怖统治入手。我们将从这方面开始。这会把我们带回到离当代事件相当遥远的时代，但我们在考察过去以后就会更

清楚地理解当前的事件。发现在法国大革命和当代的那些革命、特别是俄国革命之间有多少相似之处，肯定是会引起人们的注意的。

然而当代的那些革命在许多基本的方面与十八世纪的革命有所不同。如果把我们的无产阶级、我们的工商业同那个时期相应的现象比较一下，这一点就立刻可以看出来。

第二章 巴黎

目前的德国革命沒有中心，而法国大革命却受巴黎方面的控制。如果不考虑巴黎对整个法国在經濟和政治上所占的重要地位，那次革命以及在革命中間发生影响的恐怖統治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在十八世紀甚或十九世紀，沒有一个城市行使过像巴黎在那个时期所行使的权力。这是作为中央政府的王室所在地在一个近代官僚政治中央集权国家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結果，只要近代工业資本主义和运输工具的发展随着带来的經濟上的地方分权还没有开始，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在一个封建国家中，它的中央机关和它的君主的权力实际上是很有限的。它的职权范围并不很大，其相应的一般政府机构也是如此。这个机构可以很容易地从一个城市或所在地迁移到另一个城市或所在地。只要运输系統还处在不发达的状态，只要个别的地区不足以供养君主和他的家臣，君主就往往格外不得不采用这个办法。所以，他有更迫切的动机要亲自巡視他的領土的各个地区，因为这是他可以指望借此維持他們的忠誠和服从的唯一手段。因此在那初期，君主的主要工作是像一个游牧民那样从一处走到另一处，逐一地寻找水草丰盛的牧场，在耗尽了它的可用的东西以后立即舍之而去。

可是，随着時間的推移，特别是由于生产发展的結果，政府机构有了扩展，而生产的发展就使货币制度成为可能，并可强制臣民以容易运带的硬币而不是以笨重的自然产物向君主納貢。随着納貢义务的增加，君主的权力也有所扩大，以官僚政治和常备軍的形

式出現的政府机构也是如此。这样，向各地流动的情况就成为不可能了。君主和政府必須設在某一个固定的地方。从前单独的大城市既然位居王国的中心并比外省的較小的城市为富，就成了商业輻輳之所。它們就終於成为君主选作駐在地点的首府，后来其中又有一个特殊的城市被选为政府和君主的永久駐在地。这里立刻便聚集起一切与政府有关的人們，全国的稅收都送到这个地方来，其中只有一部分会流回到外地去。为宮廷和政府服务的商人都在这里成家立业，还有那些以銀行家的身分来同国家做交易的金融業者。

与此同时，君主的权力超过了貴族的权力，后者的独立性立刻被摧毀了。大貴族願意安居在远离国王駐所的自己的庄园里，对于他們的行动君主是不能忍受的。他們應該在君主的亲自監督之下呆在宮廷里，專門为君主服务，而这种服务是毫无益处和好处的真正的服务。君主剝夺了他們的管理公共事务的独立的职能，把它們交給他所任命的并給与薪給的官僚与官吏。朝臣逐漸变成了懶汉，他們一生的唯一义务就是呆在宮廷里，乱花从自己的产业上得来的收入。因此，当年他們在自己的城堡和城寨里同家臣們一起消費的东西，立即流进了宮廷所在的城市并增加了它的財富。在那城市里，他們在国王的王宮的旁边建造了新的邸宅；他們既然被剝夺了一切正經的职务，就花天酒地地揮霍他們的財產。同他們一起嶄露头角的資本主义的“暴发戶”竭力模仿他們的行动。

因此，与乡間各地和“外省城市”大有不同的王室所在地就不仅成为全国財富的中心，而且也成为追欢寻乐的生活的中心。这对乡間的一些人而事实上是許多局外人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因为他們不是有錢过享乐的生活，便是具有帮助寻欢作乐的人获得欢乐从而可以騙取他們的錢財的意願和本領。

可是，比較严肃的人也被吸引到宮廷所在的城市里来。住在偏远庄园里的貴族除吃喝、打猎和同邻近的姑娘作乐以外，沒有其他的消遣，城市却开始采用了比較精美的生活方式和娱乐。貴族开始表现出对艺术的兴趣，贊助科学的精神立刻成为“一时風

尚”。因而艺术家和学者不久便聚集到宫廷所在地来，他们希望在那里更快地获得进步。宫廷所在的城市里中产阶级的人数越是增多，艺术家和作家就越来越多地聚集到那里，希望紧靠着贵族找到一个立足点和一个销售作品的市场。由此显然可以看出，许多实业家和商人是为了满足所有这些人的要求和需要而被吸引到那个地方去的。没有什么地方比宫廷所在的城市更能提供发迹的机会了。凡是有才智、自信和精力的人都聚集到那里去。

然而并非每一个人都能达到他的目的。有很多失败的事例，那些失败的人形成了首府的另一特征。他们就是那些力求在首府改善自己地位的成群的流氓无产阶级，因为只有在那里他们才能很好地躲藏起来，等待他们可以立即加以利用的运气的转变。他们是像里科·德·拉·马尔蒂尼埃这样的人。不但是艺术和科学，而且还有放纵的追欢寻乐，连同最辛酸的贫困和屡见不鲜的罪行，成为皇家首府的另一个特色。

与特殊的社会地位相应的，是一种使居民精神活跃起来的特殊的心理状态。但是，在每一个宫廷所在地，情况并不完全一样。数量往往让位于质量。

在一个小国里，或者在一个经济上落后的社会里，宫廷所在的城市很小，上述的特征有许多是不存在的。在这种城市里，最显著的特征是居民的依存于宫廷，并且这种依存性不仅是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而且还是精神上的。朝臣的心理状态变得更加粗暴、更加鄙俗和更加天真，并在从首都获得启发的外省居民中间反映出来。

这是日耳曼民族具有浓厚的君主和奴隶色彩的心理状态以及与之俱来的“地方观念”的根源。这是在资产阶级民主兴起时使其先驱居于最显著地位的心理状态。它使得不顾一切的波纳宣布：“其他的民族都是奴僕。日耳曼人是受人服侍的”——这样一种思想由海涅更睥睨不可一世地表达了出来：“德意志这一虔诚儿童的养育所，并不是罗马杀人犯的巢窟。”

但是，在一个宫廷所在的大城市里，心理状态和精神状态是不

一样的。城市愈大，被吸引到宫廷去的人们同那些力求在城里发迹的其余的居民比起来，其人数和势力愈小。希望破灭的和不满意的人愈多，他们就愈加团结一致，并且他们的力量也愈大。这种局面并不单单鼓励了那些人；它也激起了这样一些人的反对，这些人虽然就个人来说并没有不满的理由，却清楚地认识到国家和社会所遭受的损害。这种反对到处都很流行。在较小的城市里它处于潜伏状态，在较大的城市里它就敢表现出来。

在十七和十八世纪大陆上的宫廷所在地中间，最大的是巴黎，它是欧洲当时最重要的国家的首都，在十八世纪末约有居民六十万。魏马是德意志的宫廷所在地和精神中心，约有居民一万人。

巴黎的居民很早就表现了他们的反抗精神。因此就发生了一六四八年的福隆台党的叛乱，这次叛乱是政府和作为最高法院的巴黎议会之间的冲突引起的。当时筑了许多街垒；直到最后国王不得不逃离巴黎。这是一六四九年的事，在这同一年，英国的查理一世走上了断头台。斗争一直持续到一六五二年，这一年君主政治不得不达成某种协议，但这种协议不久便导致专制制度的复活。首都居民已在斗争中同高等贵族团结起来，这就形成了一个不平等的联合。高等贵族在反对君主政治的斗争中任何行动都无法获得胜利。巴黎所具有的反对路易的力量，与伦敦所具有的反对查理的力量不同。

当路易十四还是青年的时候，福隆台党的斗争就发生了。巴黎市民的起义和他的逃亡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不再经受同样的屈辱，他在巴黎城外建立了王宫。当然，他不得不抛下政府机构；但他选择一个离开巴黎极近的地点作为他的宫廷的固定所在地，以保证同他的王宫有一种经常而迅速的联系，然而又有相当的距离，不致受任何街头骚乱的侵扰。一六七二年，要使他或者毋宁说是他的人民花费百万法郎的新宫在离巴黎十二哩的凡尔赛开始兴建。在未来的几百年中，它屡次证明它是不顾巴黎的反抗者而被建造起来的。

虽然巴黎往往坚决起来反对国家的中央权力，它对那个权力的态度却并不总是带有统一行动的特征。另一方面，它努力争取独立和脱离国家权力的支配，但是它的财富与权力却取决于帝国的幅员和帝国国家权力的实力。它努力争取它那社会的自治权利，但它从国家的中央集权获得更大的好处，因而它本身为了自己的生存是赞成中央集权的。

由于巴黎对帝国的其他一切部分占据突出的地位，它在十八世纪的期间才能把法国各个征服的省份在全国紧密一致的气氛下团结起来。如果不是这样，怎能使亚尔萨斯人同布列塔尼人或法兰德斯人同加斯科尼人团结起来呢？但是他们都和巴黎有关系。他们的最优秀的儿子都在巴黎，在那里合并成为一个单一的和统一的民族。巴黎一方面是国家中央集权的最坚强的拥护者，同时另一方面又是它的最激烈的反对者，这一事实所引起的矛盾心理在巴黎对外省的态度上反映了出来。在巴黎，帝国正在遭受其打击的弊害很快地被揭露了。巴黎比其他任何城市更有勇气来揭露和谴责它们。它很快就获得了向它们进攻的力量。因此它成为苦难中的全部法国的领袖。外省的人民由于散居各处，在知识上是落后的，并且精神颓丧、软弱无力。他们把巴黎看作是自己的先驱、自己的救星，往往十分热情地仿效巴黎所作出的榜样。

但并非始终如此。因为，巴黎这个城市不仅由于它的居民的劳动，而且由于对外省的剥削，已经变得很强大了；那种剥削的结果是使外省制造的货物绝大部分流进了巴黎，其中一部分被浪费掉，一部分被用来积累资本，并使国内的剥削者与投机商人得以发财致富和巩固他们的地位。因此，除信赖进步的巴黎以外，还产生了把巴黎看作一个剥削的都市的那种真正的仇恨，从而出现了首都和外省的对立。根据历史的事实来看，有时是一方、有时是另一方占了上风。

由于社会环境不同而产生的不同观点的结果，经济上的对立变得格外显著。在广大的乡村和外省，经济显然处于停滞状态。

因此就产生了因襲保守和墨守傳統道德观念的風气。而且，誰要是不願接受这些观念，誰就得把这种真实的情况掩盖起来；因为在乡村和小城市的狹隘的範圍內，人人都受到全社会的監督。

这种監督在一个很大的城市里是完全沒有的。那里誰都可以放大胆子，嘲笑过时的傳統。这些傳統不但受到下面而且也受到上面的攻击；那就是說，既受到下层階級的群众又受到寻欢作乐的傲慢貴族和資本家的攻击；前者由于生活貧困和变化无常，既然不再看重家庭生活，也就不願为私有財產的种种考虑而有所畏縮。在这两部分人的中間，还存在着大批的知識分子和帮閑，他們往往像乞丐无产階級一样地貧苦不堪，虽然他們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城市貴族和大金融家所享受的舒适生活。

所以，难怪謹慎的中产階級和农民要对这个塞納河畔乱糟糟的社会的极端不道德行徑感到毛骨悚然了，因为油嘴滑舌的巴黎人总想嘲笑乡下人的乏味的实利主义和狹隘的偏見。

在宗教問題上，也像在道德問題上一样出現了反对的意見。对于与世隔絕的农民來說，牧师是为他們操心的唯一有教养的人，因为他在他們和外界之間建立了某种联系，并向他們提供了一些超出教堂尖塔範圍以外的知識。这种知識早已赶不上科学的迅速发展这一事实，并不能够在乡間沒有受过教育的农民的心理上产生什么印象。他們依恋着教会和教团，虽然他們只是尊崇这些团体的精神財富。他們不願为自己获得教会的物质財產。

另一方面，对于巴黎人來說，教会的財產沒有教会的影响和它的宗教观来得重要。

如果說中世紀的教会是获取知識和保卫知識的手段，那么文艺复兴以来民間的和世俗的知識就早已超过了教会所提供的知識。在城市的人民看来，教会不但不再是扩大知識反而倒成为阻碍知識的手段。由于牧师們企图与世俗教育論者列于同等地位（他們对后者的优越性日益有所体会），并企图采用国家的鎮压和强制措施以实行自卫，反对的呼声变得更加强烈。世俗教育論者用他

們最犀利的知識武器、極端的蔑視以及最徹底的科學研究方法實行報復。他們用更大的熱情和興趣指揮對教會的戰鬥，因為通過這些方法和根據當時一般的條件，如果他們在熱情奮發時能夠謹慎從事，他們是有希望把占統治地位的貴族和官僚爭取過來，或至少有把握使他們嚴守中立的。這是因為貴族和官僚不僅輕視傳統宗教的教義，他們還覺得天主教會動輒妨礙他們的行動，因為它不願無條件地與具有等級的國家機器結成同盟。這樣，反對教會的鬥爭就不像反對專制制度那樣危險；因此國內的日益高漲的反對力量首先努力解決與教會有關的問題。

但是甚至在這一點上我們也看出有某種分歧。統治集團每逢教會想要成為一個獨立組織時就起來反對，但在他們看來，教會還不失為使下層階級唯命是聽的必不可少的工具。這種分歧甚至在過激的知識分子的圈子裡也很顯著。伏爾泰創造了“打倒不光彩的〔教會〕”這句名言，但他看出有必要為了人民而把宗教保存下來。

在巴黎的下層市民和他們的領袖中間，也出現了同樣的分裂。當然，他們都反對教會並希望和它不發生關係。可是，無產階級總想得出冷酷的結論和採取激烈的解決辦法，於是下層市民中有些人便根據無產階級的階級立場，鼓吹並宣傳最徹底的無神論和唯物主義。還有其他一些人則厭惡這種思想傾向，因為這是貴族和資本主義剝削者所採取的綱領，尤其在革命時期。信教的社會主義者和無神論的社會主義者之間的对立在法國一直維持到十九世紀。甚至路易·勃朗在其《法國革命史》一書中都把自己放在盧梭和羅伯斯比爾的一邊，因為後者在反對無神論者狄德羅和阿納爾夏西斯·克洛茨的時候，堅持他們對於上帝的信仰：“他們知道，無神論推崇人們中間的混亂，因為它預先假定了天堂的無政府狀態。”路易·勃朗忽視了這一事實，即：在無神論者看來，天堂也像上帝本身那樣是不存在的。像直接的階級對立所發生的情況一樣，所有這些爭論和矛盾必然會通過像大革命這樣一種翻天覆地的劇變而引起最激烈的衝突的。

第三章·大革命

路易十四由于恐惧，已从巴黎逃到他选作王宫所在地的凡尔赛，这同一位路易终于能够粉碎贵族们获得独立的企图。他同时有很强大的力量，足以在对邻国的斗争中扩大他的王国，使它成为欧洲最大最强的国家。但他是经过了一系列的艰苦斗争才达到这个目的的，这些斗争使法国民穷财尽，濒于破产。

他的最后一次战争是从一七〇一年起直到一七一四年结束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这次战争以法国的失利告终，如果当时已经有了一个强大的革命阶级，战争本身就足以引起一次革命。人们对于这位君主的强烈的反对情绪是普遍的。这可以从他在一七一五年逝世的情形看出来。

“他的葬礼是以尽量简单的形式办理的，以便‘节省时间和金钱’。这时自己相信已经摆脱了不可容忍的束缚的巴黎市民，当这位伟大的国王的柩车从街上经过时跟在后面，不仅高声愤怒地诅咒和唾骂，而且确实扔了烂泥和石头。乡间到处发出了快乐的呼声，夹杂着对死者的诅咒。各处都举行了感谢祈祷。能从这种暴君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鸿运，公开地和毫不羞愧地流露出来。和平、行动自由和减税，是人民希望从摄政者取得的利益。”^①

法国的人民注定要受“储君”的追随者的许多苦难，才能通过大革命把他们自己的命运掌握在他们自己的手里。

国家刚刚开始获得某种程度的恢复，就陷入了几场新的战争。

^① 菲利普逊：《路易十四时代》，第 518 页。

一七三三至一七三五年，它为了波兰和洛林同奥地利作战；一七四〇至一七四八年，它参加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站在普鲁士的一边反对玛丽亚·台里萨和英国；一七七八至一七八三年，他们能够通过大革命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这些战争不仅破坏了这个国家；它们还指挥失当，以致没有给法国人带来任何军事上的光荣。”（罗斯巴赫语）。

专制主义依靠新兴中产阶级的帮助，已经推翻了封建贵族阶层，但其目的不是要想把它废除，而是要对它行使无限的权力。君主觉得他是不能没有贵族的。他挑选那些仍然对他效忠的贵族成员担任国家行政和军队的领导人；但他同时剥夺了这些贵族的一切独立性。他降低他们的地位，直到他们过一种寄生的享乐生活为止，从而使他们在道德上和精神上腐化堕落，引导他们走上经济破产的道路。

贵族的道德上、精神和经济上的破产愈是明显，这些贵族对农民的要求就愈多，农民所受的压迫和屈辱就愈加厉害，他们的农业在经济不稳定的局面下也就遭到更大的损失。同时，贵族把不幸的农民看作主要的纳税人，对他们的要求大大地增加了。这是因为，那些贵族虽然通过他们的外交和军事的冒险已使国家遭到破产，却并不就此心满意足，还想用掠夺的办法来弥补自己的经济衰落。在这方面，他们有教会和君主作为靠山，因为这些势力就是全国的大地主。

以巴黎的这些不可救药的情况为背景，可以发现一个迅速兴起的拥有大批知识分子的强大中产阶级，这些知识分子很快就感觉到对国家和社会秩序颇有影响的种种弊害，比欧洲其他大城市的任何一类知识分子格外严厉地指摘它们和格外不留余地地斥责它们。在它们的下面，是欧洲势力最为雄厚和怀有最大自信的小资产阶级，以及人数最多、最为集中、最无顾虑和最坚决的无产阶级。

当这些对立的势力开始互相谴责的时候，一场可怕的冲突就立刻变成不可避免的了。到了最后，君主政治已经束手无策，同时

由于金融家不再貸出款項，財政的破产已迫在眉睫，于是冲突爆发了。

封建的市議會体现出是貴族、牧师和普通公民的常任代表，它們从一六一四年起就一直沒有召开过，这时它們被請求来帮助政府，批准新的捐稅和公債，因而也就是协助提高破产的专制政治的信用，給它注入新的活力。个别市議会的选举是在一七八九年宣布的，当选的議員被召集到凡尔賽的王宮里去。

然而，除朝臣以外，所有的階級都痛恨当时的制度。这些市議会在 一七八九年五月五日召开會議以后，着手改革捐稅和公債，而不是制定新的捐稅和公債。可是对于这个问题，貴族与牧师的看法多少有些和中产階級不同。这些人通过他們对于这些市議会的敌对态度而取得了胜利。一般的市議会被緝成一个拥有宪法制定权的国民議會，它給了法国一个嶄新的宪法。

国民議会的权力最初只是一种精神上的权力。它所信賴的，是全国絕大多数人都对它拥护这一自觉。但这并不能使它避免实权集团的政变。君主政治仍然控制着像軍队这样的力量，并且具有充分的准备在必要时加以利用。

但他們必須記牢仍旧由巴黎所掌握的实力。只有在把巴黎制服之后，他們才敢希望解散国民議會，使它屈服于君主政治的意志。因此，許多軍队在巴黎調集起来；当他們认为一切都万无一失的时候，他們接着就发动了政变，罢免了国民議會曾經企图强迫国王接受的大臣涅克尔（一七八九年七月十二日）。

不論巴黎是否十分鎮靜地对待这个事件，还是它同軍队发生了冲突，革命的命运已經决定了。巴黎起义了；国王的軍队敗北了；无产階級和小資产階級群众冲进了“殘廢軍人院”，夺取了大約三万件武器，襲击了在革命的近郊地区前面的要塞、即巴士底監獄（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

可是这时国王和他的朝臣联合了起来，农民在全国範圍內到处揭竿而起。以前已經有过純粹农民起义的事例，那是很容易地

就被镇压下去的。但这时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住这场刮起的风暴了。巴黎当时拯救了革命，使它成为普遍的运动。

风暴看来好像逐渐在减弱了。国王和他的封建朝臣恢复了勇气；他开始反对国民议会的某些决议并召集新的军队。因此巴黎人得出结论，只要国家的首脑、即国王和国民议会仍旧留在凡尔赛，他们就永远得不到安全。他们希望把国王和国民议会置于他们的监督和直接影响之下。一七八九年十月五日，人们成群结队步行到凡尔赛，把国王带回巴黎。人民这时希望享受和平生活，能够把他们的精力用来建立宪法，从事那种由于情况改善可以从中获得利益和好处的实际工作。一七九〇年七月十四日，路易十六宣誓忠于宪法，虽然这是完全违反他的本意的。他觉得自己是杜伊勒里王宫中的一名囚犯，他的政府的一切行动都引起他的反感。

在他宣誓忠于宪法之后未滿一年，他就秘密逃走（一七九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并且在他尚未抵达安全地点之前竟十分错误地向人民群众表明自己的态度。他留下了一个文件，声明他在一七八九年十月以后所发布的敕令和公告，都是违反他的本意强逼他发布的，因此他宣告无效。这是他的一个十分冒失的行动；因为他在潜逃的过程中被人认了出来，变成俘虏，并且被解回巴黎。

甚至在那个时候，大部分的情绪激昂的群众就要求废黜国王；但人民群众的君主制的本能根深柢固，无法使这样的步骤获得成功。这一点救了路易，因为当时他所耽心的就是废黜。

当法国在他的君主制度的统治下卷入与欧洲的同盟君主国家进行的战争时（一七九二年四月），他的命运更糟了。这不是像以前那样为了夺取若干土地而进行的战争。这是封建贵族和欧洲的专制君王为反对一个已经获得自由、这时有再度遭受奴役的危险的民族而进行的战争。这是一场真正的内战，具有一切作为内战的特色而连带发生的残暴行为。国家的敌人使革命的人民面临着彻底毁灭的危险，他们自己的国王却是国家敌人的同盟者。

在这种情况下，君主制的观念丧失了它的全部力量；可是国民

議會还不能断然地把它拋棄掉。这时又是巴黎人坚持要把路易囚禁起来和召集新的国民議會，他們召开了国民公会，責成該会为法国制定新的民主宪法（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在第一次会期，这个新的国民公会一致決議廢除君主制（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一日）。但巴黎人相信，只要路易十六仍旧健在，共和国的安全就得不到保证。他們要求按叛国罪对他进行审判。国民公会的多数成員不敢采取这个措施。可是，当巴黎人听說在杜伊勒里宫发现了一只存放若干文件的秘密碗櫥时，他們怒不可遏。这些文件证明：国王已經收买了許多頗有口才的議員，其中就有米拉波；他的卫队中有好些人参加过奥地利的軍隊对法作战，甚至在那次战争期間就領取他的津貼。

虽然有这些事实，国民公会的一部分成員还竭力想拯救国王。他們打算求助于法国人民。路易的命运应当通过一次大选来决定。

这种挑撥外省来反对巴黎的企图，遭到了巴黎人方面最坚决的反对。国民公会懾于对巴黎人的畏惧，向人民求助的提案以四二二票对二七六票被否决掉。这样，路易的命运被决定了，他在一七九三年一月二十一日走上了断头台。

当时竭力替国王說情的共和党就是所謂吉倫特派，他們之所以有这个名称，乃是因为最初組成該党核心的候选人是在吉倫特省选出来的。他們把巴黎恨入骨髓，想要破坏它的势力。他們想使法国变成一个联邦国家。

“在召开国民公会四天之后，吉倫特派拉索尔斯在他同党的鼓掌声中反复地說：‘我决不让巴黎由一伙阴谋分子所操纵，也决不让它对法国說来变成一个像从前羅馬对于羅馬帝国那样的城市。巴黎的势力必須縮小到八十三分之一，即其他任何地方都同样享有的那一份。’”^①

① 庫莫夫：《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党》，第349頁。

吉倫特派和巴黎的对立采取了最激烈的形式。在一七九三年五月三十一日至六月二日的起义中，巴黎人终于能够实现他们所提出的驅逐并逮捕三十四名吉倫特分子的要求。对于这一行动的报复手段是：諾曼底的吉倫特分子夏洛特·科尔台暗杀了馬拉(七月十三日)；不久以后，吉倫特派又企图煽动諾曼底、布列塔尼和法国南部来反对国民公会——这些都是在战时发生的。对此，巴黎人实行报复，处决了能够在巴黎找到的一切吉倫特分子(十月三十一日)。

第四章 第一巴黎公社

巴黎无产階級及其斗争的方法

到现在为止，我們曾經不断地談到“巴黎人”。自然，并不是巴黎的全部人口都可以归入这个名称，因为当时存在着許多显然互不相同的階級。所謂“巴黎人”，应当理解为这个都市的广大居民、即小資产階級和无产階級。

就后者这个名詞來說，我們不应当把它理解为大工业所产生的近代的无产者。当然，那时巴黎有一些工厂主；但他們的絕大部分的工人是作为苦力和搬运工人受雇来担任种类繁多的工作的，或者就是一批工匠的学徒，他們希望将来总有一天自己也变成独立的工匠。除此以外，还有无数的作为家庭手工业者的小工人和各种各样的居間人，他們的生活最为貧困，最沒有保障。

这种生活貧困和缺乏保障的情况使他們的社会地位无产階級化；而根据他們的階級地位、即根据他們的收入来源而言，他們是小資产階級，以过一种舒服的資产階級生活为理想。沒有什么事情比把收入决定的地位同階級决定的地位混为一談更能使人产生誤解的了。这个混淆在过去是由拉薩尔、在今天是由我們的俄国同志們造成的，因为这些俄国同志們相信：貧农的階級利益和富农的不同，他們的階級利益是和城市的以工資維持生活的无产階級相一致的。这个說法正同有些人所得出的結論一样荒謬，这些人认为：小資本家的階級利益和大資本家的不同，他們同財政資本的

对立是和无产阶级同资本的阶级对立相一致的。小资本家希望变成大资本家，小农也希望增加他们的财产——他们的目的就在于此，而不在于社会主义社会。前者正像后者一样地渴望靠牺牲工人来增加他们的收入，小农通过低微的工资和漫长的工时，小资本家则通过高价出售食品。

因此，大革命时代巴黎的穷苦市民按阶级地位来说是小资产阶级，虽然他们的生活状况是属于无产阶级的。

这种生活状况并未使他们抱有与景况较好的小资产阶级不同的目标，虽然这种生活状况所给予他们的从事日益激烈的斗争的手段是不大受那比较顺遂的小资产阶级欢迎的。

挨饿的人无法等待。他感到绝望，因而不能从容地考虑手段的选择问题。对他来说，生活没有什么牵挂；他除自己的镣铐以外没有什么可以丧失，因此他在一次动乱的期间不惜摒除一切，为新的局面预作准备，并希望由此做天下的主人。

因此，正是无产阶级、即巴黎居民中的广大群众形成了革命的巨大动力。他们的勇往直前不顾一切的作风使他们成为巴黎的主人，使巴黎成为法国的统治者，并让法国征服欧洲。

他们的斗争手段在于武装起义。他们的起义不是没有准备的，他们本身也不是从占优势的地位中产生出来的。他们要有组织得多。可是，他们倒是由群众的而不是由他们领袖的自发的压力中兴起的；并且也只有依靠群众，这些起义才往往势不可当。如果一次起义必须由领袖而不是由下面推动的领导力量来诱发，这次起义就表示缺乏必要的动力，整个运动非失败不可。在这次革命的全部发展期间，群众是动力，领袖是被动的。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存在的时候，局势是向前发展的。当情况适得其反，领袖们觉得有必要激励群众起来斗争时，革命就已经趋于衰落了。

可是，如果说一次起义只是在自发的時候而不是在领袖指引的情况下才能有成功的希望，这并不是说它在没有组织起来的时候也有绝大的获胜把握。大革命时期的几次巴黎起义在群众的组

織方面是有它們的基礎的。

甚至在最初出現騷動的跡象的時候，在攻打巴士底監獄的時候，就已經有了組織的核心。後來這些核心獲得了更加緊密和穩固的基礎。

在革命期間，每一個團體都要求更多的獨立自主的權利。制憲會議根據一七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法律所建立的條件，由於國家突然喪失權力，已經到處存在了。那些團體獲得了較高水平的自治權，即控制全部地方警察、指揮公民自衛隊以及正在各城市組織起來的國民軍的權力。

可是，與此同時，資產階級卻竭力不使下層階級分享他們的權力。國民議會把公民清楚地劃分為積極的和消極的兩種。積極的公民是那些至少以三天工資繳納直接稅的人。只有他們才有权選舉地方議會和國民議會。只能從他們中間招募國民軍。這些團體後來發展成為有錢階級的代議機關。

但是巴黎的“消極”公民以及他們的從積極公民的隊伍里來的朋友們，連同正式的地方代表會議，也已經組織起來了。他們用他們自己的方式把自己武裝了起來。

為了選舉，巴黎被分成六十個區，由它們選出候選人。在候選人被提名以後，這些選區就不存在了。但它們沒有取消，而是自動地組織為市政府的永久性的機構。它們不願橫遭摧殘，在七月十四日（攻打巴士底監獄）以前整個巴黎處於動亂狀態的時候，它們開始把人民武裝起來，並擔當獨立的當局的職能。在攻下了巴士底監獄之後，各區已經變成市政府的公認的機構。為了達成某種協議，設立了一個中心辦事處，特別代表們可以到這裡來聚會，互相交換意見。這樣就產生了組織公社的初次嘗試——通過聯合各區的組織而進行的自下而上的運動的結果，而各區的組織則已經在人民的自動創議下以革命的方式建立起來了。當國民議會正在逐漸削弱國王的權力時，各區以及各分區也逐漸在人民中間擴大它們的活動範圍。它們建立了巴黎與地方之間的聯繫，為八月十

日的革命公社打好了基础。^①

国民議會竭力想要取消各区的會議組織。通过一七九〇年五月二十七日頒布的法律，巴黎选区的划分有了变动。但是“消极的”公民不理睬这种禁止。各区这时成了革命活动的中心点。不久以后，凡是公社或国家大事无一不是由这些区进行討論并参与問題的解决的，因此这些区的全会就变成了常設的机构。只有通过它們的永久的性质，才能展开緊張的活动。

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各区完全代替了已經彻底衰落的公社代表，它們組成了新的机构，即由每一区推派委員三人組成的革命公社。从此以后，就是这个受那些区拥护的巴黎公社决定了革命的进程。

后来的历史著作都沒有能够給予这些区以应有的地位。它們的工作是由許多不知名的人完成的。革命时期的知名人物在雅各宾派里比在各区里格外出类拔萃。可是，雅各宾派的成就应当归功于各区，并且往往是雅各宾派方面显出举棋不定、畏縮不前的神态。只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丧失的无产階級才能勇往直前地断然闖进未来的世界。

恐怖統治的起源

通过公社，巴黎的无产階級获得了革命法国的一个統治的地位。但这个地位是分裂的，正如巴黎在全国的地位以及当时的无产階級在一般社会中的地位那样。

小資产階級按照自己的階級意識，采取了生产資料私有制的观点。他們不能摆脱私有制，他們需要它来繼續进行生产和生活。然而他們身为穷人，对富人的財產是抱有敌意的，因为富人的一帆

^① 克魯泡特金：《法国革命》，第一卷，第174—179頁。克魯泡特金按照他的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已經給予革命时期公社的历史以特殊的意义。除一些专著而外，他的几本书提供了对这段历史深入研究的資料。結果，他对当时的議會活动情况就闡述得沒有这样出色。

風順使他們感到憤慨，富人的財富是靠他們的不幸遭遇積累起來的。正就是這種對封建和資本主義龐大財產的不計一切的敵視態度，使他們在反對反革命的鬥爭中具有旺盛的精力，並且由於巴黎的卓越地位，使他們成為全國廣大人民深切關注的這場革命的先驅。巴黎的革命無產階級在其反對法國封建主義和君主政體、反對歐洲整個君主制度的堅強鬥爭中，有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的全部力量作為後盾。因此他們能夠蔑視全世界的當權人物；事實上，這些人的權力都到了他們的手裡。正是在這個時期，巴黎工人的強大的革命自覺精神才開始產生。由於這種自覺，直到第二巴黎公社的時代為止，甚至直到十九世紀最後幾十年為止，巴黎的工人始終是整個戰鬥的國際無產階級的十分值得稱道的典型。

可是這個階級本身卻代表着巴黎的最糟糕的消費者，因為他們迫切地要求廉價的食物，特別是在大革命的時期，所以這個革命實在可以稱為飢餓的反抗。結果促使巴黎的窮人愈來愈同農民、中間商人、有錢人以及那些由於擁有私有財產事實上最能靠生產資料獲利的人們發生矛盾，因為私有制在當時零售業盛極一時的狀況下是不可能廢除的，並且也沒有人嘗試過甚或建議過要廢除私有制。當無產者企圖就這種矛盾在巴黎顯示自己的力量並把巴黎的力量顯示給全國各地方的時候，情況的發展使他們了解到，他們不能長久地作為少數來保存自己而與多數相對立。所以儘管以前獲得了多次勝利，他們還是陷於分崩離析的局面。

無產者參加革命時所抱的希望，是想擺脫封建主義下的悲慘境遇從而排除一切的不幸，正如資產階級曾經承諾和想要做的那樣。他們這時取得了政治自由和權力，可是仍舊只有資產階級和農民才能在事業上得到某種程度的成功。大城市里的貧窮現象沒有減輕；相反地，貧窮的真正的苦痛卻第一次開始讓人切身地感覺到了。

飢饉和物價高漲是整個革命時期的突出現象。一般人把它們解釋為連年荒歉的結果。可是據我看來，革命時期的飢饉並不單

純由于这个緣故，而是革命本身的直接后果。

那时农民中間的生产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給自足的。农民除奢侈品以外簡直不需要城市的工业制品。他不仅生产自己的食物，而且也为他自行制造的紡織工业提供原料。他也制作自己的簡單家具和許多家用工具，他在生产方面所需要的其他任何东西都有农村的工人供給。尽管存在着这样的情况，他事实上还到城市去出售产品，那是由于国家对他征收各种捐稅，而不是由于他自己的生产需要。如果他不把他的谷类、牲口、酒类或者他在家里生产的其他任何东西帶到市場上去，他便无法繳納那些稅款。

除了这一切以外，他还必須以实物向封建主納貢，并且在其封建主的庄园上完成一定数量的强迫劳动。在这些封建主用这样的方法积聚起来的农产品中，只有一小部分供家庭消費之用；他們把大部分出售給市場，換取金錢在城里过放蕩的生活。

因此，捐稅和封建負擔一方面提供了流入巴黎并在那里流通的金錢；它們另一方面也提供了为換取寥寥的現金收入而使巴黎获得粮食供应的产品。

革命暫時取消了封建負擔，同时由于政府已經沒有能力征收捐稅，那些捐稅也暫時停止繳納了。因此农民就不再像从前那样非出卖他們的产品不可。首先，他們利用剛获得的自由尽量吃飽，把政府和封建主义硬要他們遭受的半饥不飽的处境告一段落。对于所剩余的产品，他們打定主意只按十分高昂的价格出售。今后沒有什么力量能够强迫他們廉价出卖产品了。仅仅由于这个緣故，就必然产生了物价的高漲以及巴黎与地方之間的矛盾，并且这种矛盾还采取了異乎寻常的形式。一七九三年，国民公会确曾編組了一支一万名的革命軍隊，它的責任是在乡村搜索并为巴黎征发粮食，所采用的正就是俄国最近嘗試的并且同样以失敗告終的那种方式。这是使今天的俄国革命甚至在外形上十分类似十八世紀資產階級大革命的一个特征。

战争使法国遭受“包圍”，并使缺粮現象不能依靠从国外輸入

粮食而得到缓和，这就使矛盾甚至格外尖锐化。矛盾使巴黎人挨受更加严重的饥饿，并以普遍征集的方式使乡间人民承担沉重的战争负担。

巴黎人具有希望获得胜利的最强烈的动机。他们作为一个革命的中心，本来是可以首先感到失败的来临的。而且，巴黎的爱国情绪最为奋发。巴黎的伟大和力量直接取决于帝国的伟大和力量。国民公会的极左派“山岳党”的成员创造了“一个不可分割的共和国”这个说法，而“爱国人士”这个名词就立刻具有了激进革命党人的含义。

农民对战争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边疆的农民当然希望避免外国的入侵，他们比別人更容易直接受到外国的胜利所带来的恢复封建奴役的威胁。因此他们像巴黎人一样地洋溢着爱国热忱。亚尔萨斯人尤其如此。那些远离边疆因而不受外敌威胁的人的看法就有所不同。这些农民并没有理解战争的政治意义。他们只感到战争的负担，而在他们看来这种负担是弑君瀆神的巴黎人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像拉凡德、诺曼底和布列塔尼这些地区，只要它们能够得到必要的领导，甚至在某种情况下会把反对巴黎的行动推进到实行公开叛乱的地步。领导人员有时是由反革命的贵族提供的。但是革命的资产阶级也曾结合为吉伦特派，一度策划相类的地方叛乱来反对巴黎，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

金融家也和农民一起同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发生矛盾。事实上这种对立甚至格外显著，其后果也甚至格外直接。这不是工人和当时还没有起很大作用的工业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即使在革命以后，圣西门都把工业资本家当作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是对金融和商业资本，对高利贷者、投机商人、行商和贩卖商人的矛盾。这些人本身并不造成粮食的匮乏，但是他们乘机利用这个灾难，增加紧张的程度。对于这一点我们不必多所论述。近五年来我们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可怕的经验。

在这困苦艰难的时期，物价高涨所造成的投机活动使人十分

感到憤慨。可以与此并列的，是一七九二年以后的軍需品承包商以及地产投机商的非法活动。国民公会曾經沒收了教会的地产——也許占法国地产的三分之一。

此外，那些逃出法国以便从外部来反对革命的貴族侨民也丧失了他們的地产。他們的土地也被沒收了。但是所有这些龐大的地产并未保留在政府手里，也沒有分給貧苦的农民，而是出卖了。首先，这是財政状况虛弱的結果，而那种状况是曾經終於促成革命的爆发的。但是革命並沒有使財政状况有所好轉；相反地，由于农民不再繳納捐稅，財政格外枯竭了。那些靠政府出卖充公的地产从中漁利的人們，往往以低价买进几片土地，其目的只在于把它們拼在一起，再分成小块以高价出售。政府的財政困难并未因此得到显著的緩和，但地产的投机者却左右逢源，利市百倍。

迫于需要，政府除发行革命紙币外別无他法。紙币的发行不久就开始达到巨大的規模。这样就产生了物价高漲的新的原因，以及汇兌和物价的剧烈波动的原因，而这种情况又为投机商人和高利貸者所利用，作为自己的大好財源。

这样，就从旧的封建制度所有制的廢墟中間产生了新的資本主义制度，这个制度随着无产階級的日益强大而同普遍的貧困一道发展起来。这种不可思議的情况十分清楚地表明了，如果缺少必要的社会条件，仅仅拥有政治权力是不能影响經濟規律的作用的。然而巴黎的无产階級挨餓了。

他們沒有仔細研究，在一定的經濟条件下什么是可以办到的和什么是不可避免的。他們掌握了政权，决定尽量加以利用，以便达到資产階級中間的知識分子保证他們能够享受的那种平等、博愛和普遍繁榮的理想境界。因为他們无法改变生产方式，他們就企图依靠强制手段来改变生产方式的結果——这种强制手段在我們这个时代也使我们够受的了，即：高漲的物价以及大体上同我們的战时借款和类似措施相一致的强迫购买的公債。然而，由于当时存在的生产分散、統計資料缺乏、中央权力与各地方的关系的失

調等現象，所有上述的措施都像今天一樣絲毫不能減輕困苦的程度。

隨着時間的推移，無產階級的政治力量同它經濟處境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大。同時戰爭所造成的苦難也越來越嚴重。因此無產階級中間的統治者們在絕望之余便越來越仰仗向外的方法，即仰仗血腥的恐嚇手段和恐怖主義。

恐怖主義的失敗

巴黎革命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通過公社統治了整個法國。可是他們很當心地不去直接行使他們的權力，提出“一切權力歸于公社”作為他們的口號。他們知道，只有通過代表整個帝國的國民公會，帝國才能團結起來和加以治理。因此他們避免干預國民公會的召集。他們不是不要議會，甚至也不是反對議會，而是通過議會來維持他們的權力。

列寧也一定有过同樣的計劃，否則我們就很難看出為什麼他要召集制憲會議，而不是讓人投票表決。可是公社比他來得幸運；因為它懂得怎樣利用這個重要的工具，而列寧在第一天就很不高興地把它拋開了。

當然，同公社聯合起來的國民公會中的“山岳派”只是少數派；但多數派却並不是由性格堅強、意志堅決的政治家組成的。其中有許多人是搖擺不定、遲疑不決的。他們讓自己受巴黎環境的影響；即使環境的影響還不足以使他們同“山岳派”表示一致的態度，那也足夠對他們施加強大的壓力，使他們像人們所希望的那樣投票表決的。

利用這些軟體動物，利用這個“沼澤派”，“山岳派”得以在國民公會中占據多數。

但緊張的局面往往要求採取迅速的對策，在這種時候，國民公會的立法活動就不是經常能夠令人滿意的了。即使法律都不是能

够很有效地应付社会的要求和需要的。每一项暴虐的法律，不论它多么严厉，只要它所规定的某些原则使那些受它压迫的人略施小技就有机会作有利于自己的解释，就是限制了本身的活动范围。这种压迫的政策既以与现存的关系密切相连因而无法根除的现象为目标，就不得不迟早从它本身所制定的法律的桎梏中摆脱出来，借助于不受法律拘束的压迫，最后走上独裁的道路。

这一点、而且只有这一点才是独裁这个词的真正含义：这是一种政体，不仅是一种状态。它代表着专断的权力，这种权力按其本性来说可以仅由一人来实施，或者仅由一个知道怎样不按任何正式手续行事的或愿意单单归一人领导的人数极为有限的集团来实施。为了使合作有所保证，每一个大的集团需要一些具体的规章、一个管理机构等等——换句话说，它已经受法律的约束了。

作为一种政体的那种类型的独裁在于个人独裁。阶级专政根本是胡扯。没有法律和规章的阶级统治是不可想像的。

既然对付投机商人、奸商和反革命分子的镇压措施毫无希望地失败了，无产阶级分子就求助于一种专政。

早在一七九三年三月二十五日，国民公会就必须组织一个“公共安全和一般防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成员很少，逐渐取得了绝对的独裁权。起初这个委员会有二十五个委员，后来减为九个。所有的会议都是秘密举行的。它控制部长和将军，任命和罢免文武官员。它派出具有无限权力的委员，能够采取它认为必要的任何措施。这些措施必须由各部部长无条件地加以实行。它固然要对国民公会负责，但这仅仅是一种形式，因为那个团体确实是在这个委员会的面前发抖的。当时至少曾对这个委员会的权力加了一些限制；因为按照规定，委员会应每月改选一次，并无权控制国库。不久，这个“公共安全委员会”变成“山岳派”的独占的机构。但是，这个团体的专断的命令愈是增多，他们中间的一个唯一的人物、即罗伯斯比尔的独裁权力也愈大。

作为独裁的补充工具，又成立了两个机构：（1）一个叫做治安

委員會的公安委員會；(2)臨時革命法庭，負責審判有關反革命活動以及損害祖國的自由、平等和神聖的一切案件。

無論是誰，只要被一個“愛國者”懷疑和告發，就足以被判处死刑，並且事實上還沒有任何上訴的機會。

路易·勃朗在其《法國革命史》中對於恐怖時代的組織作了如下的描述。

“我們發現一個以其自身的生命使巴黎活躍起來的不屈不撓的黨派、即雅各賓黨人的黨派。

“巴黎已經被分割成稱為‘區’的一些居民集團，這個城市表明了雅各賓黨中流行的觀念和思想。

“各‘區’的中心是公社，它把這些觀念和思想用法律的形式表現出來。

“‘公共安全委員會’通過委員們在國務活動的所有各個部門——在國家行政中、在官吏的遴選中、在軍隊中，以及通過革命委員會在地方上、在共和國的各地，把生命注入這些法律。

“‘治安委員會’的任務是揭露一切不良的和討厭的分子。

“臨時革命法庭立即懲罰他們。

“革命的機器就是如此。”^①

這架可怕的機器是被開足馬力的。

人們希望用這個手段來打垮走私者、勒索者和投機商人，尤其是如果把這些人都送上斷頭台的話。

但是經濟情況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難激勵人們相信，在任何種類的體力勞動中存在着金礦。至少在比較大的城市中，如果誰手頭有錢，有很多的錢，他就比以前任何時候更變成最悲慘的境遇的犧牲者。恐怖統治對於撈錢的事並不是畏縮不前的，不過它竭力用各種偷偷摸摸的方法攫取它所垂涎的東西。這樣，以行賄受賂的形式產生了自肥和貪污的新的來源。

^① 路易·勃朗：《法國革命史》，布魯塞爾 1856 年版，第二卷，第 519 頁。

被人发觉的危險愈大，那些人“想要”适当地拿出一部分的赃款来收买他們罪行的揭发者的傾向就愈加强烈。处境愈是困难，革命政府各个机关想从装聾作哑的应付办法中获得好处的欲望就愈大。

因此，尽管断头台忙得不可开交，新的財產却正在积累起来，另一批資本家代替被处死的資本家成长起来；而饥餓和饥荒也并没有減輕。

这些新的資本家是直接从小資产階級、无产階級和革命家的队伍中产生出来的，他們证明自己 and 上述那些人都是最不顧死活的和最狡猾的，但决不能算是屬於性格最剛强的一类。革命家中間最优秀的人士、即最大公无私的 and 廉洁的人們，那时正困在边疆和內战的不断的斗争中。因此，革命无产階級的队伍由于优秀成員的牺牲以及其中屬於冒險者一类的最歹毒、最冷酷的人的出現，从两方面遭到削弱。它在两方面丧失了它的最精干的成員。其余的人变得越来越冷淡和气馁了。革命已經不断地进行了四个年头；它曾給农民和金融家带来特权甚至財富；但对于以充分的自我牺牲精神勇气百倍地斗争的、終於能够把法国的权力統一在他們手中的无产階級來說，革命没有什么貢獻。它甚至沒有解除他們的饥餓；相反地，它倒增加了他們饥餓的程度。連嗜血的恐怖統治者的生活也并不过得好些。事实上它能从政治方面得到什么呢？他們中間开始感到疑虑、猜忌和疲劳了。

不久就开始发现，巴黎公社的統治势力有向他們提出的名目繁多的要求需要解决。我們已經知道，各个“区”的势力在于所有的公民都經常积极地参加它們的工作。而且，这些区都在不断地开会，并且它們自己都必须解决一切与行政和政治活动有关的问题。但随着時間的推移，这种情况变成不可能了；无产者和小資产階級都必须要在劳动中有所生产。否則他們将怎样生活呢？由于干着可能随时間断的临时工作，他們无法长久地坚持下去。只要革命的火焰在他們的心里燃燒，只要他們希望从革命的政策中获得

經濟的利益，他們总是竭力想法滿足于自己的处境。他們越是疑竇丛生，他們就越是想从生产劳动中而不是从政治中求得救助。他們越来越願意让政府各部門接二連三地落入各区的手里。他們让这些区任命由国家支付薪金的官吏，因而开始逐渐推行以后就要产生的帝国的官僚主义集权。同时，各区以某种形式获有薪給的一帆風順的人和他們的追隨者，立刻在人数上比其余的人为多；这单纯是因为他們是有闲的人，能够找到开会的时间，另一方面，那些不得不为生活而工作的无产者和小資產階級出席會議的人数却越来越少了。因此，当时存在着前者在数量上超过后者的危險。

从一七九三年九月九日国民公会作出的決議中可以看出各区革命活动衰退的迹象，这个決議限定每星期开会两次，并規定每开会一次給予那些必須为生活而工作的成員每人两个法郎的津貼。但是这并不能阻止出席會議的人数繼續减少的現象。

除此以外，还发生了群众和他們的領袖之間关系的显著变化。在革命上升的时期，正是群众推动了領袖，使他們精神奋发，对胜利滿怀信心。無論何时何地，只要民众的运动有成功的希望，上述的关系就是群众与領袖之間的正常的关系。每逢革命向前发展，領袖总比群众表现出更多的迟疑不决的心情；因为他們比群众更善于估計可能发生的不測事件，更清楚地看到必然要遭遇的困难。

但这时領袖的处境是：如果他們想要維持自己的地位，不致遭到彻底的复灭，他們就需要使群众重新奋发起来。因为群众快要精疲力竭，开始产生越来越多的疑虑和失望。所以領袖就得激励人民，喚起并鼓舞他們。这种情况在任何群众运动中总是表示：内在的力量不足，那个运动还没有获得这种力量，或者就是这种力量已經丧失。

为了激励人民，当权的政府就必须假装有力量的样子；它不得不使他們陶醉，从而使他們忘記还需取得社会的和經濟的胜利。达到这个效果的最可靠的办法是煽起人們的嗜血的欲念。所以这进一步說明了为什么当时要继续实行恐怖手段，并且确实还要加

强这种手段和使它更为有效的緣故。最后，当权人物感到他們脚底下的基础正在动搖，这种感觉所造成的越来越严重的神經過敏也显然有助于产生同样的結果。由于接着萌生了自暴自棄的情緒，人們不但格外憎恨那些享有階級特权的分子，而且也憎恨他們自己一派的成員，因为这些人尽管在次要的細节上有所不同，却和階級特权分子抱有同样的一般原則。这样，当权人物日益产生誤解，觉得每一个錯誤和每一个失着最后都会导致毀灭。

一場革命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不受任何可能做出的荒唐行为的妨碍，这就表明這場革命是在蒸蒸日上的阶段。相反地，在一个衰落的阶段，革命可能会感到最輕微的錯誤的可怕影响。

革命領袖們的地位愈不牢靠，不同集团之間的爭吵就愈加激烈，从而每一集团似乎更有必要鎮压其他集团以挽救革命。

在“山岳派”的成員中間，一开头就存在着“信神者”（如果不是实际上見諸行动的“教会信徒”的話）与无神論者之間、偏狹的清教徒与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者之間、輕率的人与深謀远虑的人之間的显著的差別。但这并不妨碍他們和諧无間地进行合作。当这些不同的集团开始互相猛烈地攻击，甚至使用“恐怖統治”作为彼此鎮压的工具时，这就已經透露了革命衰落的迹象。罗伯斯比尔派把阿伯尔派当作“极端革命者”、把丹东派当作“过分溫和的”和“墮落的”分子拖到革命法庭受审，終于使他們在断头台上（一七九四年三月）分享了他們在几个月前为吉倫特派准备的同样的归宿，这时，革命的命运已經确定了。

这些恐怖的措施已經显出革命瓦解的征兆；它們促使巴黎公社的群众分裂，从而把那些被送上断头台的人的追随者变成革命政府的仇敌，这就进一步造成了革命的崩潰。与此同时，由于群众日益冷淡，政府不得不撤銷在此以前一直由各区担任的种种职务，把它們交給政府官吏。

警察机关、特别是政治警察机关落进了两个实际掌握国家权力的中央机构的手里，它們是国民公会的公共安全委员会和治安

委员会。警察机关变成了一个全能政府的力量无限的工具，同时它也从各区的一个充分公开地执行任务的机关变成一个完全秘密性的机关。秘密警察机关这样就成为超越政府其他一切机构的一种无形的权力。

但是，领袖们想用恐怖手段来挽救自己的一切努力都没有见效。他们脚下的土地开始动摇了。他们只得背城借一地扩大恐怖组织和警察权力。但唯一的結果是：由于他们都感到自己的地位越来越有危险，他们就彼此团结起来拚命打算抵抗反对；因为在决定性的时刻这些统治者已经找不到任何拥护他们的人了。

克鲁泡特金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公社的热烈赞扬者，因而他决不願意反对那个制度，但他曾出色地描述了恐怖主义所不得不采取的致命的途径。在他論法国革命一书的标题为《恐怖主义》的第六十七章里，他作了如下的評述：“最阴暗的一面（撇开对外的战争不谈）是外省、特别是南方的态度。国民公会的地方雅各宾派和代表们不问青红皂白地对反革命领袖以及对他們所领导和组织的人们进行的大屠杀，已经产生了这样深刻的仇恨，以致它现在变成了一个惨酷战争的问题。局势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因为不论在地区或巴黎，除了借助于最极端的报复手段以外，誰也提供不出任何更有益的意見。”

他引证一些事件来证明他的論述，接着指出罗伯斯比尔怎样觉得非把恐怖主义推进到极端不可。路易·勃朗相信罗伯斯比尔本人希望摆脱恐怖主义的方式，因为他預先看到并深切地感到它的种种有害的后果。但他除用最严酷的恐怖手段来对付他自己队伍里的誓必求助于恐怖主义的人们，沒有别的办法使他們就范。路易·勃朗說：“罗伯斯比尔要使那些曾經弄得全世界人在他們面前发抖的人发抖。他想出了用他們自己的战斧砍翻他們、用恐怖主义本身来粉碎恐怖主义这种大胆的计划。”^①

① 路易·勃朗：《法国革命史》，第二卷，第748頁。

不論这种办法是否出于罗伯斯比尔的本心，这是一个可以議論的問題。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本人强迫通过了牧月二十二日（一七九四年六月十日）的法令，这个法令完全排除了給予政治嫌疑犯的最后一点点的法律保障。在革命法庭上，这种嫌疑犯的辯护人被取消了，訴訟程序只凭“人类公正的理智”的命令进行。法庭的裁决取决于“法官的良心”和他的“調解的能力”，不論其性质和程度如何。

早在一七九四年二月二十四日，罗伯斯比尔就曾說过：“他們正在企图用强辞夺理的詭辯来支配革命。背叛共和国的案件仿佛像是私人間的案件那样进行审判。暴政肆虐，而自由反为其作辯护。阴谋分子自己所起草的刑法，乃是他們自己被据以判罪的法則。”

当时唯一可以认可的惩罚是死刑。它甚至可以施之于那些“蓄意在人民中間制造糾紛或混乱而曾散布謠言的人們，以及旨在破坏精神状态或企图毒害公共道德的人們”。采用这种手段，任何政府都能立刻使反对派噤若寒蟬。克魯泡特金在談到这一点时說：“頒布这项法令，只能意味着宣告革命政府的破产。因此牧月二十二日这项法令的效果是使反革命在六星期的时期內达到充分成熟的地步。”

不久，根据这项法令，大約有五十四个人被执行了死刑。“于是，到处都称之为罗伯斯比尔法令的这项新法令便立刻开始实施。它使恐怖統治一下子成为人們咬牙切齿地憎恨的对象。”

接着又有一百五十名嫌疑犯大批受审，他們被分成三起立即正法。

“不必再詳細叙述这些执行死刑的情况了。可以充分說明問題的是：从一七九三年四月十七日設立革命法庭之时起，到一七九四年牧月二十二日（六月十日）止，即在十四个月期間，巴黎的革命法庭已經发布命令处死了二千六百零七人。但是自从頒布新法令以后，从牧月二十二日到热月九日（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即仅在四十六天的期間，这同一个革命法庭就处死了一千三百五十

一人。巴黎的人民看到五个刽子手好不容易才能逐日出清的运送被判处死刑的人到断头台上去的所有那些囚車，开始吓得发抖。不久就很难找到足够的墓地来掩埋死人了；因为每逢在巴黎的工人区开辟新的墓地时，就有很多人提出强烈的抗議。”

巴黎的工人居民这时都轉而同情受害者；其所以格外表示同情，是由于富人已經逃走或者避居在法国的什么地方，从而使穷人大受断头台的殘害。事实上，在路易·勃朗无法证明其身分的二千七百五十名被送上断头台的人們中間，只有六百五十名是屬於比較富裕的階級的。甚至有人說，公安委員會的一个委員是保王党，是巴茨的代理人，他为了使共和国遭人唾罵才拚命煽动执行死刑的。可以肯定的是，每一次这种新的大規模屠杀都加速了雅各宾政权的崩潰。

整个社会都感到自己面临罗伯斯比尔和他的追随者的威胁。因此整个社会——“极端激进派”、“溫和派”、吉倫特派和山岳派、暴力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无产者和有产者——都团結起来反对他們。

罗伯斯比尔的政权在那些受他威胁的人剛要張牙露齿的时候就垮台了。他在热月九日对人民发出的呼吁遭到了冷遇。他失敗了。同时巴黎公社对它已經行使好几年的权力丧失了最后的明白的要求权利。法国革命因而回复到当时的經濟条件所贊成的基础之上，即回复到資產階級的无上权力上面。

第五章 恐怖統治的傳統

罗伯斯比尔的垮台标志了可能发生的最坏的失敗。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崩潰，是因巴黎的无产階級和小資产階級拋棄了代表他們的一伙人并不願再为之斗争这一事实而产生的。的确，当可怕的屠杀終於結束时，他們如釋重負地暢舒了一口气。

但是这个可悲的結局不久就被人遺忘了。革命的无产階級和小資产階級——不仅在巴黎——的記憶中仍旧根深柢固地存在着的，是对那偉大而光輝的时代的怀念，那时他們通过自己的起义控制了国民公会，并通过国民公会控制了当时最强大的国家法国本身。法国那时能够睥睨整个欧洲，甚至使它屈服，至少暫時能够如此。

无产階級、小資产階級和一般革命分子在拿破侖黷武政治的控制下、特別是在拿破侖垮台以后在“容克地主”和金融巨头的統治下日子过得愈悲慘，这些革命分子就愈加怀念那些偉大的傳統。

現在很少有人是为了任何科学的目的和以科学的精神研究历史的，这也就是說，他們并不打算尽力发现人类发展过程中的因果关系，以便使它同这一发展过程中整个一系列的相互关系无可辯駁地相适合；或者換句話說，以便使他們更深刻地了解世界和事物，获得比較确实的知識和比較坚实的基础。

每一門科学的出发点总抱有某种十分实际的目的，并不是一种对于哲学知識的冲动的結果。像几何学这样抽象的一門學問，单凭它的名称也可从中找到上述这个論点的证据，因为它不外乎是指測量土地的方法。

同样地，当初历史的出发点也纯粹是以应用为目的的，即頌揚人們的祖先，以便激勵新生的一代去模仿他們。既然它主要不是知識的問題，而是具有政治的和倫理的意义，人們就认为沒有必要絕對忠于事实。他們動輒喜欢采用夸張的手法，以便加强效果，同时也敢故意作一些虛构的描述。历史的伪造有着同历史著作本身一样久远的来历。

大家都知道，这种記錄和解釋历史的方法已經沿用到今天。人們认为这是强烈的爱国情緒的表现——远远超过任何值得称道的才艺。

历史著作还另外有一个实用的目的。它是一种通过过去的习惯、契約或条約来为若干个别国家或一个国家內各个地区、部族或家庭确定其应得权利的手段。这种历史的解釋給予伪造者以丰富的資料。于是天主教以及教皇和个别主教、修道会和修道院的大部分財富和权力就根据伪造的文件而被确定了下来。

自从讀書写字不再限于少数特定的集团以来，假文件的伪造已經逐漸不流行了。但是，历史学总是充分懂得怎样随意提出确实的证据来支持对于任何合法权利的每一項历史要求这一点，已經由这样的手法使我們看得很多，这种手法是近几年来每一交战国为了符合它的願望和欲求而提出其种种历史权利的“科学”证据时經常采用的。

虽然如此，可以从历史方面获得的最重要的利益，却不在于因怀念祖先的丰功偉績而产生的兴奋和热情，也不在于确定对某些权利的要求，而是在于增加那些希望从过去的經驗中获得利益的人的力量。

这种力量的增加可以采取双重的形式。一方面，个人由于从历史上学到一些东西而得以增加他的智力。这就是說，他考察他的前輩的种种成功和失敗，企图发现在特定情况下他本来可以做什么事或者本来可以不做什么事。特別在軍事問題上，从历史得来的知識一向有巨大的实际效用。从来沒有一个軍事統帥不是涉

猎过战史并从他的前辈获得教益的。

有关政治问题的知識就比较难以从研究历史得来。在政治问题上，需要研讨的群众比在战争方面、特别是在古代的战争方面人数要多得多。这些群众并不是一个全能的领袖手中的百顺百依的工具，而是具有独特的个性，不是容易应付的。最后，一个政治家所必须处理的关系比在军事问题方面头绪多得多，并且格外容易发生变化。甚至在所包含的关系比较单纯、比较容易通盘考察的军事问题上，如果向历史汲取经验的结果只是愚蠢地模仿过去，而不是把那些从研究历史得来的一般原理和原则有的放矢地应用到具体问题上，那也是十分危险的。在政治方面，各个国家和时代的社会环境和局面存在着大得多的差别，因而格外不容易把它们看出来。所以，依样画葫芦地模仿过去的事件，直接应用到仅与过去事件表面相似的局势上去，往往是弊多利少，并在谋求了解真实事态和当前具体需要时只会模糊视线而不是使人看得更清楚。

因此在政治方面所发生的情况是，人们简直不懂得该怎样实实在在地汲取经验。但是大多数的政治家，即使在他们确实用功探求历史知识时，所关心的决不是什么“汲取经验”，而只是一些毫不相干的事情。这样我们就开始考察人们研究历史以增加其势力和实力的第二种方法。

每一个当代的阶级或党派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与它相类同的东西；因为在过去的时代，也像在我们今天的时代一样，存在着剥削者与被剥削者、有产者与无产者、贵族与平民、君主与共和主义者之间的种种斗争。过去的这些阶级和党派当然是受那种与今天截然不同的条件的支配的；它们的内容往往完全不同于较后时期的相应的现象。但是在政治方面，今天的事件是用过去相类的事件、用它们的成功和失败来衡量和比较的。为了在某一方面进行宣传，如果有人能够引证一个过去曾经获得成功的事件，那是总会增加他的力量的。如果有人能够指出相反的一面，证明在哪一点上一个相反的行动已经使他的前辈遭到毁灭，那也是同样会增加

他的宣傳的效果的。

这引起了人們对于研究历史的十分濃厚的兴趣，但那决不是对历史事实的真正的兴趣。我們在这方面也可以找到伪造历史的事例。各党各派的作家們自然竭力想把他們的領袖放在有利的地位，而把他們的敌手尽可能放在不利的地位。在引起人們伪造历史的許多实际需要的包圍中，只有那些为真正想取得經驗的欲望所鼓舞的人才沒有伪造的傾向。这种欲望促使人們不但力求看到前輩的成功，而且还要竭力了解他們的失敗，并对他們和他們的行动进行严格的批判分析。在这一点上，我們看到那种趋向于純粹科学的冲动的轉变，其目的在于了解正确的事实，單純出于滿足因果关系的欲望来考察历史。

导致著述历史的其他一切实际的需要，扩大了那种使科学性降低地位的趋向，直到它仅仅变成一种傳說的捏造。今天，幸而相反一方面的批評家能够經常揭露这种欺騙的手法。这种做法已經不能再像从前只在戒严状态下或檢查制度下才核对事实的时候那样簡單地进行了。但即使在民众教育程度极高、出版事业享有无限自由的今天，还不乏对历史的片面的闡釋。

自然，不应当认为作家总是有意識地想使讀者誤入迷途。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倒是历史作家由于他自己的党派狂热和党派褊狹观念而迷失了方向，因为这些东西通常使他看不出事物的本来面目。

这种情况格外可能发生，因为我們賴以补充历史知識的資料往往本身就是党派斗争的結果，同时因为社会关系总是異常复杂，甚至最公正的探究者也往往感到很难理出头緒，必須一再向自己提出这样的問題：“究竟真相如何？”

利沙加勒在其《巴黎公社史》的序言中說得很对：“凡是有意无意地根据‘历史空想’向人民提供虛假的革命历史而欺騙他們的人，正像为航海者画出錯誤的航綫图的地理学家一样，自己招来懲罰。”

然而我知道我党有一些同志，一些絕對誠实的和值得尊敬的

同志，他們认为向人民提供关于布尔什維主义的虛假的“历史空想”来哄騙他們，乃是对革命的神圣义务。

另一方面，在急驟的暴風雨中，即使是最謹慎的历史家要在地图上——标出沿途所經過的所有危險的暗礁，也是多么困难！革命使人們热情奔放并在运动中作生死的搏斗，自然比其他一切历史事件更容易受党派思想和闡釋的支配。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因此在法国大革命期間，人們最激烈反对的，正就是实行恐怖統治、代表那次革命最强大的动力和最热烈的表現的巴黎公社。每逢反革命分子要想表明那次革命的特征并加以攻击时，他們总是把矛头对向这个机构。但革命家却认为为巴黎公社作辯护乃是他們的一种义务。他們不贊成把恐怖統治看作当时革命所采取的一种特殊的形式，一种只是屬於过去而在将来不应重演的形式。他們不贊成人們关于那些对組織恐怖統治負有責任的特殊情况所作的解釋。另一方面，他們觉得只能頌揚而不能譴責那个制度，认为“恐怖”是解放被奴役的階級的一种可怕的但必要的手段。

甚至馬克思自己在一八四八年所拟定的計劃都还以革命恐怖主义的胜利力量为基础，虽然他那时已經批判了一七九三年的傳統。

在《新萊茵报》上，他一再贊揚恐怖主义。他在有一期（一八四九年一月十三日）的报上发表了下列关于匈牙利人起义的言論，而对于这次起义的革命意义，他是估計过高的：

“在一七九三年以后，在一八四八年的革命运动中，一个被占优势的反革命包圍的民族敢于用革命的激情来对抗怯懦的反革命的狂暴，用紅色恐怖来对抗白色恐怖，这还是第一次。长时期以来，我們第一次見到了真正的革命性质，第一次看見了一个敢于代表本族人民接受敌人的挑战而进行殊死斗争的人——路德維希·科苏特；对于本民族來說，他体现了丹东和卡諾的形象。”^①

^① 馬克思：《匈牙利的斗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93頁。——譯者

在此以前，在同一刊物一八四八年十一月七日的一期上，馬克思关于維也納事件写道：

“在巴黎，六月革命会給以致命的反击。随着‘紅色共和国’在巴黎的胜利，軍隊将从各国的內地調到边境并越过边境，而各个斗争的党派的真正力量也将赤裸裸地暴露出来。那时我们会想起六月和十月，并且也会高声喊道：战敗者罪該万死！^① 六月和十月的日子以后的无結果的屠杀，二月和三月以后的无止境的殘害，——仅仅这种反革命的殘酷野蛮行为就足以使人民相信，只有一个方法可以縮短、减少和限制旧社会的凶猛的垂死掙扎和新社会誕生的流血痛苦，这个方法就是实行革命的恐怖。”^②

这个办法沒有拿来作实际試驗。但我們在革命者中間发现一种日益滋长的內心矛盾。如果研究历史的結果使他們拥护恐怖手段，他們的態度就与我們以后会知道的从今天环境中产生的他們日益濃厚的人道主义本能相抵触，就与他們不願作出使人痛苦的行为和甚至杀人的心理相抵触。这种人道主义实际上比历史书本里过时的恐怖主义理論更受人重視。

关于一八三〇年七月的革命者，波尔納在其巴黎通訊的第六封信中写道：“他們很快就得胜了，但他們对敌人寬恕得还要快。遭受了如此重大損失的人民所实行的报复多么溫和；他們把一切又忘記得多么快！只有在戰場上的公开搏斗中，他們才使敌方受到創伤。他們根本沒有杀害手无寸铁的囚犯，根本沒有追捕逃亡者，根本沒有搜尋逃匿者，也根本沒有折磨嫌疑犯。一个民族的态度就是如此！”

一八四八年二月，巴黎革命者的气度像他們在一八三〇年那样豁达。甚至在同一年的可怕的六月斗争里，战斗的工人都表現

① 原文用黑体大字刊出。

② 馬克思：《反革命在維也納的胜利》。《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43頁。——譯者

了最高尚的英雄气概和最坚韧不拔的毅力，一点也没有嗜血残忍的形迹。残忍手段是留给他们的战胜者用最可怕的方式来发展的。不但是那些听了捏造出来的起义者的暴行而万分愤慨的士兵，甚至是知识分子都参加这个复仇运动。医师们拒绝为受伤的革命者包扎伤口。

马克思在他登在《新莱茵报》上的一篇论六月战斗的著名文章中提到了这方面的情况：

“科学不是为犯了弥天大罪的平民(他们这次是为自身的生存而战斗，而不是为路易一菲利浦或马拉斯特先生流血)服务的。”^①

正是对于这种野蛮行为的愤怒，促使马克思写了上面所引述的相信恐怖主义的声明。

当巴黎的工人们在一八七一年压倒了第二巴黎公社的政治权力时，由一八四八年的六月战斗所产生的极端严酷的情况在那些工人中间发生了更多的影响。他们有不少人曾经亲自参加过一八四八年六月的斗争。人们也许已经料到，复仇的日子、马克思预言的恐怖的日子现在就要来到了。

但他本人在他论述公社的文章中说道(《法兰西内战》，一八七一年)：

“从三月十八日一直到凡尔赛军队进入巴黎，无产阶级的革命完全没有像‘上等阶级’的革命、特别是反革命中极为常见的那些暴行。”^②

这里我们发现一种对于恐怖主义的断然摒弃，而恐怖主义则被认为是与无产阶级革命相比的“上等阶级”的革命的一个特征。

不久以前，我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态度可以说是不忠于马克思的，因为他的革命热情肯定会把他引向布尔什维主义。作为这一点的明证，我引述了马克思对于一八四八年恐怖行径的声明。

① 马克思：《六月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3页。——译者

②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8页。

我們現在看到，我所犯的不忠于馬克思的罪行早在一八七一年就由他本人完成了。在他第一次和第二次聲明之間，已經插進了二十年的最奮發、最緊張的精神活動，這個活動的結果就是寫出了《資本論》。

無論是誰，只要他在恐怖主義的問題上以馬克思的見解為依據，他就沒有權利抱住馬克思的對於一八四八年的看法不放，而抹煞他對一八七一年的看法。像馬克思一樣，恩格斯在一八七〇年也對恐怖主義沒有什麼熱情。一八七〇年九月四日，他在寫給馬克思的信上說：

“所謂‘恐怖統治’，我們理解為那些鼓吹恫吓殘暴的人的統治；恰恰相反，這是自己受到驚恐的人們的統治。恐怖——這多半體現着那些自己懷有恐懼因而需要安下心來的人們所犯的毫無用處的暴行。我相信，其所以產生一七九三年的恐怖統治，幾乎完全應當歸咎於冒充愛國者的過分性急的小資產階級，以及把恐怖手段當作家常便飯的暴徒。”^①

當馬克思以明顯的滿意語氣，指出第二巴黎公社始終沒有干那種作為第一巴黎公社突出現象的暴行時，他是完全正確的。在第二巴黎公社存在期間巴黎所發生的強暴性質的事件，不應當由它負責。縱然如此，我們也不應當認為恐怖主義的思想在第二巴黎公社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它為那個機構的全體成員所摒棄。事實決非如此。

現在讓我們來更仔細地討論這個問題，同時把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和蘇維埃共和國比較一下。因為蘇維埃共和國往往指明一八七一年的公社是自己的雛型，並且認為它具體地說明了自己一切理由。恩格斯在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第三版的序言里也曾宣稱巴黎公社象徵了無產階級專政。因此，比較仔細地研討一下這種專政並了解它是什麼樣子，對我們是有好處的。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四卷，三聯書店 1958 年版，第 435 頁。

第六章 第二巴黎公社

公社的起源

一九一七年的苏维埃共和国，像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一样，是战争和军事失败的结果，并且必须由革命的无产阶级加以支持。除此以外，二者就没有办法再比拟了。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能获得政权，是因为他们在俄罗斯的一切政党中是最努力要求和平的一个政党。这是一种不惜以任何代价取得的和平，甚至是局部的和平。他们没有凭空为了由此可能产生的总的局势担忧，也不管这是否会帮助德意志黠武君主国取得胜利和世界霸权。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布尔什维克自行担任德意志军国主义者的雇佣兵，像印度或爱尔兰起义者和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一样。在拿破仑失败和共和国宣告成立以后，在德国人开始提出并吞亚尔萨斯—洛林的要求以后，法国激进派在一八七〇年战争中的态度却截然不同。在第三共和国抵抗德国联合起来的君主们的这场斗争中，一七九三年第一共和国抵抗欧洲同盟君主国的斗争的局面似乎要重新出现了。那个早年的传统又发挥了作用，巴黎的无产阶级又组织了最好战的队伍，他们十分坚决果断地从事战争，以拯救浑然一体的共和国。

同时，一八七〇年的农民也不再像一七九三年的农民那样。一八七〇年的农民憎恨巴黎和它的无上权力。然而，他们相信应当击退共同的敌人，因为后者的胜利将使他们重新受到封建剥削，并且可能会夺去他们已经为自己取得的教会的和其他方面的财

产。另一方面，一八七〇年的农民却从普鲁士人的胜利中产生不出相类的恐惧。在他们看来，教会的问题是胜过一切的，因此亚尔萨斯—洛林的丧失同战争的负担和破坏相比，似乎害处要来得少些。抛开自始至终拚命反对分离的亚尔萨斯—洛林的人民不谈，随着战争的继续，和平的思想在农民和外省人民中间迅速地蔓延开来。这种要求和平的叫嚷代表反动派和保皇党的口号，目的在于反对巴黎的好战的激进派。像在一八一七年的俄国一样，一八七一年的厌倦战争的和平派比那些想要继续作战的人们占了优势。但是一八七一年的和平思想并没有帮助激进派中间最激进的分子，而是倒反帮助了反动派中间最反动的分子。

一八七一年二月八日，选出了一个国民议会来缔结和约。议会只有两百个共和党人，另一方面却有四百多个保皇派分子。“几乎整个省份都要求不惜以任何代价取得和平。但巴黎却要求血战。它只推选那些保证继续作战并反对以放弃领土的代价换取和平的人们。”^①

二月十二日，国民议会在波尔多开会，并在三月一日以五百十六票对一百十七票通过了和约。这一百十七票中间大约有一半是巴黎代表们投的票。国民议会的选举目的只是为了缔结和约。当初仅仅考虑到这一点，选举人才投他们的票的。这个议会之所以有压倒多数的反动分子，不但是由于人们不喜欢共和国，而且也由于人们不可遏制地提出和平的要求。在这件事情过去以后，国民议会的委托就告一段落了。必须选出一个负责决定与宪法有关的一切问题的新的议会来代替旧的议会。这些选票所产生的结果本来可能与波尔多的议会所产生的不同，因为共和国不像继续作战那样遭到很大的反对。然而，一八七一年四月三十日在法国各地举行的选举事实上选出了绝大多数为共和党的议员。但正因为该党的“容克地主”害怕国民议会，他们格外死抱住他们的委托不放。他们自行组

^① 路易·杜布勒伊：《巴黎公社》，巴黎版。

成了一个制宪会议，如果他们沒有分成两派，他们毫无疑问是会恢复君主制度的。其中一派是直到一八三〇年为止在法国始終被认为是合法王朝的那个王朝的合法拥护者；另一派是反对那个王朝的奥尔良派，他们由于一八三〇年的革命，已經处于世襲統治者的地位。这种分裂拯救了共和国，但它並沒有使巴黎不成为两派共同仇恨的对象。法兰西共和国除巴黎以外沒有其他强大的支柱，但这个支柱的力量在一七八九年以來已經在无数的場合下显示过了。只要巴黎沒有被克服，就决无可能恢复君主制度。外省的人士越来越激烈地反对巴黎，反对不道德的、无神的、好战的共和党的巴黎，更不必說它的社会主义了。从它最初的几次开会起，国民議會就十分强烈地表示它的极端厌恶的心理。为了保卫国土已經忍受了五个多月可怕的圍攻的英勇的巴黎，現在却成了它的傲慢貴族的最可耻的誹謗辱罵的对象。侮辱巴黎，不承认它享有一切自治权利，剝夺它作为首都的地位，最后是为了更有保证地实行君主制的政变而解除它的武装——这便是国民議會以及它所选中的行政首脑梯也尔主要关心的事情。

我們看到这 and 布尔什維克的政变有着怎样截然不同的差别，因为布尔什維克是靠和平的願望获得政权的，他们有农民的拥护作为靠山，除社会革命派和孟什維克之外在国民議會里沒有君主主义的反对派来反对他们。布尔什維克革命和第二巴黎公社的直接原因，像这两个运动的结果一样，是截然不同的。布尔什維克通过一次布置周密的政变获得了政权，这次政变一下子就使他们掌握了整个国家机器，然后他们就立刻开始尽可能不顾一切地积极利用国家机器来剝夺他们的反对者——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一切反对者——的全部政治和经济权力。另一方面，在停止巴黎公社的活动的时候，沒有誰比革命派自己更感到惊奇的了，并且他们很大一部分人认为这种冲突是完全要不得的。当然，由于革命傳統，有了适当准备的武装起义的策略深受巴黎人的拥护。布朗基派是他们在社会主义者中間的主要代表。在被圍时期的各个不同时

候，他們和雅各賓派性质的其他人士力图鼓吹暴动；可是他們得不到足够的支持，所以这些企图总是成为泡影。由于十月三十一日麦茨的投降所造成的印象，他們起来要求根据社会主义而不是爱国的动机选举一个巴黎代表会议，以使用一种比第一巴黎公社在一七九二——一七九四年所表现的更为奋发的精神来继续作战。忠于政府的那部分国民自卫军终于能够不流血地弥平了这次暴动，因为政府的军队沒有遇到什么需要加以克服的反抗。为了巩固他們的地位，政府在十一月三日举行了巴黎人民的普选。結果，拥护政府的有五十五万八千票，反对的还不到六万三千票。“不惜牺牲的活动家”在一月二十二日的处境也不見得好一些。虽然他們当时用爱国的和深得民心的贊成继续作战的投票来反抗，政府却已經宣布投降是不可避免的；于是在革命派中間便驟然产生一种憤怒的情緒，这种情緒比十月三十一日的暴动具有更凶殘的效果，但它也毫不費力地被压下去了。

这些失敗已經使这些活动家感到厌倦和失望，并削弱了他們的力量。他們在三月十八日还没有准备要求举行一次新的暴动。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际的人們从一开始就反对任何暴动的企图。在拿破侖垮台之后不久，在九月革命的期間，卡尔·馬克思写信給恩格斯（一八七〇年九月六日）說道：

“我剛坐下来打算写信給你，賽拉叶来了，并告訴我，他明天要离开倫敦到巴黎去，但無論如何只預备在那里耽擱一两天。他的目的是到那里去同巴黎的国际联合委员会接洽事情。这更有必要，因为目前整个‘法国支部’都涌进巴黎，以使用国际的名义做出一些蠢事。他們要推翻临时政府，成立巴黎公社，任命皮阿为駐倫敦的法国大使，等等。我今天收到了巴黎联合委员会給德国人民的一个声明，这个声明我打算明天寄給你。声明中包含一項紧急的要求，要总委员会对德国人发出一个新的特別宣言。我已經打算在今天晚上提出同样的建議。請尽快地寄給我一份用英文写成的关于亚尔薩斯—洛林的軍事情报，因为这个情报对那宣言是有

用的。我已經詳細地答复了巴黎的联合委员会，同时也已担负起使他們睜开眼睛看看实际情况的不愉快的工作。”^①

我曾被人譴責为仅是馬克思的一个“墮落的艾庇戈尼”。当然，馬克思的革命性和他当时那种火爆的脾气，要是在今天本来是会促使他毫不犹豫地加入布尔什維克的陣营的。我們从他的信里看出，在那革命的时期，他的火爆的脾气怎样使他认为他的首要的責任就是担负起让他的同志們睜开眼睛看看实际情况的不愉快的工作；同时也看出，这种同样的脾气，虽然十分暴躁，却能在某些情况下实行一种革命的行动，即使那是一种愚蠢的行动。恩格斯在九月七日給馬克思写了如下的复信：

“杜邦剛才走了。他今天晚上曾在这里，对于那个了不起的巴黎声明非常生气！賽拉叶正在到巴黎去并且他已同你談过，这一事实已經使他的心情平靜下来。他对全盘事情的看法是十分清楚和正确的，即：利用共和国已經答应給予的在法国組織政党的自由；在組織形成后一有机会就采取行动；在媾和以前約束法国的国际，使其保持审慎的态度。”^②

对于这封信，馬克思在九月十日答复說：

“請告訴杜邦，我完全同意他的意見。”^③

換句話說，在他火爆的脾气看来，更重要的乃是組織而不是行动。就在这保持謹慎的实际情况下，法国的国际当时所采取的，还簡直是一种冒失行动的計劃。

这里不妨举一个例子。二月二十二日，在国际的巴黎联合委员会开会时，一个委員提議在二月二十四日举行和平示威，以紀念一八四八年的革命。鉴于局势緊張，联合委员会的多数成員认为連这种和平示威都是十分不合时宜的。弗兰克尔尤其反对这个建議。他要求他們暂时以全力来組織无产階級，研究最重要的經濟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四卷，三联书店 1958 年版，第 436 頁。

② 同上书，第 438 頁。

③ 同上书，第 441 頁。

問題，特別是支付在圍城期間已經過期的工資，以及失業問題。

在國民議會中的國際的代表馬隆和托倫決定要表達人民的意志。由於弗蘭克爾的建議，聯合委員會議決不布置示威遊行，而是讓每一個個別成員自行決定他是否應參加這種示威。這證明他們對於起義並沒有十分強烈的傾向。這次起義事實上是革命派的反對者而不是由革命派操縱的。由於戰爭危急，巴黎的無產階級正在組成國民自衛軍，並且已經武裝起來。這種局面在梯也爾周圍的人們——貴族地主、金融家、官僚政治和軍隊的首腦——看來是一個很嚴重的危險。在簽訂和約以後，他們認為最迫切的工作就是解除國民自衛軍中無產階級部分的武裝。這是從那部分隊伍被剝奪大炮開始的。德國的統治者已使巴黎國民自衛軍擁有這些大炮；因為他們——德國人——希望這支國民自衛軍“會成為使火藥庫着火的火花”，像波爾根正確地說過的那樣。^①

充分利用勝利，是軍事科學和行動的要素。一位將軍的重要任務不僅是打敗敵人，而且要使打敗的敵人完全解散和復員。然而，一個政治家的目的卻有所不同。他必須越過勝利而更往前看，以便發現可以根據什麼條件同目前的敵人將來發生關係。這兩個想法在每一次十字軍中都是互相對立的。當軍事思想越出實際進行戰爭的範圍而對政治發生影響時，結果是很危險的。一八六六年，俾斯麥已經精通並學會運用軍事的思想方法，雖然頗費周折。但是，一八六六年的幾次勝利已使普魯士參謀本部掌握巨大的勢力，這種勢力由於一八七〇年的勝利而格外有所增加。俾斯麥無法反對普魯士參謀本部。他必須屈服於軍事的思想方法，結果他自己的政治理解受到了妨礙和蒙蔽。因而才有提出併吞亞爾薩斯—洛林的要求的事，這個要求使戰爭延長了幾個月，驅使法國投入俄國的懷抱，並為德國現在的分裂鋪平了道路。雖說如此，亞爾薩斯—洛林這時在經濟上和戰略上却仍舊是一種很實在的收穫。

① 佐治·波爾根：《巴黎公社史》，巴黎，1917年，第43頁。

但他們并不滿足于這一點，而是還想屈辱那個由于反抗德國人的軍隊而被他們痛恨的中心——巴黎；他們在二月二十六日強迫法國答應讓德軍從三月一日起侵入巴黎，占據香麗榭。當巴黎人在二月二十七日知道這個消息時，升起了普遍憤怒的呼聲和武裝起來的號召，以使用武力擊退共同的敵人。國民自衛軍的各個營幾乎都表明態度，準備聽從指揮。只有國際的成員保持緘默。不論當時舉行起義以反對內部的敵人在他們看來是多麼凶多吉少，舉行反對外敵的起義也同樣是不幸的。他們懇求國民自衛軍的中央委員會放棄任何武裝抵抗的企圖，因為他們說這只會導致以前六月屠殺的重演，并把共和國埋葬在巴黎工人的血泊中。他們建議國民自衛軍不要武裝抵抗，而是用一條哨兵綫把德國人包圍起來，這樣就可以完全把他們同巴黎人民隔絕，使他們孤立起來。

中央委員會終於聽從了勸告，所以德國征服者的洋洋自得的傲慢態度沒有引起世界歷史上最可怕的巷戰，應當歸功于國際。幾星期以後使巴黎無產階級中間遭到血腥大屠殺的，是法國的而不是德國的軍隊。

根據一月二十八日的巴黎投降條款，除國民自衛軍的武裝外，市內軍隊的全部軍用物資已經移交給勝利者；不僅他們的武器，而且還有他們的不是由政府而是由巴黎城裝備的大炮。因此，當德國人開進巴黎時，政府並未採取任何步驟將勝利者根據條約歸他們保管的那些大炮搬運到安全地區。政府或許是希望敵人已經接收那些大炮，從而削弱了內部敵人的力量。但是國民自衛軍預有準備，及時地把這些總數有四百尊的大炮搬到巴黎市內德國人還沒有能夠接近的地區。在締結和約以後，政府最關心的事就是要重新掌握這些大炮。這樣，他們便希望解除巴黎國民自衛軍中無產階級隊伍的武裝。國民自衛軍好像要腰斬巴黎并使其喪失首都的地位。抱了這個目的，他們決定不在巴黎開會。梯也爾費了很多唇舌勸他們在巴黎附近的凡爾賽舉行會議，而不是在以前的會議地點波爾多。他們打算在三月二十日在那里開會。他們預先必

須有不受巴黎威胁的可靠保证。因此他們决定在三月十八日沒收这些大炮。梯也尔认为最聪明的办法是暗中偷走这些大炮，而不是用武力公开夺取。在早晨三点钟，当整个巴黎还在睡乡的时候，几团軍隊占領了存放大炮而无人守卫的蒙馬特尔，想要把它們搬走。但說起来十分奇怪，他們事前忘了带来必要的馬匹。因此首先要將馬匹弄来；与此同时，巴黎人觉得事情可疑，立刻就聚集起来，形成了一个越来越壮大的人群，最后迫使軍隊空手离开那些大炮。他們胜利了。有些士兵曾和巴黎市民生活在一起，同他們一道反对过共同的敌人，一道鄙夷过无能的將軍們，这时他們同人民和国民自卫軍結成亲密友好的关系。列康特將軍命令軍隊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結果只是使他的士卒倒戈相向，把他拘捕后用枪打死。这次枪杀的紛扰屬於人們想要归咎于公社的那些恐怖暴行一类。枪毙托馬將軍的事件也可以这样說。他是三月十八日早晨穿了便服在人丛中記筆記时被捕，当作奸細处决的。早在二月二十八日，就有一个警察暗探在进行偵察活动时當場逮住，被扔进塞納河中殘忍地淹死了。

那些把这些行为归因于公社的人們忘記了，在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公社还没有成立。另一方面，也不应当使巴黎的市民負責。这些执行死刑的事件中的每一件都是由軍人实行的，与平民无关。它們是那些不大重視人命的黷武分子而不是无产階級的思想的产物。那些因为士兵枪杀他們的嗜血的將軍而感到憤怒的热爱人道的人們，如果看到同样的士兵枪杀了妇孺，是不会有什麼意見的。“他〔列康特〕的士兵并没有射击妇孺，而是把他枪毙了。士兵們在工人階級敌人的訓練下所养成的根深柢固的習慣，自然不会在他們轉到工人方面来的一剎那間完全改变。”^①

国民自卫軍在这些事件中所采取的任何行动，目的只在于防止更多的流血。事实上，他們有时冒了自己生命的危險，終於能够

^① 馬克思：《法兰西内战》。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論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9頁。

把憤怒的士兵所逮捕的軍官從他們手里救出來，所以被殺死的只有上述的那幾個人。三月十九日，國民自衛軍的中央委員會最後提出抗議，反對以任何方式參加這種屠殺。在三月二十日公社的官方報紙上發表的中央委員會的公告里有如下的聲明：

“我們憤慨地宣告，已經使我們的名譽受到損害的血腥的耻辱是一種駭人聽聞的丑事。我們並沒有決定要執行死刑，國民自衛軍也從來沒有參加過任何這種罪行。”

這是一個強烈的譴責，它不僅指責了原告，也指責了那些被推在國民自衛軍身上的暴行。看到軍隊脫離政府而趨向人民，政府只有兩條道路可供選擇——或者對激怒了的群眾讓步，同他們進行談判，或者避其鋒芒而溜之大吉。梯也爾決不願意進行談判，他匆匆忙忙地帶了他的政府逃出巴黎，趕快把所有那些還沒有沾染叛變情緒的軍隊集結在自己的周圍。他甚至放棄了巴黎四周的要塞，包括著名的蒙瓦拉里昂要塞在內。如果巴黎人跟着梯也爾猛追，他們也許就能推翻政府。從巴黎撤走的軍隊根本沒有力量作任何抵抗。這是他們的將軍後來親口說出的話。如果那樣，就有可能建立一個新的政府，雖然它未必能夠實行社會主義綱領。因為條件還沒有十分成熟。但是他們就可以解散國民自衛軍，並按照下列計劃選出一個新的國民自衛軍，即：鞏固共和國，給予包括巴黎在內的各地區以自決權，以民兵代替常備軍。那時公社所提出的要求並沒有超出這個範圍，而這個計劃根據法國當時的情況是可能實現的。但是梯也爾繼續退却。他們讓他收拾他的軍隊，在凡爾賽加以改編，並灌輸新的精神，使他們堅強起來。對於部長們的撤退，沒有誰比巴黎人自己更感到驚奇的了。當時沒有現成的組織可以接收事務的領導權，以代替業已逃走的統治者。甚至在三月十九日早晨，巴黎都還根本沒有什麼政府。國民自衛軍的中央委員會為形勢所迫，只得挺身而出，組織一個沒有明確綱領、沒有任何明顯目標的團體。他們履行了自己的職責，首先是把他們的權力委託給一個名叫呂叶的一個人，讓他掌握支配巴黎的最高

指揮權。他是可以想像得出的最不合适的人，一个酒鬼，自己不知道究竟是“傻子的成分多于叛徒，还是叛徒的成分多于傻子。这个人能够在四十八小时的时间內犯下可能犯下的最可怕的錯誤——一些无法弥补的錯誤。但是对于吕叶的这种不幸的選擇，归根到底只是当时局势的一个朕兆和迹象”^①。

直到四月三日，才决定对凡尔赛实行进攻。但在三月十九日本来可以带来胜利的因素，却在四月三日成了失败的肇因。希望士兵們仍会像在三月十八日那样倒向巴黎这方面来的如意算盘完全落空了。巴黎的国民自卫軍碰到了他們无法克服的最頑强最坚决的反抗。从那时起他們处于与整个巴黎相对抗的防御地位，因而从那时起他們的复灭是不可避免的了。从那时起巴黎的起义就純粹是无产階級性质的了。在那以前，許多资产階級的拥护者还拿不定主意是否應該倒向无产階級这边来，但从此以后，他們让无产階級孤軍繼續作战了。

一九一七年三月七日彼得堡起义的情况同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巴黎起义的情况比起来，有多大的距离啊！这次俄国的革命是由革命委员会布置的，它把工人階級和士兵組織了起来，号召他們襲击政府；当时政府設在彼得堡，像一八七一年巴黎的梯也尔一样，背后没有什么力量。但是可以断言，要不是整个帝国的局势远比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对布尔什維克更为有利，即使立刻占領首都的一切权力崗位，也不会决定他們的胜利。当克倫斯基像以前梯也尔逃往凡尔赛那样逃到加茨契納的时候，他无法指望任何农民来拥护他。农民以及与农民有关的在俄国的武装起义，都倒向在首都执掌政权的革命党人。这就使他們的制度有了力量并带有永久的性质，而这是巴黎的制度所沒有能够得到的。另一方面，这也就产生了巴黎公社所沒有的反动的經濟成分。巴黎的无产階級专政决不是像俄国那样以农民代表苏維埃为基础的。

^① 杜布勒伊：《巴黎公社》，第 283 頁。

工人代表會議和中央委員會

巴黎公社和蘇維埃共和國的出發點是根本不同的，它們的組織和所用的方法也同樣大相懸殊。固然，巴黎公社的組織也許可以很容易同工人和士兵代表蘇維埃相比。固然，巴黎公社處于與俄國革命相類的地位，因為像俄國的情況一樣，在它之前是一個專制政體，這個政體禁止各種公開的群眾政治組織，並且在它垮台之前不久還禁止了工會的組織。正如俄國工人在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的情形那樣，法國工人在一八七〇年九月四日以後也沒有強大的政治和工會的現成組織使他們能夠作團結一致的鬥爭。我們已經知道，正是這樣的一個原因，促使馬克思如此真誠地希望工人們首先利用新共和國來進行自我組織和自我教育，從而使它有充分的準備作為一個統治權力來發揮作用，而不是在小小的前哨戰中浪費它的力量，因為那種前哨戰即使在最有利的情況下也決不會給與他們任何悠久的統治權。但是，既然他們是通過強加在他們身上的鬥爭而不是依靠一場簡單的前哨戰來掌握政權的，他們就必須在沒有任何政治組織和工會組織的情況下，謹慎小心地提供一種他們在手邊找到的代替物。對於俄國工人來說，就可以在大工業的組織中找到這種代替物。

“現代的工業已經把宗法性的師傅的小作坊變成工業資本家的大工廠。擠在工廠里的工人群眾就像士兵一樣被編制起來。他們是產業軍的小兵，受着整批士官和將校的層層監視。”^①

工廠中的“產業軍小兵”只須用他們自行選擇的相類的軍官來代替資本家安排在工廠里擔任指揮的士官和將校，從而工廠中的組織就實際上變成了工廠工人的一個親密的組織。這樣，在俄國的無產階級中間便產生了工人代表蘇維埃這樣的機構。同比俄國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35 頁。

先进的国家的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相比较，这些工人代表苏维埃并不是无产阶级组织的任何较高的形式，而不过是聊备一格的权宜之计。可是巴黎的工人却没有这样的办法。巴黎的工业大部分是为有闲者服务的工业，而不是为大众服务的工业。甚至到了第二巴黎公社的时期，因为几乎完全没有工业资本家的大工厂，“宗法性的师傅的小作坊”还占首要地位，这同俄国的、特别是圣彼得堡的工业的情况恰好相反。俄罗斯帝国在其工业薄弱和产业工人与农民相比人数不多的方面表现出它的经济落后性。然而，不管所存在的是怎样的资本主义工业，它总带有近代大规模生产的特征。巴黎工人那时缺乏群众的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不得不提供其他某种代替物，而这种代替物就是国民自卫军。一七八九年的革命所造成的结果是武装了法国各地、特别是巴黎的人民。这种武装起来的行动起了双重的作用。下层阶级、即无产阶级和中小阶级武装了起来，并自行编制作好起义的准备。革命没有带来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而且受当时条件的限制，也没有这种可能。这样才产生出他们那种不可遏制的冲动，想用武装起义来把革命更推进一步。当时的局面对于资产阶级、资本家和富裕的中产阶级以及生活十分舒服的知识分子来说，却又是另一种情况。一七八九年的革命恰恰给他们带来了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他们把自己武装和组织起来，以便保卫他们的胜利成果，同时他们实行两面作战——一方面反对那些力求恢复旧的封建专制统治的反动势力，另一方面反对那些急不及待地想要实现自己的目的并向前推进的下层人民。他们的武装组织就是国民自卫军的组织。资产阶级一直是革命斗争中的胜利者，同资产阶级在一起的国民自卫军被建立成为保护有产阶级的机构，他们自行提名军官，并具有对政府而言的某种程度的独立性。

从一八三〇到一八四八年，国民自卫军在七月君主政体下达到了举足轻重的最高峰。然而，它无法挽救那个政体，并且在一八四八年证明是很不可靠的。拿破仑第三在其政变以后，剥夺了

国民自卫军的独立性、即自行选举军官的权利，但他不敢完全把它解散。于是发生了一八七〇年的战争和迅速的败北。祖国又处于危险中，又激起了一七九三年的精神，以便通过全民的武装起义用“集体发动”的办法来继承战胜欧洲的传统。迫于这种形势，巴黎的立法机关在八月十一日根据茹尔·法夫尔的提案，宣布一项法律，规定把国民自卫军从一个公民自卫军变为全国国民都必须参加的普遍自卫军。除了原来从有产阶级召来的六十个营的国民自卫军以外，又加上从那些比较贫苦的阶级召来的二百个新营，他们甚至有权提名他们自己的军官。这样，巴黎的国民自卫军的新营实际上成了无产阶级的组织，规定扩大国民自卫军的整个法律确实是由于突然的惊恐而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做父亲的害怕他们的孩子们，所以他们决定竭尽一切力量不让这些孩子增加实力。但他们无法阻止巴黎无产阶级武装自己；不过，在特罗居指挥下的巴黎军事当局疏忽了本来可使国民自卫军发展成为有战斗力的部队的一切办法。他们就这样地出卖了祖国，因为他们害怕巴黎工人胜过威廉的军队。在巴黎，在开始被围的时候，有十万军队，另外还有十万名警卫队。假定三十多万国民自卫军中有二十万名宜于服现役，那合起来就是一支四十万人的大军。德国人在没有进入巴黎之前，对于这样的大军恐怕连一半都不容易对付，而且这支大军散布的面积非常广阔。但是从八月以后，国民自卫军有充分的时间实行整编。因此，巴黎的当局可以指挥大部分的军队来抗击德军。如果他们能够在任何一点突破包围巴黎的铁圈，德军获胜这场战争的希望就很渺茫。但是，只要国民自卫军能够立刻在军事上组织起来，上述的那一点本来是可以办到的。在这可以办到的事情面前，他们却害怕起来了。他们宁可打败仗，宁可拱手把亚尔萨斯—洛林让给敌人。这就是巴黎人心里所感到的事情，因此才产生出他们对那些出卖了法国的统治者的无比愤怒。当巴黎已经投降，整个议会已经改选，并且当议会对共和国和首都的憎恨已经使人十分生气地暴露出来的时候，巴黎人知道他们陷入了一场严

重的斗争。他们能够依靠的唯一的力最就是国民自卫军。属于革命方面的几个营在被围期间已经彼此保持紧密的联系。他们这时参加了一个同盟。因此他们被称做同盟派。二月十五日，革命营的代表初次聚会，以便讨论同盟的事情。他们指定一个委员会来起草章程，预备在二月二十四日提交新的会议；但这个会议担心德人入侵，情绪激昂，不能静下来仔细讨论。他们宣布休会，以便在巴士底广场参加革命的示威游行。在以后的几天，成立了国民自卫军的临时中央委员会；鉴于德国人的入侵迫在眉睫，同时为了防备恐慌，成立这种委员会是十分必要的。直到三月三日，代表们参加的会议才大致成为一个确定的组织。会议决定设立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由巴黎的二十个区各推代表三人组成。三人中间的二人由军团的委员会推选，第三人由军团的营长推派。三月十五日，被推选为确定的中央委员会的人员举行会议，从而解散了直到这时为止始终尽其职责的临时中央委员会。既然中央委员会是从国民自卫军中推选出来的，因此人们可能认为这个委员会是一个士兵代表会议；但它是从无产阶级以及从那与无产阶级关系密切的国民自卫军中推选出来的，因为有闲阶级的营没有参加这些协议。根据中央委员会所得的情报，在三月十八日，巴黎国民自卫军的二百六十个营中，拥护它的有二百十五个。因此，到这时为止，它是一种工人代表会议。所以人们很可以把它同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的中央委员会相比拟。然而，巴黎公社却决不是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当政府在三月十八日逃走以后，公职的位置空着。这自然就落到中央委员会的身上，因为这是在巴黎普遍受人尊敬的唯一组织，虽然它的全体委员都不是知名人物。他们在三月十日举行会议，以便商讨应该着手进行的事项。像通常会发生的那种情况，他们这时如果把问题说成是两面兼顾的问题，也许格外中肯，但他们却把问题看作只能顾到一面，走这一条路就不能走另一条路。于是，那些社会主义者就一再讨论究竟应该实行改革还是应该实行革命的问题，而不是说争取改革的斗争和争取革命的斗争应该这

样来领导,使这两种运动与其說是互相排斥,还不如說是互相补充。

三月十九日,中央委员会的一部分委员要求向凡尔赛进军。其他一些人想要立刻就地向选民呼吁,还有一些人则希望首先采取革命手段。仿佛这些步骤的每一项都不是同等必要的,仿佛其中的任何一项都会排斥其他的步骤似的!中央委员会决定首先只采取这些步骤中的一项,即似乎是最迫切的一项。它企图表明它可以找到大多数的选民来支持巴黎起义,并且希望借此为这起义获得声势最浩大的道义支持。这是十分正确的;不过,如果利用革命实力巩固大选的道义权威来反对敌人,情况就会更加有利,因为敌人本身也无疑地正在企图得到军队的支持。根据帝国至今不让巴黎人享有的普选的原则立即选出巴黎的公社行政管理机构,当然是不可避免的。在帝国于一八七〇年九月崩溃后不久,巴黎的工人就从新的临时政府获得保证,答应马上要进行公社的选举。这个诺言没有兑现,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被围期间发生的混乱。十月三十一日和一月二十二日的两次起义是在“公社万岁”的呼声中发动的。因此有必要立刻造一份公社选民的完整名册。先是规定在三月二十二日,以后又规定在二十六日。中央委员会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暂时负责的机构,准备让位于那些根据平等的普选原则选出的人们。在三月二十日《法兰西共和国关于公社的公告》中,给了巴黎的公民们如下的通知:

“請你們在三天之內完全自由地选出巴黎区代表的成员。那些由于必要而已经掌握政权的人,这时将把他们的临时权力移交給人民中間已经当选的人们。”

但是他们并没有遵守他们的诺言。在公社成立以后,中央委员会在三月二十八日把它的权力给了那个团体。它甚至表示要完全解散;但公社没有坚持这一点,所以这个中央委员会继续作为军事机构的一部分,在公社下面发生作用。这并不能有助于开展工作或指挥战争。但是中央委员会从来不想推翻最高权力属于由普选产生的人们这一原则。这个中央委员会从来不主张一切权力应

当归于工人和士兵代表會議，那就是說，在目前的情况下，归于工人营的中央委员会。所以，在这一点上，巴黎公社也同俄罗斯共和国恰恰相反，然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一八九一年三月十八日、即巴黎公社二十周年写道：“先生們，你們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嗎？請看看巴黎公社。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①我們知道，在专政的名称下，馬克思和恩格斯是无论如何也不懂得抑制平等的普选和镇压民主的行动的。

巴黎公社中的雅各宾派

在三月二十六日选举时，公社选出了九十個委員。这些委員中間包括十五个政府支持者，六个反对政府但又譴責起义的公民激进分子。一个苏維埃共和国是不会让这种反革命分子出来充当候选人的，更不必說是当选为委員了。公社却出于尊重民主的动机，决不妨碍它的政治反对者的被选举权。如果說他們在公社中的活动突然結束，这是他們自己的过錯。和他們相处的一伙人不合他們的胃口，因此他們很快就离开了。事实上，有些人在候选人开会以前就悄然引退，其他的人則在公社成立的几天之內辞职。这些辞职以及选举人的某些要求，使改选成为不可避免的事，于是在四月十六日实行改选。公社絕大多数的委員贊成起义。而且，在公社的革命成員中間，并不全是社会主义者。大多数人不过是革命者。他們多半只受一七九三年規定的原則和雅各宾派的傳統的指導。其中有些人，例如德勒克呂茲和皮阿，已在一八四八年对“山岳派”表示过忠誠，也有不少人由于政治斗争而被迫脱离他們私人的职业生活，变成了职业反叛者和革命家。其中較老的成員按照过去的傳統生活，对于新的发展和想法并不真感兴趣。

“其他的委員年紀較輕，多半是喜欢用武力而沒有任何健全基

^① 恩格斯：《〈法兰西内战〉德文版序言》。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論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6頁。——譯者

础的人。他們往往只是口头上的英雄，这时正在玩弄着起义，正如他們在几个月前曾經玩弄过战争一样——这些人話讲了一大堆，并且仅仅滿足于高談闊論。他們的革命思想只以外表为限。他們是淺薄的，連他們中間最出色的人也只是受感情而不是受理智的支配。”^① 这是那位偉大的革命家杜布勒伊对这些人的批評。

他們大多数人不懂得什么叫社会主义。他們有不少人直接反对社会主义，尤其是德勒克呂茲。按照他們根本代表有产階級的利益这个意义來說，他們很可以称为資產階級政治家。相反地，他們却同下层階級站在一起，并且像一七九三年的“山岳派”那样尽力为下层階級而奋斗。但正像“山岳派”一样，他們无法逃避屬於資產階級的财产和特权問題，并且由于这个緣故他們可以說是已經形成了一个資產階級的成分。这句话可以适用于公社中的大多数革命者。其中只有少数人是屬於工人階級的。他們中間有普通官吏、药剂师、投資者、律师，特别是新聞記者。布朗基派和雅各宾派不同，他們一共有七个人，但其中布朗基本人当选后却没有能够出席會議。这表明布朗基派是多么不希望发动三月十八日的起义，因为布朗基在起义爆发前不久，为了恢复他的健康，已經离开巴黎。三月十七日，他在洛特省的菲加斯城被捕。布朗基在有一点上是同意雅各宾派的意見的，即同意他們通过巴黎下层階級的起义以統治巴黎、然后依靠巴黎用武力統治全部法国的努力。但是他們比雅各宾派更前进了一步，因为他們看出这种統治的方法不足以解放被剝削者，除非那个政府能够被用来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秩序。換句話說，他們是社会主义者。可是在他們的方面，最受他們重視的經常是政治的利益而不是經濟的利益。他們沒有研究过經濟生活，也不想获得任何有系統的經濟知識。他們一再为无知作辯解，說他們想要完全不受教条的拘束，从而暴露了上面所說的那种特征。他們不想被偏見和“学究式的討論”弄得“手足无措”。

^① 杜布勒伊：《巴黎公社》，第 332 頁。

他們說，当无产階級執掌政权时，它馬上就会知道它該怎么办了。他們最关心的就是要让无产階級获得政权，并且他們认为正在准备的起义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

然而，他們非常不幸，因為他們周密地准备的起义总是归于失败，而一次成功的起义又是事先沒有准备。此外，布朗基派的理論并不強調知識的重要，而只是滿足于当前的行动。事实上，这种理論对于活动家來說是极大的吸引力的。但是，尽管有这种事实，更容易接受这种理論的倒不是工人，而是知識分子，特别是学生。

下面是构成当时布朗基派的成分的一覽表。一八六六年十一月七日，布朗基派在巴黎一家咖啡店举行的秘密會議突然为警察破获，参加會議的成員几乎全体被捕。他們一共有四十一个，每人都报了职业。这些人中包括十四个技工、四个店員、十三个学生、六个新聞記者、一个律师、一个工头、一个地主、一个独立的商人。学生的人数本来远不止这些，但是在十一月十七日假期还没有結束，所以有許多学生不在巴黎。

这个會議可以帮助我們了解布朗基主义，不但了解它的組織方法，而且了解它的目的。一八六六年九月，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在日内瓦开会，布朗基派被邀出席。布朗基拒絕了，但是有两位选出的代表、即律师普罗托和雇員烏姆貝尔却去参加了。結果在布朗基的集团里引起了极大的騷动；因为，按照这个集团的傳統，独裁的权力不仅屬於无产階級，而且屬於他們的政党的領袖。这两种独裁是密切相关的。自从布朗基派的組織成立以来，党的領袖的命令还是破天荒第一次沒有被服从。直到那时为止，他們都是盲目服从的，甚至以后他們也还遵守这个原則。因此在十一月七日举行了一次會議，以便对普罗托进行譴責；但这次會議还没有得出結論就被解散了。能够逃走的只有极少数人，其中就有普罗托。我們已經說过，其余的人都被捕了。^①

① 沙利·达·科斯塔：《布朗基派》，巴黎，1912年，第17—22頁。

在公社的布朗基派中，又出現了律師普羅托，以及那批在十一月七日被捕的成員中的兩位。他們是律師特里東和學生里果。在其他當選的人中，有律師和醫生布朗基（他先後攻讀過這兩門學科）、藥劑師愛德、會計員費烈。在整個布朗基派中，只有一個工人，即銅匠夏爾東。在選入巴黎公社的國際工人協會的成員中，有兩個人是同布朗基派有關係的，他們是鐵匠杜瓦爾和學生瓦揚。我們看出知識分子在他們中間占着多大的比重。甚至在公社本身內部，雅各賓派也像布朗基派一樣，不大注意經濟問題。對凡爾賽的戰爭，維持巴黎的秩序，對教會的鬥爭——這些才是他們用全部精力來處理的問題。像對凡爾賽的軍事鬥爭和對巴黎的凡爾賽同伙的治安鬥爭一樣，對教會的鬥爭也是利用暴力，通過對人身和表面現象的攻擊來進行的。

國際工人協會和巴黎公社

巴黎公社中的第三個集團是由國際工人協會的成員組成的，他們有十七個人，幾乎是清一色的蒲魯東主義者。蒲魯東主義同布朗基主義和雅各賓主義形成鮮明的對照。按照蒲魯東主義，一七九三年的恐怖統治是應當避免而不應當仿效的。它十分清楚地看出了這種統治的缺點及其失敗的不可避免。它了解到：無產階級單純取得政權，並不能夠改變它的社會地位；它並不能夠廢除無產階級所深受其害的剝削制度。它又了解到，如果不通過政治騷動而單單通過經濟上的改組，就能實現那種變革。因此，這就使得蒲魯東主義者懷疑布朗基主義的方法，懷疑起義和恐怖手段，並且同樣也反對民主制度。在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巴黎無產階級已經挫敗了民主制度；但它憑自己的行動有了什麼收穫呢？無產階級對於爭取政治自由和參與政治事件的越來越嚴重的懷疑，使蒲魯東主義者活躍起來。

今天，同樣的思想已經產生，並且作為社會主義思想的最新產

物、作为馬克思所沒有知道的而且也无法知道的經驗的产物被提供出来。这些思想不过是半个多世紀之前的旧的思想的变种，但它們并没有因此变得比較正确。蒲魯东主义表明了，无产階級光靠經濟改造而进行的解放政策是怎样注定要失败的。今天我們所宣傳的是，只要无产階級还受資本主义的鎖鏈的束縛，民主制度就毫无办法把这无产階級解放出来。但如果說經濟的解放必須先于政治的解放，那么由此可以推断，无产階級的各种政治活动不論是怎样的政治活动，必然同样是无用的。布朗基主义者专门把注意力放在反对現有国家权力的政治斗争上面，而蒲魯东主义者則同样专门地想要不靠国家的任何帮助求得給予无产階級經濟自由的手段。因此，布朗基派譴責蒲魯东派，說他們挫伤了工人階級对于殘酷剝削他們的第二帝国的斗争勇气。甚至馬克思都責备蒲魯东，說“他向路易·波拿巴献媚，并竭力把他說成是法国工人可以接受的人物”。^①另一方面，蒲魯东主义者却知道无产階級和资产階級間的階級对立，因为在蒲魯东主义者看来，經濟問題是头等重要的問題。他們还知道，无产階級必須依靠它自己的力量来获得自由。这一点他們比布朗基主义者懂得更多；因为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学生的政党，而蒲魯东主义者則在第二帝国的統治下在法国組織了真正的工党。

在六十年代各地工人运动由于一八四八年以后的反响而从沉睡中觉醒的时候，当国际工人协会正在組成的时候，同他們合在一起的正就是法国的蒲魯东主义者。单凭这一点，便足以使布朗基禁止他的信徒們也依附于那个組織了。然而在国际工人协会，他們逐漸懂得一种新的理論与实践，这种認識使他們格外离棄了片面的蒲魯东主义。因为恰恰就在国际工人协会建立的时候，他們的領袖蒲魯东在一八六五年一月十九日逝世了，并且在法国产生了便于繼續进行階級斗争的新的情况。蒲魯东希望发起一种不涉

^① 馬克思：《論蒲魯东》。參閱《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373頁。

及政治的純工人运动，但这种运动只有放棄一切可能同政府当局发生冲突的斗争的計劃，才有可能实现。所以他主張用十分和平的手段，即协会、交換銀行、互助保險組織等等来解放工人階級。但只有当巴黎的工业像前面所說的那样还很少带有大规模生产的性质的时候，以及从事剝削的資本家在工人看来还多半是提取一切利潤的金融資本家而并非真正的工业承包人的时候，这些想法才有可能实现。

在国际工人协会，法国的蒲魯东主义者了解到一些有关英国工业資本主义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工人运动的情况；英国工人运动所特別強調的，是經濟問題、組織他們的斗争的重要性，以及蒲魯东主义者所不願插手的工会組織和罢工。在这一套实践之上，还产生了一种理論，十分清楚地闡明了作为现代社会和社会生活的基础的規律，而这一理論是国际的多数人当时还没有听到过的，即使是那些知道这个理論的人也了解得并不正确。但是，这个理論的創造者以其巨大的优越性从精神和思想上鼓舞了国际的一切活动。在馬克思的理論中，蒲魯东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片面性也被克服了。像蒲魯东主义者一样，馬克思承认經濟关系是头等重要的，并认为如果这些关系不加改变，無論何种政治的变革都不可能解放无产階級。但他仍然看出，要想推翻資本的統治，要想通过經濟变革实行无产階級的解放，掌握国家权力和权能是絕對必要的。經濟因素的重要意义在馬克思的手里所获得的性质，和蒲魯东所說明的截然不同。据馬克思看来，經濟不是使政治成为多余，而是使它成为必不可少的。政治斗争及其影响的性质与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有賴于經濟問題的解决。但是他知道，經濟条件本身形成一种不断发展的过程，这种过程使得一項政治的效果在今天是不可能得到的，明天是必然会得到的，虽然在昨天看来是不可能得到的。对他來說，經濟和政治的关系在于研究各种經濟情况和趋势，并力图使政治目的和方法同它們相适应。另一方面，布朗基主义者和蒲魯东主义者却完全忽略了历史的方面。他們的主要努力不是要

在任何特定的时刻从一种經濟观点找出可能的和必然的途徑，而是要找出那种在一切条件下、在一切历史的和經濟的情况下都能产生預期效果的方法。如果那些社会主义者已經找到正确的途徑，他們就能如願以償地实行他們的社会主义了。当时人們相信，这些思想已被馬克思主义所代替，但我們发现这些思想甚至在今天还存在着。我們又在莫斯科和布达佩斯看到这样的一些人，他們不是探究在目前經濟条件下能够而且必須采取什么策略，而是从这样的論点出发，即：既然无产階級希望获得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就有責任实行他們的社会主义，不論当时当地他們是否有能力这样做。他們的責任不是在于审查这个計劃是否可行，可行到什么程度，而是在于发现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点金石、即社会主义在一切条件下和一切情况下都能提供的万应良药。今天人們相信这个問題已被在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上宣布的专政所解决。在法兰西第二帝国，布朗基主义者想要在一次暴动中发现点金石，蒲魯东主义者想要在交換銀行中发现点金石。

甚至在今天，馬克思还很少被人所了解。他要求具有远为巨大的精神力量，要求把个人的欲望和需要放在远为次要的地位。可是，一般說来，他和恩格斯所采取的目的、途徑和方法是成功的，因为合乎邏輯的事理在他們的一边。結果，馬克思主义的思想逐漸在法国国际成員的心中代替了蒲魯东主义的思想。当工人运动重新在法国兴起的时候，工会組織和罢工就立刻成为不可避免的了。第二帝国力图把这个运动引上合法的和非政治的方向，在一八六四年核准組織工会，并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的同一年准予实行罢工。这个国际的成員，包括蒲魯东主义者在内，不得不参加这一自发的工人运动，而且他們既然是工人階級經濟利益的最好的代表，也就为形势所迫，不得不起来領導工人組織和工人运动。他們从而不可避免地同政府当局发生冲突，并在这一方面卷入政治斗争，卷入反对帝国的斗争。法国国际成員的思想开头本来是带有蒲魯东主义的性质的，这时在上述情况的影响下就越来越带有

馬克思主義的色彩。可是，在巴黎公社的起義爆發的時候，他們沒有一個人可以說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已經失掉舊日的蒲魯東主義的基礎，但還沒有取得新的立足點。他們的思想還缺乏鮮明性。雖然如此，他們卻不失為不辭勞瘁地考查經濟生活並深切了解當時迫切需要的公社委員。他們成為巴黎公社中真正的工人代表。利沙加勒談起他們時說：

“人們說過，公社是工人階級的政府。這是很大的錯誤。工人階級參加鬥爭、參加行政管理，光是他們的气息就使運動非同尋常；但他們很少參加實際的統治。三月二十六日的選舉只給了工人二十五票，那些革命家卻得了七十票。”^①

但是，這二十五個人中的多數、即屬於國際的十三人，在公社里卻總共只有十七個代表。只有四個國際成員不是工人成分，並且其中有一個人、即學生瓦揚傾向於布朗基主義。在國際成員中間屬於工人集團的十三個委員中，有一些是公社的最重要的人物，他們是：釘書工人瓦爾蘭、木匠泰斯、油漆匠馬隆和珠寶匠弗蘭克爾。按照他們的黨的观点，他們把一切直接行動、戰爭的指揮以及警察力量的組織都交給雅各賓派和布朗基派，而把注意力轉向和平問題、各區的行政管理以及經濟改革。其中只有一個人、即五金工人杜瓦爾表現了幾分好戰的精神，並且像我們所知道的，他同瓦揚一樣，也是傾向於布朗基主義的。他和公社的其他一些人在四月三日暴動時被俘，由維努亞將軍下令槍決。所以他是巴黎公社第一批烈士中的一個。

他的屬於國際的同志們幾乎完全限於注意經濟問題，在行政管理方面作出了異常卓越的成績。例如，泰斯在郵政安排上、瓦爾蘭和阿夫里阿爾在其他重要的領導崗位上就是如此，雖然當時存在着由這樣的事實引起的巨大困難，即：較高的官吏逃離巴黎或至少離開他們的崗位之後，工人階級必須一下子接管並繼續進行他

^① 利沙加勒：《巴黎公社史》，第二版，第145頁。

們所完全不熟悉的工作。除巴黎公社中的国际成員之外，巴黎国际支部还有其他的成員在工作上也相当成功，例如，銅匠卡麦利納在四月間接管造币工作，在短短的几星期內就有了很大的改进，这个工作在公社瓦解后还繼續維持着。另外还有領導关税工作的巴斯特利卡和間接稅行政委員孔博尔。他們都是工人。

公社方面的第一批行动之一，是把执行委員會所屬各区交給一些專門委員會，而不是交給个别的部长。劳动、生产与交換委員會也就是代表公社的社会主义方面的委員會，其中有国际成員馬隆、泰斯、杜邦（制籃匠）和阿夫里阿尔（机器匠）、日拉丹。日拉丹是唯一的一个雅各宾派，他的职业我无从查考。在財政委員會的五个委員中，有三个是国际成員，他們是油漆匠維克多·克雷芒、瓦尔兰和相当有錢的慈善家貝雷——国际成員中极少数的有产者之一。除这些人以外，还有雅各宾派列日尔，他是一位兽医，但却是一个反对帝国的老战士；另外还有出納員茹尔德，他沒有具体的傾向，是財政方面的实际首腦，有好几百万法郎必須在他的手里經過，一方面他的妻子繼續在塞納河边替人家洗衣服來維持家庭，另一方面他自己每頓飯的餐費从来沒有超过一点六法郎。在这主管劳动和財政的两个委員會里，所用的方法与主管軍事和治安的两个委員會大不相同。这些方法的显著的差別，門德尔松在其所写的利沙加勒《巴黎公社史》（德文第二版）的附录里說得很清楚：

“公社的軍政部門手頭沒有什麼令人滿意的办法。我們在这里看到无能、无知、浮夸、缺乏一切責任感等等。我們在这里看到社会主义运动在帝国时期必須因此遭受損失的一切不幸的混乱局面的反映，并且我們只要从万多姆廣場走到警察厅长的官署，就能看到这种局面的第二个反映。

“當我們再走到劳动部和交換部去的时候，我們当然看出从那些組成当时警察厅參謀本部的新阿伯尔派的妄自尊大的囂張气氛轉变到另一种和平的气氛。那个名称本身就显示出蒲魯东主义学說的影响。可是，除此以外，国际工人协会的誠实而謙虛的成員却

埋头工作，拋棄一切不可能實現的希奇古怪的想法。由於他們把自己看作工人階級的一個委員會，他們並不想從命令和領章上尋求他們的權力的證據。他們構成了一個由工會和工人委員會的成員中產生的委員會。因此，這個部十分有效地進行它的工作，以致人們很可以說，它根據當時的情況做了它所能夠做的事情，而從來沒有着手去做任何不可能實現的事情。”

在這個部里，社會主義者是相當集中的。它在性質上是馬克思主義的。它代表了公社中實際革命的成分，但它表現了一種十分令人詫異的審慎態度。這種審慎的態度在財政部也可以看出，而所以採取這種態度的理由則由茹爾德在辯論當舖問題時作了說明。當時曾發布命令，凡典當的衣服、家具和用具價值在二十法郎以下者，從五月十二日起無償地退還原主。這筆費用由國家補償。在這次辯論過程中，阿夫里爾提議，應設立一種更好的工人的機構以代替這些當舖，對此茹爾德回答說：

“他們說要組織一個機構。這個建議很好。但我們必須首先要有時間把問題研究一下，方能採取任何行動。如果阿夫里爾被委託製造大炮，他一定會要求給與較多的時間。我也会提出這樣的要求。”^①

公社沒有時間對社會問題做任何大規模的工作，而他們中間最幹練的人也不願不先把問題徹底研究清楚就貿然着手做任何事情。他們的社會對策在今天看來似乎多半是瑣細的。例如，取締麵包房夜班制和禁止任意罰款與非法克扣職工工資的決議，就是如此。最重要的決議從來沒有超過單純調查研究的範圍。在被圍期間和三月十八日以後，巴黎有許多工場由於業主逃亡而停止生產。根據阿夫里爾的建議，曾為工人階級對這一十分嚴重的問題進行了調查，並作出如下的決定：

“鑒於許多工場被拒不履行自己公民義務和不願考慮勞動者

^① 5月6日的會議，5月7日的《公報》，第493頁。

的利益的企业主所遺棄；由于这种卑鄙的潜逃，許多对于城市生活很重要的企业停工了，从而对于劳动人民的生活造成了損害，公社茲宣布：

“召开工人工团會議，成立一个調查委员会，其目的为：

“(1) 調查被遺棄的工場，精确地說明这些工場的現况，并将工場中使用的劳动工具列一財產清单；

“(2) 編写一份报告，内容为叙述尽速使这些工場开工的实际措施，当然不是使用遺棄这些工場的潜逃者的力量，而是使用在这些工場中工作的工人生产协会的力量来进行这项工作；

“(3) 拟訂这些工人生产协会的章程草案；

“(4) 成立仲裁法庭，在上述业主归来时，应由仲裁法庭裁定将工場最后轉交給工人生产协会的条件，并裁定这些生产协会应付給业主的抵偿数额。該調查委员会应向公社的劳动与交換委员会提出报告，劳动与交換委员会的任务則是在最短期間內向公社提出符合于公社和劳动者利益的法令草案。”^①

这个法令注明的日期是四月十六日，由《公报》于四月十七日公布。

該調查委员会在五月十日和十九日举行會議。不久以后，公社即告失敗。因此該实行社会主义的委员会沒有作出实际的成績。虽然如此，它的組成却是重要的，因为它表明了，如果无产阶级政权能有更长的寿命，公社的社会主义者将被迫采取什么道路。把资本主义企业的整个体系彻底加以社会主义化或立刻加以消灭，那是不成問題的。但是，这些人却受人譴責，說他們如此怯懦地放棄了他們的工場，让工人們失业。同时，他們还紛紛受到相反的責备。

二十个区的中央委员会（不应同被圍期間組成的国民自卫軍中央委员会相混）表示不滿，說雇主們把工人留在工場，因而使他

^① 参閱《巴黎公社会議記錄》，第一卷，商务印书館 1961 年版，第 268 頁。——譯者

們無法履行國民自衛軍成員的義務。只有那些被業主遺棄的企業才應該首先按照公社的計劃實行社會主義化；就是這些企業也須經過審慎而周密的考慮才能實行。社會主義化方面的另一步驟的計劃與被服和軍火的供應有關。這些供應儘可能通過工人生產協會在供應協議書的基礎上進行，而這種協議書是要由廠長會同國民自衛軍和勞動部一起擬定的。我們手頭有一份由工人們呈送給公社的勞動規程草案，這個草案涉及從事修理武器的工場，並要求規定十小時工作制。這個規程包含約二十二條，刊印在五月二十一日的《公社公報》上（第 628—629 頁）。它很好地說明了公社的社會主義工人的社會主義化的傾向。按照這個規程，工人們選舉了他們在公社中的自己的工場代表、他們自己的場長以及他們的工長。由上述人員組織一個管理委員會，每一工作台上的任何工人有事均得向該委員會聯繫。在公社方面，則規定組織一個監督委員會，按時聽取各工場的工作報告，並得隨時檢查簿籍賬冊。工人們看來是十分熱烈擁護公社的利益。第十五條規定每天工作十小時，而不是像一八六六年日內瓦國際代表大會所要求的那樣為八小時。在特殊緊急情況下，如經管理委員會同意，並得延長工作時間。對於加班加點，不額外付與報酬。除此以外，當時的工資很低。廠長月薪二五〇法郎，經理二一〇法郎，工長每小時七十生丁。對於普通的工人，沒有規定最低工資額，但卻規定了最高的工資。他每小時的收入不得超過六十生丁。同樣有意思的是，第十六條規定夜間在工場里經常要有人值班，以備公社前來提取武器。每一個工人都必須輪值夜班。這個決定的原文如下：

“在目前情況下，絕對有必要盡量節約公社的每一分錢，所以夜間的值班人員不付報酬。”（《公報》，第 629 頁）

的確，這些工人並沒有把他們的“獨裁”時間當作要求增加工資的湊巧的時機。在他們看來，爭取幸福的共同的偉大事業理應放在他們自己的個人利益之上。

公社的社会主义

尽管馬克思脾气暴躁，他却并不认为这些小心謹慎的办法有哪一点是他所不能同意的。他在《法兰西内战》中說：

“公社的偉大社会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就是它的工作。它所采取的某些措施，只能表明通过人民自己实现的人民管理制的发展方向。”^①

在馬克思如此說明了无产階級专政是通过人民自己实现的人民管理制、即民主制度之后，他接着贊揚公社所采取的財政措施是“很审慎溫和的”^②。

馬克思在这同一本著作的前几頁，指出了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期必須遵循的原則：

“工人階級並沒有期望公社作出奇迹。他們並沒有想 *par décret du peuple* [靠人民的法令] 来实现現成的和完滿的烏托邦。他們知道，为了得到自己的解放，为了达到現代社会由于本身的經濟发展而总是要达到的那种更高的形式，他們必須經過长期的斗争，必須經過一系列把环境和人都完全改变的历史过程。工人階級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使那些在旧的正在崩潰的資產階級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自由发展。”^③

根据“工人階級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这句话，有人曾經得出結論，认为馬克思沒有給社会运动規定确切的目标和具体的綱領。但这个說法却被这样的事实所駁倒了，即：他本人起草了从一八四七年的《共产党宣言》到法国工党綱領发表时为止的若干社会主义的綱領，而法国工党綱領是他同盖得和拉法格在一八八〇年共同

① 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論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66 頁。——譯者

② 同上书，第 67 頁。——譯者

③ 同上书，第 62 頁。——譯者

写成的。在上面引述的那段文章中，他已經举出社会运动的目标，即：用胜利和逐步进行的阶级斗争来解放工人阶级，创造一种随着工人阶级掌握政权而来的、以现代科学成果为基础的较高的生活水平。

人们可能会提出自己的意见来反对马克思说，这些目标不过是一些理想，因此工人阶级还是有理想要实现的，但是在当时不可能实现的理想之中，马克思清楚地懂得像处于时间和空间范围之外的一切超越的思想，例如关于永恒的正义和自由的思想。工人运动的目标是由当时正在进行的经济发展所规定的。实现这些目标的特殊形式处于不断发展的状态中，并且事实上取决于时间和空间。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并不是现成的乌托邦，而是一个保证经济关系和工人阶级本身将有长期发展的过程。这种发展在政治胜利以后是不会结束的，但只有通过使“新社会因素”获得解放的办法才能继续。

早在二十年之前，马克思就规定了工人阶级需要一个漫长的准备过程并了解作为社会革命必要条件的实际形势。在一八四八年革命爆发以后，他由于研究了经济条件，看出革命暂时已经告一段落。这就使他同他的许多同志发生矛盾，因为那些人只认为这是对于革命的背叛。群众有革命的需要，他们也有争取革命的意愿，所以据他们说，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但马克思在一八五〇年九月用下列的话作了答复：

“少数派用教条主义观点代替批判观点，用唯心主义观点代替唯物主义观点。少数派不是把现实关系、而仅仅把意志看做革命的动力。我们对工人说：不仅为了改变现存条件，而且为了改变自己本身，使自己具有进行政治统治的能力，你们或许不得不再经历十五年、二十年、五十年的内战和国际冲突。而你们却相反地对工人们说：‘我们必须马上夺取政权，要不然我们就躺下睡大觉。’我们特别向德国工人指出德国无产阶级不够成熟，而你们却非常粗劣地向德国手工业者的民族感情和等级偏见阿諛逢迎，当然这样

做是比较受欢迎的。

“正像民主派把人民这个词变成圣物一样，你们则用无产阶级这个词来玩这套把戏。你们像民主派一样，用关于革命的空话代替革命的发展。”^①

当马克思声明反对把单纯的意志看做革命的动力这一意见时，他当然并不是说意志和所讨论的问题无关。没有意志的力量就不可能有自觉的行动。如果没有意志，也就不可能有革命，并且事实上也就不可能有历史。每一个社会运动的先决条件在于社会的努力所产生的、从深切感到的需要发生的坚强意志。但是仅有意志，决不会有什么成就。如果要使运动取得胜利，仅有单纯的意志和单纯的需要是不够的。我可以有永生的意志，这个意志也许在我的心里异常强烈，但它决不会使我免于死亡。所以，如果要使运动获得成功，意志必须限于可以实现的事项，需要必须设法保证它自己的满足。而且，凡是决心做任何事情的人，必须有力量克服任何可能产生的阻力。讨论的目的就是要辨明可能实现的事项和不可能实现的事项，作为考察实际情况的结果，同时还要指出力量的相互关系。这样，人类的各种潜在力量才能集中到当时可能实行的事项上面。这样才能避免浪费精力，才能更好地运用现有的力量和更加紧地进行工作。

然而，用这种方法辨别社会问题，却决不是容易办到的；因为社会的经济基础在不断地发展和改变，而且，社会的需要以及用以满足这些需要的手段和完成实际上可以办到的事项的力量也都在发生变化。此外，社会所包含的内容越来越广泛和复杂，并且越来越难以看透。固然，人类的智慧肯定是在增长，求知的方法也有所改进，但是人的智力并不总是发展得十分完备，能够看出目前存在的实际关系。它总想满足时代的要求。但是，只要实际的情况使这些要求不可能得到满足，人类的意向就往往出于单纯的想像，以

^① 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65页。

为这些情况具有符合他們心願的非常有利的一面。人并不願意死亡，但是对于实际情况的認識却让他知道他非死不可。然而人类的洞察力却已經設法在这些情况中發現我們在死后繼續存在的某种迹象。羅馬帝国的无产階級生活十分貧困。然而他們非常强烈地感到需要不工作而过一种快活的享乐生活；但实际的情况把这种生活排除出可能的範圍以外。虽然如此，他們的人类的本能却使他們相信按照自己所采取的方針是可以过这种生活的。

神的观念那时是使弱者变强、使不可能成为可能的媒介。它要提高人数不多的、备受虐待的犹太民族的地位，使他們变成世間的主宰。在宗教改革的时期，它要使手无寸铁的憤怒的农民群众战胜当时統治者的装备精良、訓練有素的軍隊。在十九世紀，无产階級不再相信一个能起这种拯救作用的神；但是，巴黎的无产階級在某个时期能够向整个欧洲挑战的法国大革命的情景，使人們重又相信会产生奇迹，使他們相信革命和革命无产階級的不可思議的力量。他們只需抱定决心，就能完成他們决心想要完成的事情。如果没有产生什么結果，那只是由于决心不够。对于这种唯心主义的观点，馬克思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反击，坚决认为应当考虑实际的情况。当然，这些情况当时使工人階級的解放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成为它的許多目标之一，而那些目标是“社会的現狀由于社会发展的結果而絕對抱有的”。不过，这些目标不像某种“現成的烏托邦”一样能够立刻实现。它們并没有形成一种适用于一切时代的完整的藍图，而只是产生一种新型的社会运动和发展。

所以，工人階級并不总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十分成熟，可以接受支配权的。它在任何地方都必须經過一个发展时期，才能具有这种資格。而且，它也无法选择它的执掌政权的时机。如果工人階級接受了支配权，它决不應該简单地破坏現有的生产手段。它倒是應該想法繼續利用已有的东西，按照无产階級的需要进一步加以发展，并“使新社会的因素获得解放”，而所有这一切在不同的情况下都要求完全不同的对待方法。因此，在任何特定的时候，越是

清楚地了解实际的情况并加以适当的考虑，就越是容易发现什么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在拿破仑垮台以后，当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产生时，马克思费了很多心思认真地加以考虑。巴黎的工人肯定是当时世界上最具有才智的工人。他们并不是白白地生活在世界的中心，以及启蒙和革命运动的发源地的。然而，帝国不让他们有良好的学校制度、出版自由和政治组织，并且在很长时期内也不让他们有工会组织。因此，利用共和国来更好地教育和组织工人阶级，竭尽全力来支持和保卫共和国，在马克思看来乃是当时最迫切的要求。有一个情况使得工人们不可能在那时取得政权，那就是：全国大部分的地区事实上还是农业地区，巴黎本身的市民还大部分是小资产阶级。而且，世界的历史并不取决于我们的单纯意志力。它既不能催促革命的到来，又不能推迟革命的到来。巴黎工人的起义及其在三月十八日的胜利是必然的。从此以后，人民就应当知道实际的情况允许胜利的无产阶级实现什么目的，并对这一目的集中其全部的力量。

马克思没有把废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手段看作巴黎公社那时的主要责任。他在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二日写给库格曼的信上谈到了这一点：

“如果你读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的最后一章，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下一次尝试再不应该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粉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我党英勇的巴黎同志们的尝试正是这样。”^①

这封信上没有一句话谈到社会主义。马克思宣称公社的主要责任是粉碎那时掌握在官僚军阀手中的政权。显然，如果无产阶级不在改变国家组织的同时力求实现能改善其地位的生产手段组

^① 马克思：《给路·库格曼的信（摘录）（1871年4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24页。

織的改变，它就决不能够总理一切政务。如果我们把所有这种抱有这个目的的取得政权的企图称为社会主义，那么巴黎公社里当然就有社会主义存在，不过国家社会主义和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是大不相同的。自然，那一部分是由于缺少时间。全部的起义只持续了几个星期。这大部分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即这次起义仅限于巴黎的小工业成分。由于当时的经济基础的关系，除把单独的一些工场变为生产工人的协会之外，不能有其他的作用。

把一个完整的工业部门组织成为生产和管理其专家及原料的统一体系，在当时是不可能的。如果公社获得了胜利，它也许会为自己取得全部的国家政府机器。它也许会实行铁路、矿山和铁厂的国有化。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会废除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已在邻近的德国大规模地活动着，或至少是在准备中。不过在一个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度下，它也会大大地提高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除掉缺少时间和法国经济落后而外，对于“社会主义化”还有另一个严重的障碍，即公社中人们的无知。雅各宾派和布朗基派根本不注意经济问题。像我们所已经知道的，国际工人协会会员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但就在巴黎公社的时期，他们在理论方面是不足取的。这些国际成员打算放弃蒲鲁东主义的基础，但是他们不预备走得很远，不肯有意地站到马克思主义者一边。同时，尽管他们有许多顾虑，马克思却赞成公社所采取的办法，即首先考查经济问题然后才作任何改革，而不是匆匆地发布命令，因为这样做必然达不到目的，只会造成混乱，最后使大家泄气。即使这种审慎的态度与其说是由于理论上的眼光敏锐，还不如说是由于理论上的把握不定，它却赞成马克思根据唯物主义观点认为必要的事情，即：在革命期间，我们不当仅仅接受意志的指导，而是也要接受对于实际情况的了解的指导。杜布勒伊在其《公社》一书第 419 页上把巴黎起义的这一特点解释得特别透彻：

“抛开其他阶级的反对不谈，有组织的征用的政策是行不通的，这是因为全体按日计酬的工人脑子里只有传统的社会制度的

观念，同时也因为他们没有展开任何机构或工会组织，而在整个资本主义的体制被排除以后，为了保证正常进行生产和交换，这些组织是绝对必要的。不可能靠命令来临时规定一个新的制度，特别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制度。命令和法律却只能使那些已经存在的关系有所保证。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不待时机成熟就想贸然采取行动，也许唯一的结果是使它自己的一部分最好的力量起来反对它，而不会在按日计酬的工人中间造成任何与它有利的值得重视的倾向。他们只能利用使当时存在的政治机器民主化这一借口，为总的社会准备工作铺平道路；他们就是这样办的。”

这样，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就在当时的社会水平上得到了实现。这种和巴黎公社的方法十分相像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化方法，必须成为我们今天的方法。那并不是说，必须在今天的德国采取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所采取的这种同样的方法和这种同样的审慎态度。从那时以来，已经经过了半个世纪的资本主义突飞猛进的发展阶段。所造成的巨大进步由这样的事实表现出来：那时，只有巴黎一地发动了一次并不是纯粹无产阶级的、得不到全国任何支援的起义；它必须屈服于与官僚政治和较高财政密切结合起来的占优势的土均分运动。在一九一八年，德国革命在整个帝国范围内爆发，并且它到处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德国农业人口勉强超过全部人口的四分之一（在一九〇七年为29%），工业已经有了巨大的发展，并且已经前进到在工业各部门组织职工会的地步。

一八七一年的巴黎无产阶级是从波拿巴的政权下挣脱出来的，那个政权到这时为止没有让它获得任何教育或组织的手段。德国无产阶级则在有了五十年的政治和团结经验、有了包含几百万人的政治和经济组织之后才投入这次革命的。最后，一八七一年巴黎的社会主义者正要放弃一种已经证明不能令人满意的经济理论。但他们还没有能够推断出另一种比较好的理论。德国的社会主义则能自由地运用一种理论的历史的和经济的观点以及明晰

的方法，而这种理論已由各国的社会主义者认为是最高超最出色的理論，并且由于它大大地胜过目前流行的其他任何經濟观，連资产階級也加以接受。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就能比一八七一年发展得更加迅速、更加有力，并且收效也更快。

中央集权和联邦制度

我們已經談到公社的經濟方法。但我們也已經指出，按方法这个詞的真正意义來說，这样一种方法是找不到的。巴黎公社談不上有什么經過仔細考虑和规划的方法。仅仅由于这个緣故，巴黎公社里的如此許多敌对势力才会力求合作。公社的行动方法是对立的结果，而不是一种明确的理論的结果。公社里的社会主义者本身的思想也并不十分明确，并且他們只代表少数。然而他們的精神和对事物的看法却支配着当时巴黎的經濟思想。另一方面，多数派則不大看重經濟，他們甚至自己感到比少数派更沒有把握，而对于公社的政治問題，情况就有所不同。公社中掀起的对政治問題的反对意見要大得多。这种反对严重地影响了并且几乎摧毁了公社的进行工作的能力，但由此而产生的总的傾向却逐漸找到了一个中間途徑，这个途徑是也被馬克思接受了的，正如他接受了关于經濟問題的行動方法一样。我們已經知道，公社的多数派是由雅各宾派和布朗基派所組成。當他們参加巴黎公社时，他們希望像一七九三年的情形那样能够影响法国的全部生活。他們是激进共和党和自由思想家；他們想要摧毁君主政体、教权制度以及官僚政治和常备軍的全部机器；然而，除非通过一种能使巴黎的一个中心地位成为一个强大的强制力手段的国家組織，他們就不能掌握巴黎的最高指揮权。他們忘記了，依靠中央集权而开展起来的一七九三年的巴黎公社实际上为拿破侖和帝国鋪平了道路。他們希望利用独裁权力获得救助，而沒有了解到，如果得不到严格訓練的軍隊和有組織的行政机构的支持，所謂独裁不过是徒有其名

罢了。激烈反对中央集权的雅各宾派的是蒲魯东主义者，他們十分苛刻地批評了他們事实上深为厌恶的一七九三年的傳統。他們認識到那些导致恐怖統治的錯誤的想法，知道那些想法蒙騙了无产階級，使它残忍狂暴，而絲毫不能帮助它走向自由。但是他們也同样不贊成民主制度。一八四八年的普选曾經帮助建立了反动的国民議會，并且成为帝国的主要支柱。的确，在当时法国的經濟条件下，無論独裁或民主的国家政策都无法提供立即解放无产階級的希望。社会主义者們就来探求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他們对于一般发展的思想以及民主政治在扩大政治远見、加强无产階級的組織能力、爭取无产階級的解放等方面可能起重要作用的思想是完全陌生的。就立即解放当时的无产階級这一点來說，無論独裁或民主都沒有什么办法。对于这一点，蒲魯东主义者了解得很清楚；但是他們由此得出的結論却并不高明。由于完全缺少他們所希望采取的政策，他們就觉得沒有办法着手。当时公社在某些工业区所采取的政策，給了无产階級一种完全不同于一个农业占优势的国家的国家政策所能提供的前景。民主在地方上是十分重要的；它在政府里就沒有多大意义。那些猛烈抨击国家議會、即他們称之为“空談之所”的人們，沒有发表什么言論来反对公社的空談之所和議會。自治区的主权成为蒲魯东主义者的理想。他們的思想已經在他們所认为的工业的地位上表現出来。而且，他們并不想要排除交换；因为即使在那个时候，也还存在着一些商业公司，它們的經濟重要性远远地超过了一个公社的范围。为了控制这种公司，就有必要把不同的自治区合并起来。蒲魯东主义者希望用这个办法来解放工业的无产階級和农业的法国。但他們忘記了一件小的事情，即：把国家分为若干有主权的自治区的想法也是一种国家观念，并且要想实现这个計劃，就必须推翻現有的国家，而这恰恰是无产階級想要避免的。所以，蒲魯东主义者所理解的公社的概念，是与雅各宾派所理解的概念直接相反的。在雅各宾派看来，巴黎公社是取得国家权力以控制全部法国的一种手段。在蒲

魯东主义者看来，每一个公社的主权是結束国家权力本身的一种手段。

阿杜尔·阿尔努在其所著《巴黎公社的人民和議会史》里把革命的雅各宾派和“社会主义联邦主义者”之間的这种分歧讲得很清楚。同样的几句话，不同的議会成員往往作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在一派看来，巴黎公社代表着反政府原則的初次应用，代表着反对单一的中央集权专制国家的斗争。他們认为公社代表着自治原則、各个集团的自由联合、‘民治民享的’最直接的政体的胜利；但是在他們的心目中，公社形成了与旧的行动方法毫无关联的一次偉大的社会和政治革命的第一阶段。它是独裁观念的否定。它意味着人民自己夺取政权，从而摧毁一切存在于人民之外或人民之上的权力。抱有这种感情、思想和意志的人們代表着以后称为社会主义派或少数派的那个派别。另一方面，在其他一些人看来，巴黎公社是一七九三年旧的公社的繼續。在他們的心目中，它意味着：以人民的名义实行专政，把权力大量地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安插新的人員来领导旧的制度从而加以彻底摧毁。他們暂时把那些新的人員武装起来，去进行一場为人民服务以抗击人民之敌的战争。

“在这权威派的人們中間，中央集权的单一国家的观念並沒有消失。如果說他們接受地方自治和各派自由联合的原則，并且甚至把这原則写在他們的旗帜上面，他們这样做只是因为迫于巴黎的意志。他們仍然是旧习惯和旧思想的奴隶。当他們掌握了权力，他們就立刻恢复他們的旧习惯，并且肯定是抱有最善良的意願，让自己对新的思想运用旧的方法。他們沒有了解到：在这种情况下，后者总能在斗争中获得胜利；那些想靠独裁或單純的专横来建立自由的人們，通常只会摧殘他們所要拯救的东西。这一个包含着各种各类成分的派别构成了多数派，他們被称做‘革命的雅各宾派’。”

杜布勒伊在引述这些評論时說，它們只談到两个极端的傾向。

这话是对的。同样正确的是，在所有这些倾向中，可以发现许多不同的意见。而且，如果我们想要清楚地了解它们，我们就必须注意最显著的特征，仿佛那是典型的特征似的。当时存在的反对力量是巨大的。如果巴黎公社获得胜利，恐怕也不会能够把它克服。但巴黎公社没有取得胜利，这就迫使那些互相竞争的派别想出某种新的方针。从四月三日起，公社发现自己处于守势，并且不得不放弃征服法国和加以统治的打算。这样，雅各宾派的一切希望都成了泡影。他们不再希望通过巴黎公社实行统治，只要他们仅仅能够不让反动的法国来粉碎巴黎的新获得的权利，他们也就心满意足了。但是在这些情况下，不但蒲鲁东主义者的梦想不能实现，就是法国陷于崩溃而各个自治市都获得完整的主权这一想法也同样落了空。主张中央集权的雅各宾派，像主张联邦的蒲鲁东主义者一样，为形势所迫，不得不致力于同一目标，而这一目标在形势有利的情况下是可以实现的，并且它对法兰西全国非常重要，甚至是法国的许多公民和政治家所要求的。这个目标就是：地方自治，它们在国家民主制度所划定的范围内享有独立自主的权利，限制国家官吏的权力，设立民兵来代替常备军。国际工人协会的成员格外愿意承认这个民主国家，因为，像我们所已经知道的，他们在最近那几年被迫同帝国进行斗争，因而被卷入一个国家政策，并且已经开始推行夹杂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严格的蒲鲁东主义。

最后的结果是确定了一项政策，如果马克思在巴黎，他自己也会承认和核准这个政策的；但他不会参加两派中间的任何一派。他是会十分孤立的。尽管如此，形势的力量以及那些认真考虑实际“局势”而不为“单纯的意志”所驱策的公社优秀人士的智慧，却终于制定了一条方针政策，这个政策看来同马克思本人的政策十分相似。门德尔松的评论（见利沙加勒著《巴黎公社史》附录，第525页）对于这个政策比对公社的经济措施要合适得多：“公社的创立者似乎并不知道他们已经创立了什么东西。”

巴黎公社在最激烈的国内斗争中刚建立起来的政治程序是按

照两个极端之間的路綫进行的。公社所遭受的极大不幸是它的缺乏組織。巴黎无产階級当时还刚刚摆脱帝国的束縛，那种路綫是它的缺乏組織、办事規程和能力的自然結果。巴黎公社从一开始起，就同凡尔赛处于战争状态。没有什么地方比在战争中更需要組織和紀律了。公社却完全缺少这两样东西。公社的各个营是由它們本身选出的軍官指揮的。这样，那些軍官就不受最高指揮官的节制，而是依靠那些选举他們出来的士兵。根据这种方針，就不可能組織一支真正的战斗的軍隊，因为这样的軍隊只有在禁止內部分裂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建成。

这是俄国的布尔什維克所已經知道的，因为，当他們发觉自己卷入一場真正严重的战争时，他們很快便撤銷了士兵代表苏維埃的权力和通过士兵选举軍官的办法。当年国民自卫軍的各营是否服从最高指揮官的命令，完全取决于他們的情緒。因此，公社的实际战士的人数很少，这是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关餉的有士兵十六万二千人 and 軍官六千五百人，但在四月三日以后的那些非常的日子里，上火綫作战的只有两万到三万人不等。这些勇士必須承担战斗的全部可怕的重任，以抗击一支在五月下半月总数至少达十二万人的装备精良、訓練有素的优势兵力。自上而下的分裂更助长了自下而上的分裂。国民自卫軍的中央委员会仍然与公社并存。它以前曾將它的全部权力移交給公社。然而，它繼續干預发給国民自卫軍的一切命令。馬克思在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二日写給庫格曼的論巴黎公社的信里，认为中央委员会过早地放棄了自己的权力而把它交給公社是一个錯誤。他沒有举出他說这种話的理由，因此我們无法說明为什么这在他看来是一个錯誤——显然是由于战争指揮上的反应。他认为这个錯誤是巴黎人所造成的第二个錯誤。按照他的看法，第一个錯誤在于沒有在三月十八日以后立即向凡尔赛进军。这两个錯誤也許就是失敗的原因。同时，十分不幸，这些从一开始就使公社的軍事处境陷于絕望的基本錯誤，在公社召开會議以前便已經鑄成了。没有什么事实可以证明，战

爭的指揮如果由中央委員會主持，一定會比由公社主持獲得較好的效果。相反地，那個委員會甚至比公社更顯得優柔寡斷。指揮戰爭並不是無產階級的拿手好戲。

可是，最糟的事情是同時并存着兩個彼此不相隸屬的最高權力，另外還加上一個干預戰爭進程的第三種權力，即炮兵委員會。在三月十八日組成的炮兵委員會經常為了大炮問題同軍事委員會發生爭吵。軍事委員會掌握着馬爾菲爾德的大炮，而炮兵委員會則掌握着蒙馬特爾的大炮。^①

當時曾到處想用加強政府權力的辦法來盡量縮小一般的組織。四月二十日，成立了由九個專門委員會各推代表一人組成的新的執行委員會，以代替我們已經提起過的舊的執行委員會。但是這種措施並不能夠排除根深柢固的弊端。念念不忘一七九三年傳統的雅各賓派要求成立一個具有獨裁權力的公安委員會，如果這成為事實，就會使公社形同虛設。凡爾賽軍隊的不斷的冒險行動，使得“留着一把十分漂亮的一八四八年式的胡子的”^②公社委員米奧在四月二十八日要求成立一個公安委員會，即成立一個統轄其他一切委員會的新的委員會。對於需要成立一個強有力的行政部門這一點，大家都沒有異議，雖然這個行政部門的命名問題引起了熱烈的爭辯。革命的雅各賓派認為，如果這個委員會稱為公安委員會，這就可以使該委員會賦有一七九三年的法蘭西共和國及其公安委員會的勝利的權力。但是這個令人想起恐怖統治的傳統，遭到蒲魯東主義者的厭惡。五月一日，以三十四票對二十票通過成立這個委員會。在導致成立這個委員會的選舉中，少數派的大部分人、即二十三人沒有參加投票，他們作了下列的解釋：

“我們沒有提出任何候選人。我們不願讓那些在我們看來是無用的人還變成有害的人；因為我們認為，成立這個公安委員會就是拋棄三月十八日的公社革命所由產生的社會改革原則。”

① 利沙加勒：《巴黎公社史》，第 205 頁。

② 同上書，第 273 頁。

这个将使公社增加其活力的公安委员会，同时也为它的分裂铺平了道路。事实上，它破坏了公社。仅仅由于这个缘故，该委员会丧失了一切道义的力量，而且，那些独力担任公社的任何严肃工作的人们、即民族主义者，也敬而远之。像利沙加勒所说的，除了一个人以外，它的所有的成员都是“咆哮叫嚷的家伙”。五月九日，这个没有价值的委员会宣告结束，以便选举新的委员会。少数派这次参加了选举，因为他们已经看到，在这个相当可怕的名词后面，正潜伏着一种实际的独裁。但同时多数派与少数派的对立已经变得非常严重，以致多数派铸成了一个极大的错误，竟把少数派完全拒之于委员会之外。第二个公安委员会证明和第一个一样无能。它甚至比第一个走得更远，积极地起来反对少数派，撤掉某些少数派的职务，从而使公社丧失了一些最优秀的成员。这个举动导致了公开的破裂。五月十六日，少数派在报上发表了一篇声明，抗议公社放棄职权而袒护一个不负责任的独裁机构，并宣布此后不再参加公社的工作，仅从事各区和国民自卫军的活动。他们在末尾说，他们希望用这个办法把公社从他们力求避免的内訌中拯救出来，因为多数派和少数派所奋斗的目标是一致的。尽管最后一句话带有和解的口气，这个声明似乎意味着彻底的决裂。

在处理行政工作或解决经济问题方面，少数派比多数派要干练得多，但是他们在政治方面却不是很有决断或很合理的。他们曾在五月一日拒绝参加选举以抗议第一个公安委员会的独裁。但在五月九日，他们由于提出第二个委员会的候选人而已经承认了独裁。而且，他们在十五日又决定发表公开声明，用停止在公社中的一切合作的办法来对这同一独裁提出抗议。十六日，即在他们的抗议书发表的那一天，他们屈服于他们的朋友们、即国际的巴黎联合委员会的压力，因为那些朋友力劝他们不要在大敌当前的时候破坏公社的团结；因此到了十七日，在宣言上签名的二十二个人中有十五个重新在委员会中担任职务。可是多数派却并没有因此感到满足，尽管他们的成员中间包括瓦扬在内的一些头脑比

較冷靜的人們作了和解的努力。帶有和解性質的一項決議案被拒絕了，而他們却通過了米奧的提案。那個決定的原文是：

“公社將不再計較少數派中從聲明書上撤回簽名的每一個成員的態度。它譴責這個聲明。”杜布勒伊在論述這件事情時說，“這樣，雅各賓派和聯邦主義者在他們犧牲以前的最後一次戰役中像勢如水火的兄弟那樣站在一起。”^①

五月二十一日，凡爾賽軍隊進入了巴黎。公社在二十二日舉行了最後一次會議。

公社的政策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值得注意的狀況。在公社所表現的兩種傾向中，各有一個綱領作為指導，而這個綱領如果實行的話，是根本行不通的，並且只會使它的門徒採取無益的行動。但儘管如此，這兩個綱領互相起的作用和反作用卻為處境所迫而產生了一個政治綱領，這個綱領不僅可以實行，而且符合當時法國的需要，甚至在今天也還包含着最富成效的可能性。這個綱領是要求地方自治和解散常備軍。公社的這兩個基本要求對法國的福利來說，在今天像在第二巴黎公社的時期一樣重要。

公社的恐怖主義思想

我們要談到公安委員會，就不能不想起代表着一七九三年那個組織的基本精神的恐怖統治。對於公安委員會的獨裁所產生的對立在恐怖主義問題上有了進一步的發展，這是很自然的事情。雅各賓派從一開始就贊成把恐怖主義當作一種戰鬥手段，正如國際的會員從一開始就加以摒棄一樣。甚至在公社的第一次會議上，它的對立就很明顯。有一個委員提議廢除死刑。他們對他的駁斥是：“他想挽救維努亞（凡爾賽的將軍）的性命。”

在國際的聯合會成立以前，弗蘭克爾在四月二十九日解釋國

^① 杜布勒伊：《巴黎公社史》，第440頁。

际的政策时說：“我們想要确立工人的权利，而这一点只有靠說服和道义的力量才能办到。”

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像戏剧批評家皮阿、會計員費烈、学生拉烏尔·里果这样一些人，他們的嗜血的要求是难以滿足的。在原則上一切雅各宾派都須拥护恐怖手段，但在实际上却很少看到这种手段的实施。很少有人能够避免那种鼓舞着資产階級和无产階級的全部民主政治的人道主义精神。而且，在第二巴黎公社时期所获得的条件，也与第一公社时期产生恐怖行为的条件不同。

第二巴黎公社沒有做这样一种不可能完成的工作，即按照資产階級方針建立一个为无产階級利益服务的公社制度；并且，它仅对大部分的居民站在它一边的巴黎行使它的权力。因此，他們就毋需用劇烈的手段来威吓他們的手。真正危害公社的敌人不在他們的公社生活范围之內，不可能受到恐怖手段的影响。所以当时缺乏实行恐怖傳統的动机。公安委员会的拉烏尔·里果和費烈通过查封报館和逮捕而做出的事情，与其說是模仿那种根据完全不同的方針进行的恐怖統治，还不如說是拙劣地模仿了法兰西帝国。布朗基派的学生里果在帝国統治下因不断同警察斗争而名噪一时，他是十分熟悉警察的狡猾手段的。

甚至在三月九日之前、即起义之前，劳塞就提到他說：“那些認識他的人曾經和我談起关于他的瘋狂行徑的一些最可惊的事情，以及他用以探明警察动向的狡猾巧妙的手段。他就是用这种手段来破坏他們的一切迫害，并使自己在事实上充当了巴黎警察厅长的角色的。”^①

三月十八日，他奉到正式命令，充任巴黎的警察厅长。他的第一項行动是在三月十八日夜間到警察厅去就职。他的警察制度不久就遭到各方面、特别是国际会员的激烈反对。这个制度同一七九三年的原則毫无关系，虽然他当时正在著作一部关于一七九三

① 劳塞：《在巴黎公社的統治下——日記》，来比錫，1878年版，第18頁。

年公社的历史。

另一方面，我們不應該把枪毙克列芒·托馬將軍的事情算在公社的帳上。我們已經指出，这种处决是在公社存在以前发生的，并且是中央委员会所反对的。

公社所采取的措施中只有一种是可以称为恐怖性质的，那就是逮捕人质，用压迫沒有防备的人的办法去威吓敌人。拘留人质是一种絕望的做法，它很少能够阻止暴行的发生，往往只会相反地增加那种引起这一做法的斗争的殘暴性，这一点已經由經驗提供了不少证明。

可是就公社來說，也很难采取別种措施，除非它願意忍气吞声，对于凡尔賽軍枪杀俘虏的举动不加抗議。凡尔賽軍枪杀俘虏的事情在四月三日以后确实是发生过好多起的。

“由于凡尔賽軍枪决了俘虏普托和夏蒂昂，以及在四月三日进攻时俘获的国民自卫軍的一位軍官杜瓦尔，公社的一些委員义憤填膺，坚决主張立刻枪决若干反动分子，而这些反动分子大部分是从巴黎的教士中抓来的。其他的雅各宾派、特别是德勒克呂茲，对于敌人的这些过分的行动深表憤慨，建議公布一項关于人质的法令。当时决定要反对凡尔賽分子盲目地陷入的殘暴行徑。然而，根据一种默契，他們同意不把這項法令付諸实施。”^①

所以，這項法令的制定，不是想要毀灭人的生命，而是想要加以拯救。一方面，其目的是想迫使凡尔賽軍的指揮官不再处决俘虏，另一方面是想使普魯士人放棄直接报复的念头。

“人民即使在憤怒时也是高尚而正直的，”四月五日的公社公告上这样說，“……而人民，甚至当他們憤怒的时候，仍像痛恨內战一样地痛恨流血，但是，人民有責任保卫自己不受敌人的野蛮虐杀，因此，无论代价多大，都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②

① 菲奧：《一八七一年的內战》，第 246 頁。

② 馬克思：《法兰西內战》。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論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102 頁。

事实上，公社是表现得很高尚和正直的，但它没有根据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原则办事！

公社所发布的关于人质的法令规定，凡被揭发与凡尔赛政府狼狈为奸者，立即交法院审讯，加以监禁。在二十四小时内成立法庭来审问被告，并在四十八小时内对其作出判决。经法庭判决的人犯不予枪毙，而是扣押作为人质。所有的战俘均应受这一法庭审讯，由法庭判决是否应予释放，或扣押作为人质。最后，法令规定，如果凡尔赛政府处死一名被俘的战士或公社的拥护者，应处决所扣押的三名人质。法令的这个最后的并且也是最可怕的规定，实际上始终是个具文，并没有实行，但是凡尔赛的军事当局在隔了很短一个时期以后，却继续枪杀他们所捕获的俘虏，并且似乎完全不顾这样的事实，即他们由于这种行动，已使他们的作为人质而被扣押在巴黎的朋友们的生命遭到威胁。梯也尔不遗余力地刺激公社，要他们采取屠杀的手段。他了解得非常清楚，每枪杀一个人质，只会对他自己而不会对公社有利；因为当时一般的舆论还受着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感情的支配，它无动于衷地听取凡尔赛方面枪杀无数俘虏的消息，却对巴黎方面仅仅扣押人质的举动表示极大的愤慨，因此如果枪毙人质，那就会使舆论骚动起来。梯也尔的这种卑鄙的态度也表现在交换人质的谈判上面。

在四月五日的法令公布以后，巴黎扣押了一些人作为人质，其中有几个教士、墨西哥远征的发起人银行家热克尔以及最高法院院长朋让。可是公社提出交换。如果凡尔赛政府释放被捕的布朗基，他们愿意开释所拘捕的一些教士，其中包括大主教达尔布阿、神甫德盖里、副主教拉加尔德，以及最高法院院长朋让。他们十分宽厚，甚至在副主教拉加尔德矢口表示万一谈判失败誓必回到巴黎之后，允许他在四月十二日携带达尔布阿致梯也尔的亲笔信件前往凡尔赛。可是在那以前，即在四月八日，达尔布阿就已经写了一封信给梯也尔，请求他不要再枪毙俘虏。梯也尔始终默不作声。四月十三日，巴黎的一家报纸《解放报》刊载了这封信。梯也尔因

此作了答复；但他的答复是滿篇謊話，因为他把关于处决俘虏的一切消息說成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誹謗。拉加尔德轉交的第二封信的答复，直到四月底才收到。可是那位副主教尽管曾經宣过誓，却存着戒心，沒有敢回来触犯雄獅的复仇鋒芒。在这封复信中，梯也尔拒絕釋放布朗基，但安慰大主教，說是保证人质的生命沒有危險。羅馬教皇的使节和美国大使华施貝恩的企图实现交換俘虏的斡旋也同样沒有成功。所以，当公社解体而丧失了保护上述那些人的能力的时候，那些人除拉加尔德之外还仍旧作为人质被关在馬扎斯的監獄里这一事实，应当由梯也尔負責。順便提一句，完全同他所說的关于公社殘暴行为的誹謗性言論相矛盾，他說公社扣押的人质的生命沒有危險，這句話是說得很对的。但他自己却尽力要推翻人质的保护力量、即公社的統治，在这种情况下那就确实使人质的生命陷于十分危險的境地。由于某种背叛的行为，凡尔賽的軍隊得以突然在五月二十一日（星期日）冲入巴黎，这时在杜伊勒里宮的花园里正在很熱鬧地举行一場民众音乐会，音乐会結束时，參謀本部的一位軍官邀請听众在下星期日再来参加，并且說，“梯也尔希望在昨天进入巴黎。他沒有来。他是永远也来不成的。”就在这个时候，凡尔賽軍隊开进了巴黎。居民惊慌万状，公社的軍隊已經精疲力竭，因此凡尔賽軍隊本来也許可以用迅速而果斷的推进，在沒有任何激烈的抵抗下占領巴黎全城。但他們进展得很慢，这就給了公社的保卫者以充分的时间，可以集結起来进行整整持續一星期的激烈的巷战，那个一星期就是著名的“可怕的五月周”。由于凡尔賽的指揮官不予寬赦，不但枪杀了所有那些在被俘时手里拿着武器的人們，甚至还枪杀了所有的嫌疑分子，这就火上加油，使人們忿恨达于极点。巴黎公社的許多历史家指出，凡尔賽軍隊的这种緩慢的推进結果增加了抵抗，同时也增加了牺牲的人数，从而扩大了失敗的規模。

“如果軍隊沿着左岸的碼頭推进，巴黎本来是可以在二十四小时內占領的。这样它就只会遭遇蒙馬特尔和梅尼蒙坦两地的海軍

部方面的抵抗。由于它推进缓慢，它给了对方组织力量的时间。他们所俘掳的人数超过对方实际战士八倍至十倍，他们所枪杀的人数比实际站在街垒后面的来得多，而凡尔赛军只阵亡六百名和受伤七千名。”^①

公社方面死亡的人数超过二万人，有些人说是三万。司法部长阿贝尔将军估计为死亡一万七千人。当局所不知道的牺牲者的人数无法确定，但总数至少有三千人。

在这可怕的風暴中，渴望复仇的心理在许多情况下占了上风，这是不足为奇的。它越是丧失权力和越是不能避免失败，它就变得愈加怒不可遏。处死人质的事是在公社已经不再存在之后才开始的。五月二十一日，凡尔赛军队突入巴黎；二十二日发生巷战；二十四日开了最后一枪。在这方面，虽然执行死刑是狂怒和盲目复仇心理的结果，而不是预谋行动的结果，雅各宾派和国际成员的对立却很明显。死刑的执行是由狂热的布朗基主义者拉乌尔·里果开端的。他命令把三月十八日逮捕的一些宪兵和四月中旬捕获的一个名叫肖戴的报馆编辑在五月二十三日夜間执行枪决。肖戴曾唆使军警在一月二十二日向群众开枪，在这次骚动中，里果的一个朋友薩比亚牺牲在他的身边。二十四日，里果本人被捕枪决。与此同时，老布朗基主义者欣东要求处决六个人质，其中有我們所已经知道的大主教达尔布阿、最高法院院长朋让和神甫德盖里。布朗基主义者費烈批准他执行。

“行刑队几乎是清一色由实际上还是孩子的青年组成的。在多数场合，参与这些罪行的人们充其量还不过是一些青少年，他们受到城市中十分流行的不道德行为的刺激，过激的情绪比他们的胡子还长得快，根本没有可以容纳责任感的余地。”^②

就那些想用实践来为战争权利辩护的人而言，我们偏巧今天在德国无法作同样的评述。

① 波尔根：《巴黎公社》，第 108 頁。

② 菲奥：《内战》，第 528 頁。

在二十六日，又是那位布朗基主义者費烈决定把四十八个人质交给另一个布朗基主义者格瓦上校；这些人质大部分是教士、秘密警察以及在三月十八日向群众开枪的宪兵。他带领一伙武装人员去提取人质，这些人由于没有希望获得赦免，已经注定非死不可，所以显得非常混乱。他们在狂怒的心情支配下扑向人质，逐一把他们杀死。国际成员瓦尔兰和赛拉叶想要拯救他们，可是没有成功。他们自己都几乎遭到愤怒群众的毒手，因为这些人指责他们是和凡尔赛派一鼻孔出气的。五月二十八日，这位曾经冒了生命危险去拯救人质的瓦尔兰，由于被一个在街上把他认了出来的教士所告发，被凡尔赛军的指挥官捕获，立刻遭到枪杀。

无论在战斗期间或战斗以后，有无数的人牺牲在胜利者的嗜杀欲之下，那些对于公社的恐怖主义表示愤慨的资产阶级分子对此默不作声。相反地，当他们谈到在巴黎公社崩溃后有五、六十个人质成为某些凡尔赛派的复仇和不负责任的行动的牺牲品时，他们却用尽一切字眼来表示他们的愤怒的谴责。

这一段关于人质问题的记述十分清楚地证明，巴黎公社同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有多么大的距离。在整个历史上，还没有一场内战或一次对外战争能像一八七一年的法兰西内战中所看到的那样，尽管一方惨无人道，另一方却确实以高尚的决心坚持了人道原则，同少数“激进分子”的嗜血的口号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所以第二巴黎公社的结局和那组织一种可怕的恐怖统治的第一巴黎公社有天渊之别。

第一巴黎公社的恐怖统治在没有受到巴黎工人任何反对的情况下彻底崩溃了。的确，对它的崩溃有些人感到松一口气，甚至有很多人额手相庆。在一七九四年热月九日，当敌对双方的兵力接触时，罗伯斯比尔的党羽在发出第一枪以前就逃之夭夭了。另一方面，巴黎人却自始至终不屈不挠地紧紧靠攏第二巴黎公社。非常激烈的巷战必须经过一个星期才能结束。巴黎公社的殊死斗争所造成的伤亡、被俘和逃脱的遭难者的人数共达十万人（据一八七

一年七月的估計为九万人^①。

第二巴黎公社被严重的对立弄得四分五裂。这一点我們从参加最后斗争的两派的不和中已經看出来。但是这两派的任何一方从来没有用恐怖手段来压迫对方。多数派(俄語“布尔什維克”)和少数派(俄語“孟什維克”)不顾一切地并肩作战,直到最后一口气为止;所以公社中的社会主义的一切派系預先看到了他們有必要共同代表整个的战斗无产阶级。在認識这一点的时候,他們融会貫通了馬克思和巴枯宁、拉薩尔和爱森拿赫派的見解。无产阶级的第一个政府已經深深地銘刻在那些渴望解放全人类的人們的心中。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对于爭取在一切国家获得解放的斗争的强大影响是大部分由于这样的事实,即:当时人們普遍地受到人道精神的鼓舞,这种精神使得十九世紀的工人阶级充滿着蓬蓬勃勃的生气。

^① 波尔根:《巴黎公社》,第183頁。

第七章 文明对于人类風俗 习惯的影响

殘暴与人道

我們已經知道：法国大革命的屠杀在以后的几次革命中沒有再度出現；从一八三〇至一八七一年，革命的战士們即使受到恐怖統治所树立的傳統的影响，事实上却力求尽可能合乎人道——同他們的敌人在此前后在一八四八年六月以及一八七一年五月所表現的最触目惊心的殘暴行为形成极鮮明的对照。

在整个十九世紀，我們可以看到在工人階級中間发生一种逐漸富于人道主义精神的情况。現在，在二十世紀之初，革命已經在俄国和德国爆发，并且已經恣意地实行那种类似十八世紀法国革命的杀戮。我們怎样来解釋这种倒退的現象呢？按照一般的看法，人道是文化的产物。我們假定人天然是一个邪恶的冷酷的生物，它具有猛兽的本能，常常准备去襲击他的邻人，压迫他、折磨他和杀害他。我們还相信，只有經過长期的教育与訓練、即文明的进步，人才获得社会的感情，一种互助、仁爱以及憎恨殘暴与屠杀的观念。

这种观念在我們所使用的語言中表达出来，它用“人道”一詞來說明我們剛才提到的那些品质，把它們同我們斥之为兽性的（起源于“野兽”一詞）和殘忍的（起源于“畜生”一詞）其他特征区别开

来。我們有許多人种学家也抱有洛姆布罗索^①及其学派所采取的观点，认为重新回到人类的动物先驅的感官生活乃是他們叫做返祖現象的严重罪行。而且，即使是殘忍的猛兽也照例不殘害同类；我們沒有理由来假定人类真正生来就是具有强烈的嗜血本能的猛兽。我們不知道人类的动物先驅究竟是怎样的情况，但我們必須假定，在今天的动物中間，类人猿是最接近人类的。像这些动物一样，人类的祖先显然靠植物性的食物为生，偶尔补充一些小动物、毛虫、蠕虫、爬虫甚或小鳥；但他从来不为了貪图口福而杀害一个哺乳动物。任何的类人猿都不做这样的事情。

首先，类人猿决不对它自己的同类进行任何凶殘的战争。从最初起它就并不具备为进行这种战争所必需的器官。个别的类人猿可能会搶夺鹵获物或为了爭夺配偶而发生格斗并受到輕伤，但这种扭打結果并不是致命的。

就人來說，一旦他的技术知識給他提供了用具以补天然器官的不足，即給他提供了貝壳和刀劍的工具与武器，上述的情况就根本改变了。这样，他便获得了一个猛兽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在他身上的发展又使他具有猛兽的一切本能和机能。这时他能够杀死較大的动物并撕裂它們。植物性的食物因而对他丧失了重要的意义。打猎和流血变成他的日常的事情。这样，两个人之間的冲突可能导致死亡。然而，民族与民族間的屠杀、即战争却不能单纯用武器的发明来解釋。战争的先决条件是教养上的进一步发展，即人們分別聚集为紧密的社会。

这一点至今很少被討論过，并且我自己也一向談得很不够，所以在这里不妨作一些說明，虽然这样做会离題較远。毫无疑问，人起源于爱群居的动物，但他和它們不同的是他組成紧密的社会。爱群居的动物慣常过一种内部缺少团結的合群生活。这些同样的

^① 契扎雷·洛姆布罗索（1836—1909）意大利医师和犯罪学家，曾任都灵犯罪人类学教授。他认为一个犯罪者代表一种不同的人类型，在身心方面具有明确的缺陷，并认为一个犯罪者乃是遺傳、返祖現象和墮落的产物。——譯者

个体动物根据生活的条件、食物的供应情况、敌人的数目等等，有时組成龐大的群体。在另一个时候，它們又分成許多小群，甚至只是分成若干对，直到某种比較有利的机会又把它們聚成巨大的集体为止。一个个体可以非常容易地从一群轉到另一群。对于人来说，这是极端困难的。在这里討論这种改变的原因，也許离題太远，但不妨作如下的簡短的說明。

动物的互通消息的方法依靠它們本能地发出的自然的响声，以及包含在姿势和模仿中的交談方法，但这种方式它們毋需彼此学习，而是生来就具有的。因此群体中的每一个分子可以用这个方法同样清楚地表达它自己的意見，并且可以为其他所有的分子所了解。

除对工具的使用以外，使人类与动物有別的是发言清晰的語言。人类所用的工具不是生来就具有的，而是由他自己制作的，并且必須从邻人那里学会制造工具的方法；除此以外，还有一种相互了解的媒介，这种媒介也不是生来就具有的，而是他的同类在环境的影响下发展出来的，并且他自己非向他們学习不可。这种沟通消息的媒介不是一开始就由全社会所共有的，而是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地方形成的。通过这种运用語言的方法，社会的团結变得更加巩固和密切，因为依靠这种方法，对于劳动的了解和协作变得比較容易和多样化。由于这些不同，人类的一些部族和群体从一开始就互相分离。因此每一个人不得不同他已經熟习其語言的那个特定的部族或群体生活在一起。他无法同其他的部族和群体沟通思想和感情。当他处在他們中間的时候，他感到不慣和不舒服。除此以外，还产生另一种因素。語言让一些个人彼此建立关系。它也让人們把自己对于过去的回忆記錄下来。換句話說，它形成一个保守的因素。即使是充分发达的动物也无法辨別同类的其他动物，因此它很容易忘記它的父母和同一家族的其他成員。但人类却能終身保持这些关系。他甚至能够辨別和記得他的双亲的父母、他自己的儿女的儿女，以及他的兄弟姐妹的儿女等等。

一般人认为：家族是由自然所规定的，“血统的声音”就是这一事实的明证。事实上，所创造的是“语言的声音”。如果没有某种关系的标志，任何家族都不能作为一个永久的组织存在下来。在动物方面，一旦幼小的动物羽毛丰满并且已经开始过独立的生活，“血统的声音”就嘎然而止了。这一事实使得今天有些人的说法听起来格外可笑，他们企图不但把家族的关系而且甚至把民族的关系解释为“血统的声音”的结果；例如，当日耳曼血统的奥地利人倾向于同德意志帝国的日耳曼人联合起来的冲动被说成是这种“声音”的不可思议的规律的例子时，就是这种情况。实际上，住在奥地利的非日耳曼血统的居民、特别是捷克人，比直接同德意志帝国有关的人来得多。

由于形成了家属，由于积累了比占有者寿命更长的以工具、武器和各种用具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财产，一个家庭的亲密的性质进一步加强了。因为，在他死了以后，所有这类私有财产都归那些曾经和他十分亲密地住在一起的家庭成员承受，从而成为直到他死亡为止始终维持这种关系的坚强理由。直系亲属的亲密程度又因另一种类的财产、即由于全家共同占有的土地而更加有所保证。甚至动物也都愿意住在它们曾在那里长大的、可以说是感到很自在的地方；在那些地方，它们熟悉食物的每一个来源、每一个角落和每一个危险的地点。然而，这种地方的范围并不是划得很窄的，家庭中的个别成员如果在附近找不到足够的食物或由于某种危险，可以毫不费力地扩大他的活动范围，直到他搬进他比较中意的另一个地区为止。可是在那里，他是迟早要隶属另一个部族的。

在比较亲密的人类社会中，这一点就有所不同。无论是谁，只要他来到另一个地区，就会发现自己处在一群他无法了解的人们中间。原始时代的人并不利用搬到人口稀少的新的地区并在那里定居下来的办法以适应新的环境。这种适应只有在一个较高的文化状态中才能找到，即使那种文化状态还是不完备的。另一方面，原始的人群聚在一起，力求扩大其活动范围而不利于邻近其他的

人群。这样，我们就看到，一旦军队的技术有了十分高度的发展，便产生了战争和同类相残。由此我们也看到，我们称之为“残忍”的品性并不是由于人类的动物先驱的结果，而是人类的发展的产物。道德的本能本身，休戚相关的感情，对于别人的同情心，急难相助的心理，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改变着它们的性质。在社会动物方面，这些本能是由同类的一切个别的分子所共有的。

但是，在人类方面，这些本能的势力范围仅限于最接近的圈子的成员。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凡是在这圈子以外的人都是漠不关心的对象。他们对他们没有同情心，并且往往是直接敌对的。随着相互沟通的发展，我们“个人”自己感到是其中一个成员的社会范围也扩大了。今天我们仿佛正在回到人类发展的起点；我们的社会和道德感情的范围又在开始扩展到同类的一切个人，换句话说，扩展到全人类。但是，一般说来，这还多半是我们正在十分缓慢地争取的一个理想。同时，由于分工和日益多样化的社会联系，经济的发展促使国家内部建立了一些单独的、界限分明的社会，而国家本身又接着被分裂成各种各样的集团。这些集团也就变成多少有些独立的组织，例如贵族、家族、教会团体、宗派、行会等等。这些组织各自发展它们自己的道德理想，而这种理想只对每一个具体组织的成员产生影响。甚至这些不同的组织可以互相倾轧。它们对于自己的狭隘集团的成员能够牢固地团结一致并表示同情，同时对其他集团却根本缺少仁爱。每一个个人可以属于若干具有不同的并且往往是对立的利益和道德原则的社会组织。社会内部的矛盾越是尖锐，个人与个人的对立就越是严重。南方各国的封建贵族的太太们在她们同类的其他一切人看来是非常娇媚和可爱的，并且是充满着慷慨和同情的；但她们的确残忍地折磨她们的奴隶。分明是同一个人，他对自己的家庭成员可以关怀得无微不至，然而在他的业务关系上却成为最无情的敲詐者和最冷酷的监工。

文化不一定同时有助于使人在待人接物方面通情达理。另一

方面，如果作相反的假定，把原始的自然状态当作黄金时代的羲皇盛世，认为我们一直是从那个盛世逐渐衰退下来，那也是荒谬的。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在人类发展史上看出两种互不相容的倾向，根据当时的条件，不是这一种倾向占主导地位，便是那一种倾向占据优势。

两种倾向

一种倾向我们已经讨论过了。那就是不断改进杀人武器以及增加人类的敌对势力。它助长国内的对立，即发生于人口过多地区和人口稀少地区之间的对立；此外还有穷人与富人的对立，独占自然财富的人们与被迫留在贫瘠沙漠中的人们的对立。而且，它引起工业发达地区与工业落后地区的对立。最后，在各国本身中间产生人对人的种种不同的剥削和奴役形式，从而引起了仇恨与残暴。

一种相反的倾向是随着农业的开始而产生的。在早期的生产方法中，狩猎和畜牧占主要地位。畜牧和狩猎都需要武艺，并使流血成为维持生活的手段和防御猛兽的手段，因为那些猛兽在文明初期威胁着牲畜的安全。另一方面，农业却并不一定要用武器。农夫往往看到野兽对他们很有帮助，因为它们袭击其他想来糟蹋农作物的猛兽；而猎人所看重的保护野生鸟兽的措施是不受农夫欢迎的。在农业方面更加突出的情况是，技工和聪明的工人利用多余的武器作为生产资料。制造这种武器所需的时间和原料以及学习使用武器的过程，在这些与猎人和牲畜饲养者抱有不同见解的人看来，是他们想尽量减少的一种经济上的浪费。因此农民、技工和知识分子的本性变得越来越平和；特别是知识分子，因为农民和技工还需要用体力来进行他们的工作。这种体力很受他们重视，并且不仅在实际工作中而且甚至在游戏中、特别是在含有比赛性质的竞技中，非常受到欢迎。知识分子却不需要其他的力量。他

把別人用以使肌肉发达的时间用在获得知識或鍛炼他的腦力上面。无論是誰，只要他企图用智力的武器以外的其他武器来进行文字的論战，就会立刻暴露他的低劣。这种論战决不可以因为德国学生界往往采取粗暴和恫吓的方式就加以否定。德国学生界的粗暴态度是逐渐导致三十年战争的宗教斗争所特有的横蛮作风的结果。

古代世界的僧侶階級以及基督教的精神領袖們一般是反对流血和暴力行动的，至少在他們不屬於統治階級或剝削階級时是如此。对于十八世紀的知識分子，我們也可以这样說。可是，当知識分子本身变成了剝削者时，他們就并不总能表明同样的和平傾向。如果他們沒有这样的打算，他們的情况就同农民、技工和无产者一样。一个人在这种情形下不是被当作达到別人的目的的手段，而是达到他自己的目的的手段，或者是达到全社会目的的手段；然而却不是被当作达到其他个人的目的的手段。康德的倫理学恰好符合这个观点。不过在康德看来，倫理学并不單純是特定階級或时代的道德律，而是全能的上帝本身都受其支配的一种超越現象世界的永久的道德律，因为甚至在上帝看来，也是不准把人当作單純的手段来使用的。（为什么呢？）^①

不論这种态度如何产生，其結果总是成了对于人格以及对于人生和人类幸福的尊严的莫大尊敬。可是，这些热爱和平的傾向在农业和村社生活的初期已經开始显出不利，因为各国的和平的階級是最缺少防御的。他們受到武装集团的剝削，这些集团曾經作为一个好战的貴族社会对他們逞尽威风，这时又专门从事于狩猎、战争和杀戮，像以前猎人和畜牧者所做的那样。所以，他們在对自己的心怀敌意的同胞的态度上，把猛兽的方法和本能提升为一种原則。

于是，殘暴和人道就成为文明社会的两个特征。这些特征的

^① 参閱康德：《實踐理性批判》，第二版，第五节“上帝作为純粹實踐理性的准繩的存在”。

这一个或那一个按照不断改变的条件而占据优势。在古代羅馬，全部人口都卷入征服的政策。羅馬人由于他們在軍事上占优越地位，終于能够使地中海的一切国家都成为他們的附庸。全部人口靠剝削这些国家过活。他們对战争非常热心，贊成最殘酷的战争行为；由于战争的胜利給羅馬人带来大批廉价的奴隶，因此在竞技场中使用奴隶并使他們在决斗中互相殘杀以取悅观众，就成为他們的主要娱乐之一。单纯供懶惰的上等和下等民众消遣的格斗和杀人，标志着最下流的殘酷行为的极限；然而这一类的事实却代表着高度文明阶段而不是野蛮状态的古羅馬城。这些以人命为儿戏的格斗，直到羅馬国家由于住在边境的蛮族入侵而从高度的“文化”下降时，方才告一段落。

在經濟发展的过程中，除好战的貴族以外，还出现了具有两种不同傾向的資本家階級。資本家是个剝削者，因此他把自己依靠对其剝削而生活的人当作达到他自己的目的的手段，而不是达到那个人的目的的手段。在这种态度中，已經潜伏着冷酷和殘暴的萌芽，至于这些萌芽发展到怎样的地步，那就完全要看当时的环境而定。殖民地政策应对最殘忍的和最可怕的暴行負責。另一方面，在商业壟断时期，商业資本和工业資本之間发生了对立。商业資本在这时期显出是好战的和肆无忌惮的。它屠杀和掠夺了印度的人民。它进行了对黑人的奴役，迫使它的各国政府发动凶恶的、消耗性的商业战争。反之，工业資本却必須支付大部分的战争費用，从而遭到严重妨碍。因此，它是同这种方法直接对立的，并且事实上也是义憤填膺地反对了这种方法。人类的同情心显露出来了，它对虐待西印度群島黑奴的暴行表示憤慨，但始終容忍着以不足維持溫飽的工資迫使英国的白人工作过劳的殘酷折磨的現象。不过在这个时期，連无产階級也沒有表现出任何始終一貫的、統一的傾向。我們已經知道，生活环境會迫使无产階級把人生看作是神圣的东西。既然它不仅是一个剝削的而且毋宁說是一个被剝削的階級，它深受漠視人生的痛苦；所以以古代羅馬为例，战争除使

无产階級担負軍費以外，还使它承担許多重荷与危險；而胜利和由战争得来的战利品則归統治階級独享。所有这些引起无产階級厌恶一切杀戮和各种暴行。但是无产階級并不是和工业无产階級同时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无产階級化的倾向早在近代工业生产由于封建制度的崩溃而获得发展以前就在群众中間出现了。封建制度对农民課以苛重的賦稅，所以农业受到不利的影響，生产量急剧下降。

結果是，农业不得不逐出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因而那些仍旧留在农业崗位上的人的劳动負担不断增加。那时多余的劳动力很少有机会受雇于工业生产，因为工业本身受到行会的限制。所以无数的失业群众、即挨饥受餓和絕望的无产階級充斥全国；由于他們本身无法从事生产劳动，他們便求助于各种寄生性的糊口之道，从求乞和偷窃直到明目張胆的搶劫。这些人生活极端貧困，被排除在社会之外并为社会所不齿，他們便自然而然地充滿着对于整个社会的瘋狂仇恨；这种仇恨增加着，因为那些当权的人无法并且也不願采取有助于社会改革的措施，而是一味采用恐怖手段。他們不得不吓唬挨餓的人們，使他們不再求乞、偷窃、欺騙、卖淫和搶劫。于是这些不幸的人們就受到最可怕的懲罰。“一場反对流浪的真正殘酷的战争，”馬克思在其《資本論》里作了这样的描述，在这本书里他举了有关这种立法的許多例子。^① 其結果是同任何恐怖时代所产生的結果一样。它既然不能改变社会产品所由产生的基础，就只会减低社会产品。罪犯的人数沒有减少，尽管他們有多少人被押送到木帆船上去从事苦役，或者有多少人被处絞刑和遭受毒打。因为那些苟延殘喘的人除繼續行騙外，沒有其他謀生的办法。于是就产生了同警察的不断冲突。唯一显著的結果是无产階級的道德日趋敗坏，而执行重典的恐怖与殘酷的行为格外助长了无产階級的仇恨和忿怒，以及对于殘暴的渴望。当然，首先只是

① 普及版，第 664 頁及以下。

无产阶级的作奸犯科的一部分人才有这样的情况。这部分人那时为数很多，同工人无产阶级的分子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和友谊的联系（正如同中小阶级和农民的下层有着相类的关系一样，因为他们或多或少地都是一只脚站在有害影响的泥沼中的），因此连他们自己的思想和感情方法也受他们的影响。结果，在法国革命爆发时，只有知识分子以及受知识分子影响的中小阶级富裕部分和资本家与工业家的那些阶层才对人道表示同情。在无阶级本身以及与其关系最密切的那些阶层中，由这种残暴立法所产生的粗暴和残酷的倾向，一旦在国家政权最后垮台时就往往清楚地暴露出来，而这种倾向以前是受国家政权的压制，完全处于潜伏状态的。

杀戮和恐怖手段

如果考虑到统治阶级如何对待群众中最穷苦的分子，那么对于革命分子在能够自由行动时往往立即使斗争具有疯狂和残酷的性质，从而把伟大的革命变成特别凶残的革命这一点，就不必大惊小怪了。然而，如果把各种革命的屠杀列在同一个项目之下，那是错误的。我们还必须把那些变得凶残的人们在斗争和失望所引起的忿怒支配下或由于无名的恐惧而容易造成的过激行动，同那由预先安排的训练制度所产生的过激行动区别开来；后者以策划周到的立法形式依靠当局人物而被采纳到国家制度中去，以便压制那些统治者认为是危险的分子。

我们看到在革命开始时就有从人民方面自发地产生的暴行；但恐怖时代是从一七九三年夏季吉伦特派被逮捕和被处死刑时开始的。早在攻打巴士底狱那一天，当驻军投降时，人民就表现了他们的残忍。有些人被杀死了，其他一些人被砍了脑袋；人们把那些脑袋挑在枪尖上耀武扬威地四处走动。这种用枪尖挑着人头的示威游行，在革命过程中往往是司空见惯的。当革命变成了革命方面同欧洲各君主的战争时，对于流血和残暴的渴望增加了。当普

魯士軍隊逼近巴黎，普軍總司令布倫斯威克公爵在其宣言中以屠城來威脅巴黎時，關於全國貴族陰謀支持外敵的謠言甚囂塵上。於是巴黎人怒不可遏地紛紛起來，想要消滅各個監獄里的政治犯。這一行動發生在一七九二年九月二日。這場使三千人喪失性命的屠殺是大革命恐怖的高峰。一伙伙的劊子手對於流血着了迷。他們並不以殺戮為滿足。他們真正是以狂喜的心情泡在血泊之中。

德·拉姆巴爾公主的全部罪行不過在於她是王后的朋友，但她不但遭到殺害，而且被剖腹掏心。人們把她的頭挑在槍尖上，帶到被囚的王后的窗子跟前。王后看到這種恐怖的景象，立刻暈過去了。

連寬赦的行動也帶有殘酷的形式。德·索姆布魯伊夫人在九月屠殺期間同她的父親囚禁在一起，她的遭遇可以作為這方面的一個例子。站在她父親旁邊的某一位德·聖馬爾先生被劈開了腦殼。她的父親就要遭到同樣的命運；因此她拚命用自己的身體掩護著他，鬥爭了半天，終於在受傷三處以後使那些人受到感動。

“其中有一個人拿來一只酒杯，把那被殺害的德·聖馬爾先生頭上流出來的血倒進杯里，再摻進酒和火藥，然後宣布，如果她為全國人民的健康干杯，她就可以拯救她的父親。她泰然自若地一飲而盡，於是立刻就被這同樣幾個人帶了出去。”^①

毫無疑問，憤怒的和孤注一擲的群眾在革命時期的殘暴是可怕的。但是，即使我們完全有理由譴責這種心理的改變，我們也不應該把這一點單單歸咎於革命。這種心理的改變是高級當局長年累月對待人民的結果。下面就是一個例子。

一七五七年，一個名叫達米昂的人想要謀殺路易十五。他用

^① 這個報道見古斯塔夫·蘭多瓦編《法國革命書信選》第二卷，第176頁。此書在最近的德國革命之前的夏季寫成。在註明日期為一九一八年六月的序言里最後有這樣的話：“深切了解法國革命的精神和悲劇，在我們當前的嚴重時代是會對我們有好處的。”這個不幸的人沒有料到，在這“嚴重的時代”，革命的悲劇馬上就要在他本人的身上實現了。

一柄证明完全不能致人于死命的小刀行刺。但对于这件事情的报复是可怕的。达米昂的右手被砍了下来，当着他的面被烧掉。人们砍伤了他的手臂、腿和胸部，把滚油和溶解的铅注进这些伤口。然后他们把他的四肢各缚在一匹马上，驱策那些马朝不同的方向奔去，因此他的整个身体确实被分成了好几块。这个不光彩的酷刑是完全公开执行的，其目的是要对群众造成一种印象。唉，我们知道这是什么样的印象啊。

这种残暴的行为一直继续到革命时期。只有革命才彻底扫除了这种暴行。可是，在一七八九年八月十三日，高尔蒂埃·德·皮奥扎还从凡尔赛作了如下的报道：

“上星期二，在晌午时分，凡尔赛的人民终于阻止了一个罪犯的死刑的执行；他由于犯了杀父罪，本来是判决要缚在刑车上活活烧死的。”^①

“由那些执掌较高权力的人所犯的这些暴行先于群众所犯的暴行，群众从事的杀戮得不到公认的革命领袖的赞许。事实上，他们是极力反对这种行为的。一向被人十分错误地归罪于那些领袖的九月屠杀就是这样的情况。如果我们可以对他们有何指责，那也充其量只是说他们没有能够抑制群众的愤怒。这种愤怒是非常厉害的，是可怕的和使人胆战心惊的，因此谁也不敢拿性命当儿戏，变成这种愤怒的牺牲品，连吉伦特派也不例外。公社的委员们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险，力图拯救那些侍奉王后的贵妇人；他们每次都获得成功，只有我们在上文提到的德·拉姆巴尔公主不在此例。”^②

罗伯斯比尔就是对九月屠杀深感愤慨的人中之一。他痛苦地喊道，“流血，经常不断地流血。这些可耻的人最后一定要把革命葬送在血泊中了”^③。

① 兰多瓦：《法国革命书信选》，第一卷，第315页。

② 克鲁泡特金：《法国革命史》，第二卷，第5页。

③ 路易·勃朗：《法国革命》，第二卷，第207页。

連馬拉都在这种屠杀的面前感到战栗。“一个足以表明馬拉本人的特征的事实,据我所了解还没有被任何历史家提到的是:他公开地不赞成九月屠杀,或者至少是对那种屠杀深感遗憾——这同一个馬拉在他于八月十九日发表的言論中还会赞许过屠杀,并在九月二日想要把屠杀的好处扩展到法国全境哩。”^①

不消說,在馬拉的方面,使他不赞成九月屠杀的,与其說是对于人道的重視,还不如說是政治上的考虑。另一方面,罗伯斯比尔屬於根本反对任何流血的知識分子。这可以从一七九一年五月十七日制宪會議对于新刑法的討論中获得证明。在討論新刑法的會議上,当有关死刑的条文被提出考虑时,罗伯斯比尔是同那些最激烈地反对这种刑罰的人們站在一起的,他們的理由是:死刑并不能防止犯罪,而只会使民众更加殘忍,更加倾向于作出暴行。他的努力落了空。死刑仍旧保留下来。只是規定不得采用最可怕的执行死刑的方式。但斬首是保留下来了。这项决定构成了若干少有的原因之一,使得馬拉表示赞成国民議會而反对罗伯斯比尔。两年之后,罗伯斯比尔站到馬拉一边,不得不放棄他的反对死刑的意見。从此以后,这个刑罰就成为他的主要的政治武器,甚至用来对付他的政治上的朋友。

我們已經竭力主張,有計劃、有組織地实行恐怖主义的方法这一事实,不應該同一个憤激的群众的过火行动混为一談。因为这些过火行动起源于民众的沒有教养的和粗野的分子中間,而恐怖統治是由那些充滿着最高尚的情感的具有高度教养的人士所支持的。这种恐怖統治是当时存在着的条件的結果,它的根源和自发性的暴行不同。自发性的暴行是由旧制度对于貧苦群众的殘酷立法造成的;而恐怖統治則是雅各宾派由于面临着无法解决的任务而不得不实行的。那时,雅各宾派正处于由雕敝的群众的不幸所引起的、只是到了他們当政时才达到頂点的战争期間最可怕的环

^① 让·若累斯:《国民議會》,第一卷,第75頁。

境之中。他們必須解決的問題是保全資產階級社會和私有財產，同時還要消除人民的痛苦。其結果是，他們發現自己處在一個十分險惡的境地，只有使用他們自己所不贊成的並且深知其無益的手段，才能從那種境地擺脫出來。正是群眾的這種困苦，使得舊制度着手制定它的殘酷的法律，求助於恐怖主義。事實上，也就是這種普遍的困苦引起了新制度的同樣殘酷的法律和恐怖主義。唯一的區別是：古代的国家力图用杀头和虐待穷人的办法来統治可憐的民眾；而新的国家則力求用砍富人及其奴僕的头——沒有虐待——的办法來減輕群眾的困苦。但是後者正像前者一樣，並沒有達到目的。然而甚至在這方面也還有所不同。舊制度的存在並不取決於恐怖統治之是否摧毀無產階級。恐怖主義的失敗當然是一個不愉快的事實，但它對舊的国家沒有構成嚴重的危險，因為舊的国家想要壓制的階級、即流氓無產階級根本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占據上風，並且從經濟的角度來看是一個完全不值得重視的因素。反之，新的制度在它的恐怖手段失敗時，便立刻宣告破產並趨於崩潰。因為它想壓制的階級、即資產階級在當時的情況下是最宜於執掌無上權力的階級；並且從經濟上考慮，它在當時也是不可缺少的。對這個資產階級的鎮壓阻礙了社會的發展和生產，因而產生了更大的困苦，連那些本來應當從恐怖時代獲得利益的人也同樣遭到這種厄運。另外還有一個更大的區別使舊的“恐怖統治”與新的不同。就前者而論，那是完全符合於支配這個時代的集團的倫理的。他們並不一定由於實施恐怖手段而不忠實於自己。在他們看來，那是一種十分明顯的正當的手段。可是，新的恐怖時代是與實行恐怖手段的這個階級的倫理背道而馳的。因此，從最初起，恐怖主義者就受到良心的譴責，雖然他們企圖用種種詭辯來安慰自己的良心，但它卻破壞了他們的精神力量，削弱了他們的威信，加劇了當時已經存在的動蕩和磨擦，甚至使他們的許多成員腐化墮落。即使在來世也沒有絕對的“道德”，即使一定時代、一定國家或一定階級的道德是相對的東西，倫理還仍舊是最牢固的社會維系，

以及在人生的一切問題和冲突中的最坚强的支柱。最坏的事情，莫过于对自己不忠实，或者違反公认为构成良心的无上命令的那些倫理原則了。恐怖統治在遇到有力的抵抗时所以会彻底崩潰，大部分應該說是这一切的結果。殘存的恐怖主义者曾經多么迅速地改变自己的看法啊！在拿破侖看来，合法的君主主义者是一种比旧的共和主义者大得多的危險。这证明了后者的“道德”在恐怖时代受到多么严重的損害。

十九世紀行为的傾向仁义

法国大革命屬於世界史上最殘酷的时代，許多人由此得出結論，认为流血是一次真正的革命的不可缺少的因素之一。結果，他們不是譴責了革命，便是頌揚了杀戮。事实上，一七八九年的革命本身消除了某些使革命具有如此殘暴性质的最重要的特征，为将来几次革命的比較溫和的形式鋪平了道路。它所以能够完成這項工作，一方面是由于它排除了封建主义，鼓励了能使无产階級群众从單純的流浪者变成工資收入者的工业資本，另一方面是由于它发动了一个迟早要以民主政治获得胜利而告結束的运动。最后，由于研究大革命和資本主义的結果，产生了一个使无产階級政党在任何特定时机能够采取某种实际行动而其目标又在可能实现的範圍之內的理論；因此它沒有理由要陷入一条只会导致恐怖統治的死胡同里去。通过革命，农民获得了解放，成为他自己的土地的主人。結果，土地經濟达到了一个較高的阶段，产生了农民也分潤其利的較大的報酬；所以曾經放棄农业工作的过剩的劳工的总数就有了减少。另一方面，也有一大批人离开土地而涌进城市去寻找职业。一切旧的行会的限制已經打破；手工业可以不受妨碍地自行发展起来。固然在某些方面这种劳工受到新兴的工业資本的不利影响；但随着工业資本的迅速增加，連这种資本也有助于扩大对劳工的大量需求。工业无产階級这时成了一个具有特殊階級觉

悟的特殊的階級，它變得越來越顯著，同流氓無產階級有着很大的區別。

在資本的統治下，同盛行手工勞動的時期的獨立勞動者的地位相比，工業無產階級的地位當然已經惡化。另一方面，與流氓無產階級相比，資本也肯定是改善了勞工的地位。流氓無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是不會鬥爭的；而工業無產階級依靠它的階級鬥爭和組織，却獲得了難以置信的成果，具備了理智和道德上的一種了不起的動力。在最初的時候，工業無產階級不但在經濟上而且在精神上遭到資本的可怕的抑制。在它的居住條件上，在它的生活的貧乏和動蕩上，在它的愚昧無知上，它同流氓無產階級並沒有多大距離。的確，由於生活的單調，由於排斥一切行動自由的工廠紀律的不斷壓迫，由於對婦女和兒童的殘酷剝削，它在許多方面還不如流氓無產階級。

因此，工人無產階級里就沒有流氓無產階級中比較強有力的分子的那種膽量。這樣它就變得不那麼敏感，但它並不因此擺脫它的粗暴。在這種情況下，要存有解放的念頭是完全不可能的。只有在很長的時間以後，人們由於進行不斷的階級鬥爭，才能希望從那似乎要使他陷入的看起來是絕望的泥沼中脫身出來。這個過程越是繼續下去，由於當時的環境而顯現出來的富有人性的傾向也愈能發展和成長。有利於這些傾向的事實是：由於革命及其所產生的後果，甚至為反對無產階級而制定的刑法也開始喪失它們以前所具有的殘酷的性质。

所有這些原因造成了我們已經講到的結果，即：無產階級的革命分子已經顯出是一個充滿着使人賦有人性的最大的力量的階級，特別是在十九世紀所發生的運動中；他們愈來愈脫離了那種成為法國大革命時期他們的先驅的特征的、連恩格斯也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初期在英國工廠工人中間看到的殘忍的野蠻行為。與此同時，導致恐怖統治的種種原因消失了。在這恐怖統治瓦解以後，比較有遠見的同情無產階級的人們已經清楚地認識到，恐怖統治

并不能够导致任何以资产阶级社会为基础的解放。他们得出结论，这个目的只有通过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采用共产的办法才能达到。但是他们在资本家中间找不到必要的物质条件，在无产阶级中间也找不到精神条件；并且他们看不到经济发展和阶级斗争正在起着产生这些条件的作用。因此，他们力图解决社会问题，企图找到一个在他们掌握了必要的手段以后似乎就能立即实行的计划或公式。如果革命的无产阶级接受这种思想，不是向某一位仁慈的百万富翁而是仿照第一巴黎公社的榜样向政治上的垄断求得权力，每一个这种企图当由政府中的少数人实行时，就必然会导致与第一巴黎公社的统治相同的恐怖统治。无论如何，这种企图至少是合理的。它并不想要避免资产阶级社会的后果而又保全这个社会，而是企图利用摧毁其基础的办法来消除那些后果。不过，只要缺少那种唯一能够扫除他们想要加以摧毁的基础的社会条件，在企图实行这个计划的时候，甚至这种努力也一定是徒劳无功的。这将意味着少数人企图以不可能办到的、或至少是毫无效果的、甚至是违反对方利益的事情强加在多数人身上。只有借助于最后必须用屠杀来实行恐怖统治的暴力手段，那种计划才有可能实现。

这种努力失败了，不仅因为当时的工人群众还不过是在逐渐抱有社会的观念，而且因为无产阶级已有好几十年没有保持它和巴黎的小资产阶级共同占据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它在一七八九至一七九四年同巴黎的小资产阶级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第二巴黎公社确实给与无产阶级以支配巴黎的权力，但它并没有获得支配法国的权力；并且即使在巴黎，社会主义者也不是多数派。事实上，这些社会主义者没有稳固的理论基础，因此他们是非常慎重和谦逊的。在巴黎公社以后，当马克思主义开始被群众所接受时，他们才找到了一个比较坚强的基础。那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四十年代发表的并在五十和六十年代使其更加深刻和丰富的学说；换句话说，那就是历史唯物论。他们具体地阐述了关于历史的纯粹自然发展的思想，按照他们的想法，历史的发展是受经济关系的发

展支配的。根据这个观点，他們了解到，資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一定会造成那种終于使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成为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条件；但他們同样承认，只要轉变的条件还没有成熟，想用第二种的生产方式来代替第一种的任何努力都是劳而无功的。

因此，在这些人看来，社会主义者的任务不再是找到一个可以提出并在一切条件下采用社会主义的全面社会化的計劃或公式。他們必須研究經濟情况，并且作为自己的研究的結果，闡明对一般社会所必須采取的步驟，同时为推行那个步驟而努力奋斗。換句話說，那些社会主义者从此以后并不仅仅关心于推行社会主义了。当社会主义还无法推行时，他們就不得不关心資本主义工业的条件，并要求那些条件向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方向发展。但是，这一点决不是那些社会主义者本身所能立刻理解的。事实上，甚至在国际工人协会，社会主义者們在几年之后还瞧不起自由貿易和罢工这类問題，因为这种事情并没有影响工資制度。正是馬克思和恩格斯使工人們認識到无产阶级爭取解放的斗争以及当时資本主义制度的种种經濟問題与矛盾的重要意义。在接受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无产阶级看来，社会主义已經不再是在任何地方和在任何条件下都可以立刻加以推行和实现的东西了。即使在无产阶级已經取得政权的地方，它也只能推行在当时条件下可以实行的某种性质的社会主义，而其所采取的形式也必須符合那些具体的条件。根据这种看法，社会主义就不能通过政变来推行。它势必是长期历史过程的結果。同时，社会主义者永远被要求在任何特定的时刻只从事于在当时的物质和精神条件下可以办到的事情。因此，如果每一件事都經過适当的考虑才見諸行动，社会主义者就不可能在所进行的工作方面遭到失敗或陷于絕望的境地，而絕望的境地是会迫使他們違反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精神并借助于恐怖手段的。

事实上，自从馬克思主义領導了社会主义运动以后，甚至到世界大战开始时为止，社会主义运动在其每一个行动上一直能够避

免犯严重的錯誤，而利用恐怖手段来实行任何計劃这一想法，已經完全从它的綱領中取消了。很多事情对这种結果作出了貢獻。在馬克思主义成为最有力量的社会学說的同时，民主制度已經在西欧扎了根，并且由于它在那里斗争的結果，已經开始构成政治生活的一个坚实的基础。因此，不但无产阶级的思想教育和組織得到提高和巩固，而且对于經濟条件和阶级力量的对比的認識也有所增长。一切異想天开的冒險行动被消除了，而作为阶级斗争的手段的内战也是如此。一九〇二年我在拙著《社会革命》这本小册子（第六章民主制度）中写道：

“即使沒有其他原因而只是因为民主制度使較高形式的革命斗争成为可能，它也是具有最高价值的一种制度。这个斗争将不再像一七八九年或一八四八年那样由无組織的群众进行的斗争，那时他們沒有受任何政治教育，不了解进行斗争的各个方面的力量对比，不能比較深入地弄清楚斗争的目的和解决斗争的手段。它将不再是一个由那些輕信各种謠言的、受各种偶然事故支配的群众所进行的斗争。它将是一个由有組織的进步群众所进行的斗争。这些群众意志坚定，善于思考，既不乘一时的高兴而人云亦云，也不对任何不利的局势惊慌失措，更不由于失敗而垂头丧气。另一方面，选举和竞选的方法使人們有可能估量自己和他們的敌人的实力。它們有助于清楚地了解各个阶级和政党的力量对比。而且，它們可以防止过分急躁的行动和避免挫折。它們也甚至有助于使对手自己認識到他的地位的脆弱，并且往往可以使他自願放棄他的地位，如果放棄与否对他來說也許已經成为生死攸关的問題。这样，整个的斗争就变得不像从前那样殘酷无情，如果它不依靠沒有把握的机会的話。”

由于所有这些条件合并发生的作用，由于工业无产阶级的形成，由于工业无产阶级的水平之高于流氓无产阶级，以及由于社会主义理論的发展和民主制度的建立，那时就有可能把恩格斯于一八四五年在其所著《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中表示的悲观的忧

慮拋開。他說：

“如果到那時英國資產階級不變得聰明些（按所有的跡象來判斷，這是不可能的），那麼革命就會到來，這次革命將是過去任何一次革命都不能相比的。被逼到絕望地步的無產者將要像斯提芬斯向他們宣傳過的那樣去放火；人民復仇的怒火將迸發出來，來勢之猛就連一七九三年也不能與之相比。窮人反對富人的戰爭將是人們之間進行過的一切戰爭中流血最多的一次戰爭。”^①

必須說明的是：只有當一次革命在恩格斯所預料的時候爆發，他的憂慮才是有充分的理由的。甚至在四十年代，儘管不發達民族的群眾、特別是愛爾蘭人已經從事工業，他的憂慮還是多少有些夸大。但是恩格斯本人希望，如果革命不會馬上到來，無產階級就有時間發展自己，接受一種社會主義的精神，從而使革命採取某種比較溫和的形式。

“無產階級所接受的社會主義思想和共產主義思想愈多，革命中的流血、報復和殘酷性將愈少。”恩格斯所預料的革命在一八四八年到來，但並沒有發生在英國。在革命爆發以後，歐洲各國開始了一個資本主義發展的時期，與此同時，工人階級的經濟、文化和精神力量也有了增長。

在歐洲一些最先進的國家里，情況改變得很快。早在一八七二年，即巴黎公社之後的一年，馬克思表示希望在美國、英國和荷蘭這樣一些國家里無產階級將採取一種和平的方式。自從那個時候以來，無產階級的興盛已經帶來進一步的發展。然而，凡是对問題了解得深刻的人沒有誰會認為像德國、奧國和俄羅斯這樣一些以軍國主義為基礎的國家可以單靠武力加以推翻。但是，即使在這個問題上，人們也不大想到用真刀真槍實行屠殺，而是越來越想到唯一最宜於無產階級達到其目的的手段，即拒絕工作，或者換句話說，就是罷工。當時看得很清楚，德國和俄國的舊制度的人們將

^① 《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85頁。

力求借用武力来粉碎任何想要推翻他們的企图。但是，当无产阶级掌握政权时，它的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居然像十八世紀末所发生的情形那样重又借助于杀戮、报复和残酷性，这是誰也沒有料到的。这种行动使得整个的发展颠倒过来了。

恩格斯在其所著《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一书中相信以后的无产阶级革命将不断地减少殘暴，同他的看法相反，近来在题目叫做《社会主义由科学发展为行动》一书中討論了另一种見解，这个見解也出现在布哈林写的《共产党人的綱領》（祖里克，一九一八年）一书的序言里。那篇文章中写道：

“在任何国家里，资本主义越是发达，它的沒有防御的斗争就愈加不顾一切，因而无产阶级革命也就愈加惨烈，胜利的工人阶级用以踐踏失敗的资本家的手段也就愈加残酷。”（第 19 頁）

这是同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預料完全相反的。因为它把近十八个月来布尔什維克普遍推行的做法規定为整个社会发展的一般規律，那就格外錯誤了。它是錯誤的，因为它把这些做法說成是资本家們沒有防御的战争的鹵莽和殘暴的結果。关于所有这种殘暴，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的彼得堡和莫斯科都找不到什么迹象；在最近的布达佩斯更其如此。但是，无产阶级革命越来越变得极端惨烈，却完全是事实。其所以有这种情况，依我这种“頑固的老朽”或“愚蠢的老朽”（布哈林，同上书，第 22 頁）看来，无论如何不能归因于资本主义的殘暴，因为在卷入世界大战的各国，资本主义的殘暴是像在上次革命开始时的德国一样明显的。

战争的影响

在至今有案可稽的提高人性的发展过程中，变成向殘暴发展的真正原因在于世界大战；但甚至在更早的时期，就存在着不利于提高人性的一般趋势的其他因素。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由法国革命本身暴露出来的。那就是革命政权认为必要的普遍兵役制，目

的在于調动优势兵力和不断补充缺員来对抗那些联合起来进行干涉的君主的职业軍队。当法国又已拋棄这个制度时，这些君主国家只有一个国家加以采用，并在事实上加以維持和扩大。那就是普魯士这一个边疆地位最为不利的在欧洲强国中最近崛起的和最小的国家；它的生存要求建立一支按人口比例來說远較任何其他国家为大的軍队。撇开这个事实不談，旧的普魯士由于种种純屬自然的原因，被认为是大国中間的一个晚子和最穷的国家。所以，如果它真正想要主張自己的权利，其他的一切考虑就非顾全軍队不可。結果，自从它嶄露头角，列为强国之一的日子起，它就是一个最杰出的軍国主义国家。美国大使盖拉德在其論述德国的著作^①中作了几点說明，这些說明非常清楚地揭露了普魯士的軍事职业。

由于实行普遍兵役制和主張一般的軍国主义，普魯士在一八六六至一八七〇年之間在西方达到了它的权力的高峰。結果，欧洲大陆其余的国家也不得不实行普遍兵役制，并且大約就在这个时候，铁路系統成了战争行动中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所有的陸軍强国都企图不遺余力地扩大这个系統，从而有必要不断增加武装力量——換句話說，越来越严格地实行普遍兵役制。于是我們終於得到了这样一个光荣的成績：全部男性人口，除非患有殘病或体格不合条件，都被迫参軍！但参軍意味着使自己习惯于杀人并在杀人的行动上进行竞争。它表明人类的感情和文化的削弱，以及殘暴的养成。在十八世紀，当只有人数不多的职业軍队（国民軍）的时候，广大的人民群众在道德上沒有受到这种影响；可是，由于实行了普遍兵役制，人民在十九世紀的期間变得越来越殘忍，特别是在普魯士。

十九世紀的提高人性的努力因此就完全徒劳无功，并且还受到十分不幸的影响。这种提高人性的努力在知識分子中間本来是

^① 盖拉德：《我在德国的四年》，倫敦 1917 年版，第 447 頁。

宣揚得最响亮的。他們一直在很长的时期內免服兵役，甚至在实行强迫征募而不是志願投軍的办法时也是如此。在征兵制度下，首先受到影响的，只有农民、手工业者和各劳动階級；资产階級和知識分子是免服兵役的。另一方面，普遍兵役制却終于使他們不能成为例外。当时需要有指揮預备軍的軍官。不过在此以前，正如在以后一样，受过教育的人在兵役方面占据了一个特殊的地位。那个地位沒有把他排斥于軍隊之外，而是使他在軍隊本身之內享有某些特权，成为限期一年的志願軍和后备軍官。結果，知識階級在他們的思想 and 感情上受到軍事力量的影响，并且事实上这种影响比其他階級所受的同样的影响格外来得深刻。因为兵役使他們占据特权地位，同时还在他們的心中养成了对于軍隊生活的某种兴趣。此外，設置职业軍官的制度也加强了軍隊的吸引力。在那些把服兵役当作終身职业的人看来，这并不单纯是一种暫时的活动形式，他們必須在一切战争策略上采取主动，使他們的团队在陣容和作战能力上胜过其他的团队，因而他們养成了黷武主义的特性，其程度比那些仅服短期兵役、甚或被迫这样做的普通人为深。

因此，知識階級比其余的人口更深刻地受到黷武主义的影响。而且，专门职业带来一种倾向，往往用一种绝对的过激的方法——这种方法毕竟是同极反动的思想方法十分吻合的——来闡釋一切观念和概念，而那些通过实际的經驗了解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障碍的人們却沒有那么趋于极端。知識階級中希望成为預备軍官并以职业軍官为模仿对象的人們，很容易地适应了黷武主义，带头提倡了由普遍兵役制所产生的立刻感染到全体人民的粗暴和暴戾。甚至在这方面，普魯士也是走在其他国家的前头；因为它首先推行了为期一年的义勇軍和預备軍官的制度，比其他任何国家更高地把預备軍官提升到一个令人垂涎的特权地位。然而，尽管存在着普遍兵役制，无产階級的提高人性的倾向却由于它的階級地位的关系比黷武主义的殘暴影响更为强烈。就知識階級、特别是普魯士的知識階級來說，曾竭力抑制这些倾向，从而大大地助长了階級对

立和階級鬥爭的酷烈程度。

这里关于知識分子所說的話可以特別适用于資本家，因為他們的人道本能由于他們的地位关系，从一开始就碰到一些比它們更强的敌对力量。所以，当战争爆发并在实际上把全部健康的男子拖在它的后面达四年之久的时候，黷武主义的粗暴傾向便陷入殘忍的深处，缺少人类的感觉和感情。連无产階級也不再能够不受它的影响。无产階級在很大程度上沾染了黷武主义，当它重返家园时在各方面都变得殘忍了。由于养成战争的习惯，从前綫回来的人往往抱着这样的心情和感情，甚至在承平时期和在自己人中間都动輒用暴行和流血来坚持他的要求和利益。这可以說是成了內战的一个因素；它还进一步促使群众成为純粹的生番。尽管如此，許多比較成熟的人一旦摆脱了战争的影响，却非常容易恢复他們在承平时間所养成的思想方法和感情状态。但是以青年而論，情况就坏得多；因為他們沒有受到教育和指导，已經无力抵抗四年战争期間盛行的殘暴影响，因而也就已經获得了他們終生所不能完全磨滅的印象。

除此以外，在无产階級的状况中还有一个異常深刻的变化在起着作用。战争已經十分严重地影响了中小階級，贏得了他們队伍中的許多成員并迫使他們加入无产階級。而且，至今对无产階級一切階級鬥爭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的这些分子，一直沒有接触到无产階級在社会主义政党领导下进行階級鬥爭时所获得的組織紀律和組織能力。这些社会主义政党不辞劳瘁地启发和組織群众；甚至在至今已被組織起来的无产階級的內部，也已經发生了十分深刻的变化。同所有工人的情况一样，战争时期熟练工人由于死亡或由于受伤和患病比在承平时期减少很多。

同时，对于新一代簡直沒有什麼准备。沒有時間或力量来教育青年，并且也缺乏为从事这种活动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当时兴起了仅給熟练工人提供狹小活动範圍的單調得多的軍需工业，以代替存在于承平时期的各类工业；每一工人只需学习使用一点

机器，这种机器那怕是最不熟练的徒工也是能够同样操纵的。結果，曾对德国工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熟练工人在战争期间人数大为减少；代替他们的是一批突然产生的在人数上增长得很快的不熟练工人。熟练工人有过完美的组织和受过良好的教育，对于一切劳动阶级具有最清晰的想法。不熟练工人是没有组织起来的，他们是无知的、漠不关心的。他们的冷淡态度在战争期间肯定是有转变。因为这个巨大的事件及其可怕的后果惊醒了每一个人，连人民中间观念最模糊的人也不例外，并且使他们极度激动。可是，与此同时，同那些在各方面都无知的和缺乏修养的不熟练工人相比，以及同那些被迫落入无产阶级的中小阶级相比，根据社会主义学说教育起来的熟练工人的人数却减少了。因此，受有较高教育和具有较高技能而一直领导无产阶级的少数人就逐渐丧失他们的领导权，代之而出现的是无知的盲目热情。这种情况格外容易发生，因为战争带来了最严重的经济混乱、大量的失业、物价的高涨和日用必需品的匮乏。所以绝望的群众要求最剧烈的改变；事实上他们的目的并不在于建立一个他们确实没有考虑过的较高形式的新社会，而是在于立刻摆脱他们的可怕的困境。在无产阶级看来，改变它的不幸的处境始终是一个迫切的问题。主要是这个原因说明了，由于要想了解马克思主义，必须具备大量的经济和历史知识，所以马克思的思想方法从来就觉得很难在工人阶级中间生根。群众在本能上所愿意接受的，不是一种导向发展道路的学说，而是一种能够提供一个公式或计划，使他们在实行之后无论如何都可以从他们所遭受的苦难中摆脱出来的学说。对于一个无产者说来，要承认一种学说，这种学说肯定地并不希望他处于单纯的消极等待的状态，而是激励他继续努力进行阶级斗争，但又使他的最后解放要取决于一种必须首先加以发现和创造的发展方式，那在他这方面总意味着某种程度的忍从。在战前的最后几十年中，无产者的处境不论如何艰难，他的状况还能让他勉强生活下去，因此社会的刻不容缓的改变对他来说并不是个有关生死存亡

的問題；至少在那些构成社会主义运动和阶级斗争的核心熟练工人看来是如此。今天，这些工人是一切政治和经济斗争中的地位被不熟练的工人所代替了，而不熟练工人的绝望境遇已使他们达到无法等待的地步。事实上，当战争的结束终于把政治权力放到他们手里的时候，他们又何必等待呢？

战争不仅已使工人阶级中最坚定的分子加入阶级斗争的最前列；同时由于军队的崩溃，特别是在欧洲经济上最厚实的那些地区，战争也已经在各个城市中产生了无产阶级，而与此相比，像在俄国可以找到的那种不识字的农民则还没有能够获得任何真正独立的政治权力。任何一个阶级都不会自动放弃它为自己所争取到的权力，不论使它居于显著地位的形势是怎样的形势。由于他们本国的落后状态，如果要求俄国和匈牙利的无产阶级作这样的放弃，那是愚蠢的。但是，一个由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领导的社会主义政党会使胜利的无产阶级所面临的当前各种问题适应于现成的物质和精神条件，而不会不假深思地力图在俄国这种资本主义生产不发达的国家立即采取全面国有化的政策。

究竟这样一个政党能否领导群众，肯定是一个疑问。在讲究实际的政治家看来，比较重要的是在当时实行统治，而不是抱着正当的终极目的冒经济上失败的危险。讲究实际的政治家不愿处于在目前会引起民怨的地位，因为一个超过现实可能性的政策之必然归于失败是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他希望避免失败，希望他的理想不致连带受到损害。实际政治与理论政治之间、拉萨尔与马克思之间的旧的对立，在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以后又发生了。马克思在一八六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写给库格曼的信（我把它发表在一九一八年五月一日的《社会主义者》刊物上）里说，由于一八四九——一八五九年的反动，德国工人竟堕落到“对这位答应帮助他们一跃而进入天国的自吹自擂的救主表示欢迎”^①。这种“手段”和这种

^①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信》。《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77页。

“救主”是不合馬克思的脾胃的。可是，正如在拉薩尔的那个时期一样，俄国第二次革命的时期即使具有截然不同的理由，也证明是对馬克思的学說极端不利的。俄国工人階級中那些根据馬克思的方針培养出来的人們已經死亡，或者被突然觉醒的落后群众扫除了。当初占据上風的是以布朗基、魏特林或巴枯宁为代表的前馬克思的思想方法。这些就是首先在俄国、以后在邻近一些国家的革命发展所面临的状况。因此，难怪革命只是重新唤醒了原始的思想方法，并让政治和社会方面的殘忍的、凶恶的斗争方式显露出来，而这些方式我們是有理由相信本来已經被无产階級的理智和道德的进步克服了的。

第八章 共产党人的活动

剝夺和組織工作

世界大战使工人階級無論在道德上和精神上都后退了一步。它几乎使每一阶层的人民都殘暴起来，它把无产階級中最缺少修养的分子放到运动的最前列，終于大大地增加了无产階級的貧困状态，因此它带来的不是从容的思索和考虑，而是絕望。战争发展了軍事的思想方法，从而也助长了工人階級中的原始思想。那种思想方法同一般不学无术的人暴露出来的思想十分接近，因为他们认为單純的权力是世界史上的决定因素，仿佛你只要拥有必要的势力和帶有莽撞的作風，就无往而不利似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經常抨击和反对这种想法。在恩格斯的經典著作《反杜林論》里有三章專門討論“暴力論”。^① 这个理論是彻头彻尾反馬克思主义的。只要这个理論以革命的形式出現，恩格斯就毫不犹豫地加以抨击。他不像今天有很多人主張的那樣，认为只要一个运动是革命无产階級运动，就决不应当揭露它的种种錯誤，理由是如果这样做的话，就会削弱革命的力量。十分明显，我們不应当过分苛刻地批評革命中的錯誤和缺点。最困难的历史情况就是革命的历史情况，因为你面对着一个不可能全盘观察的嶄新的局势。假如一个观察者本身处在安全的地位，或者从远处进行考察，却过分严厉地譴責那些置身在斗争的中心并担負斗争的一切責任和危險的人們所犯的錯誤，那就是最廉价的伪善形式。但是另一方面，如果錯誤

^① 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162—190 頁。

不是起因于可以想像得到的对于情况的了解不实或了解不足，而是起因于本来对事物基本上抱有不正确的看法，那就绝对有必要来谴责那些错误。只有纠正这种看法才能避免错误；如果我们把那些错误轻易放过而不加批判，甚或为了假想的革命利益而为之辩护和加以颂扬，它们就只会使未来的每一个革命运动遭受损失。

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让自己受到妨碍而不通过他们“火爆的脾气”对革命作这种必要的批评，这可以从恩格斯于一八七三年秋在《米比锡人民国家报》上发表的批评文章获得证明。在西班牙共和国于当年七月五日宣布成立后爆发的起义，除了少数的例外，实际上早在一月二十六日就遭到了挫折，虽然迦太基人把起义延长到一八七四年一月八日。因此，甚至在起义被彻底镇压下去以前，恩格斯就发表了一篇十分尖锐的批评文章，反对“这种绝对丢脸的起义……它应当成为世界其余部分的前车之鉴”。

恩格斯的这个批评用《巴枯宁派的活动》这一标题以连载的文章的形式发表（十月三十一日、十一月二日、十一月五日《人民国家报》），一八九四年重刊于《人民国家国际》杂志（柏林“前进”版）。

我们奉劝所有热衷于布尔什维主义的人们读一读这篇文章。这是因为，既然西班牙革命的形势有许多地方同今天的公社的形势相类似，那篇文章就在很多方面预先提到了布尔什维主义。恩格斯首先谈起西班牙的国际成员大部分属于巴枯宁同盟这一事实，然后接着说：

“一八七三年二月，当共和国宣布成立时，西班牙同盟派处于一个十分困难的地位。西班牙是个非常落后的国家，根本谈不上立刻实行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在可能实行这一点以前，西班牙必须在发展道路上经历若干准备阶段，清除前进道路上的重重障碍。共和国让全国人民有机会在尽可能短暂的时期内经历这些准备阶段，尽快地排除那些障碍。但是这个机会只有通过西班牙工人阶级实际参加政治活动才能加以利用。”（第17—18页）

但是，那就意味着要参加议会的选举并积极参加议会的活动。

可是巴枯宁派却要想一下子求得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就西班牙当时的形势而论，议会民主虽然在使无产阶级获得发展和变成成熟方面是个必要的手段，却根本无法用来达到上述的那种目的。参加“任何种类的选举在他们看来都是十恶不赦的罪行”。

那时他们想用什么东西来代替竞选运动呢？作为“一下子彻底解放工人阶级”的手段的工人代表苏维埃还没有被发现。巴枯宁派宣布了总罢工，并把西班牙划分成无数的小的区域；此外在一开始就把整个运动分裂为一系列局部的运动，并宣布革命。这一段历史的结果不仅是运动的瓦解、西班牙国际的毁灭，而且也是“巴枯宁派至今所宣扬的原则的破产”（第 32 页），因为他们迫于形势，不得不逐一放弃那些原则。

今天在俄国的情况是否有什么不同呢？固然，在俄国工人阶级中爆发现在这次革命的时候，占统治地位的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社会主义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像在俄国这样获得普遍的承认。

俄国社会主义者在几十年的期间自愿地做了必须做的事情，并从他们土地问题的落后性中看出某种好处。他们认为农业共产主义关于土地的措施使他们特别容易建立并建成现代社会主义。由阿克雪里罗得和普列汉诺夫领导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很大功绩是：争取承认这个看法；鉴于俄国无产阶级和俄国一般社会的不发达状态，经过长期的令人厌倦的斗争终于能使不可避免的革命从一开始就只带有资产阶级的性质，即使无产阶级被要求在革命中间起一种突出的作用。只要革命不使那把立即解放的问题列为纲领的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只要知识分子以及工人阶级中一定的高级阶层明白宣布信仰社会主义，上述的看法就能在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取得胜利。俄国人民只知道他们的需要和要求，根本不管他们所想望的事情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否能够办到或是否与社会有利；当革命推动了真正广大的俄国人民时，始终如一的马克思主义便落入了十分困难的境地。在布尔什维克看来，马克思主义

沒有控制局勢的能力。群眾心理學支配着他們，而他們也毫無節制地對它入了迷。無疑地，由於這個緣故，他們已經變成俄國的統治者。所有這一切將會和必然導致什麼結果，那完全是另一個問題。他們由於把群眾的盲目意志看作革命的動力，就放棄了他們曾經在很大程度上幫助它順利地扶搖直上的馬克思主義體系。由於他們具有科學知識，由於馬克思的名字深入人心，他們認為採用了馬克思的一個口號、即“無產階級專政”這一口號，就算已經解決了一切問題。他們希望用這幾個字眼來推卸他們的違反馬克思主義精神的種種罪責。

這場革命是作為戰爭的一個結果而發生的。士兵們厭倦戰爭，不願意再打仗。布爾什維克使自己成為不願繼續作戰的心理的最不可輕視的代表人物。他們堅決主張用一切辦法瓦解軍隊，根本不問這種做法是否幫助了德國的軍事獨裁政府。如果說這個軍事獨裁政府沒有獲勝，結果發生了德國革命，布爾什維克當然是並不對此負責的。

軍隊的徹底崩潰給了下層階級以完全的自由。農民立刻堅持要沒收地產，把它分割成私有財產。當時不能不把這些大的莊園移交給農民，但是問題本來可以解決得比較圓滿，使得這些莊園所提供的技術上的好處不致喪失。不過那樣就需要時間，而且農民也不願等待。

布爾什維克在鄉間製造混亂，聽任每一個村落自由行動，從而把農民爭取到自己這方面來；因此這些莊園被十分幼稚地破壞了，技術喪失了，許多生產資料損毀了。另一方面，農民完全讓布爾什維克在他們已把工人階級爭取過來的城市里採取自由行動，作為報答；所以工人階級僅僅聽從布爾什維克的指揮，不去考慮實際的局勢。

這時無產階級正在挨餓。它覺得自己遭受壓抑和剝削，所以它越來越熱烈地要求立即擺脫資本主義的奴役。為了要滿足它的願望，就沒有時間來研究或思考了。受到了幾下沉重的打擊以後，

俄国資本主义的整个大厦变成一片瓦礫。以社会主义代替資本主义包含两个問題——一个是所有權問題，另一个是組織問題。它要求廢除生产資料的私人所有制，用一种国家的和共产主义的所有制的形式来改造社会上的财产。它也要求用社会主义方式代替資本主义方式，把管理工作和諸如此类的一切职能組織在一个完整的經濟整体之内。在这两种改造中間，有关所有制的改造是比較简单的。沒有什么事情比剝夺一个資本家更容易的了。那单纯是一个暴力問題，并不和任何社会理論有必然的联系。早在有所謂工业資本主义以前，即在单纯的商业和金融資本的时期，我們就看到通过封建贵族和君主，并且事实上还通过人民本身，发生沒收商人、銀行家和放債人的财产的相类行动。在中世紀，不仅犹太人往往被沒收财产；而且，即使人們对宗教十分虔誠，一个教堂的或某一个教团的财产也有时会被充公。例如，法国的菲力普四世在十四世紀初期沒收了非常富有的圣堂武士团的财产。早在有近代社会主义这种学說以前，許多善良的、天真的人們就往往把劫富济貧的俠盜看作是人类的保护者。实行这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是十分容易的。这是同俄国无产阶级的不发达状态相一致的，所以巴枯宁在一八六四年、即在战争和巴黎公社之前不久，在共致当时俄国青年的宣言中指出了俄国盜魁斯青卡·拉辛所走的道路。拉辛在一六六七年組織了一伙盜賊，他同他們在俄国南部一起生活了整整四年，最后为政府击败，延頸就戮。

組織工作不像剝夺那么容易。一个資本主义企业是一个复杂的組織，它的运筹調度的中樞在于資本家本人或他的代表。如果想要廢除資本主义，就必须建立某种組織形式，可以在沒有資本家主持的情况下，即使不更好地也至少同样有效地发生作用。这就不像菲力普四世或斯青卡·拉辛所采取的办法那样简单；因为它要求有一整套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条件，要求有一个不但关于生产而且关于原料进出的高度发展的資本主义組織方法。除此以外，它还要求有一个不但了解自己對邻人和同志的义务、而且了解自

已对整个社会的义务的无产阶级；其次，这个无产阶级通过长年累月的集体组织生活，已经习惯于自觉自愿的纪律和自我管理；最后，这个无产阶级有很强的理解力，善于辨别可能办到的事和不可能办到的事，辨别品德高尚的受过科学教育的领袖和没有心肝的无知偶像。只要这些条件还不具备，社会主义就不能有效地和一劳永逸地取消资本主义。即使在这些条件已有充分高度发展的那些地区和那些工业部门，也必须预先对实际情况进行慎重的研究，才能制定社会主义的组织方法。因为新的组织暂时所采取的形式，对于一切工业部门、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来说，未必就是最好的形式。它们不是“现成的乌托邦”或永恒的“理想”。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可以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要想获得成效，就必须根据当时具体的条件尽可能实事求是地加以修改。

但是，如果不希望在至今所存在的生产状态之后紧跟着发生混乱和绝对停顿的现象，那就必须使社会化的两个因素、即剥夺和改组始终保持最密切的联系。菲力普四世或斯青卡·拉辛可以把他们的活动仅限于剥夺，因为他们不打算建立某种新的生产秩序。靠这种简单的手段是不可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群众是性急的。他们不愿等待。为了满足他们的欲望，布尔什维克在掌握政权以后，便把社会化的方法一分为二。他们把它的两个因素互相分开，虽然它们是不能单独存在的。他们起先从模仿斯青卡·拉辛的有效的方法入手，后来才竭力从事于组织工作，使其尽量能发挥作用。这两件密切相关的只能同时配合进行的事情被割裂开来了。列宁本人于一九一八年四月在其所著《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书中就承认了这一点。

“到目前为止，居首要地位的是采取措施直接剥夺剥夺者。现在居首要地位的，是在资本家已被剥夺的那些企业和其余一切企业中组织统计和监督。”^①

^①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25页。

“在无产階級领导下，我們組織的对产品生产与分配的全民統計和监督的工作，大大地落后于我們直接剝夺剝夺者的工作。……在这些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上，我們还极为落后(而这都是极其重要的方面)，其所以落后，正是因为統計和监督一般都沒有很好地組織起来。”^①

当时並沒有設法去了解是否有可能根据社会主义的方針組織一切企业和生产部門，便貿然加以沒收。甚至在那些本来可以进行这种組織工作的部門，他們也首先以沒收为滿足；因为只有这个工作可以預先不作准备就着手进行，同时也因为工人階級不願等待。但是后果很快便显露出来了。由于俄国的工业同它的农业生活比起来只占用人口的很小一部分，它的經濟生活是落后的；但在工业內部，最新式的利用机器的大規模的生产占主导地位，它們已經远远地超过了一八七一年巴黎的工业状况。因为在这后者，就可以算作社会化的成分而論，只有生产組合的形式才具有任何实际的意义。

俄国的工厂大部分是大企业，因此在廢除資本主义以后似乎首先必須要完成的工作，就是把那些企业收归国有。在生产組合中，工人的工資取决于他的工作和他的伙伴。这种工資的尺度由运往市場的产品的数量所决定。生产組合本身必須照应原料的买进和卖出。在国有化工厂中，工人們不再像以前那样向資本家領取工資，而是向国家領取工資。他們的工資的最高額与其說是取决于他們生产活动的程度，还毋宁說是取决于对国家政权的压力的强弱。国家政权也必須照应原料的买进和卖出。需要有一个訓練有素的、具有高度理智的工人階級，这个工人階級認識到社会的繁荣、因而也就是他們自己的幸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們的劳动生产率，以便在这些条件下使生产富有成果并保持这样的状态。而且，只有采取一些除工人、国家管理和消费者之外能对单独企业

^① 《苏維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29—230頁。

和整个工业部門发生必要影响的必不可少的組織措施，只有建立工作的奖励制度以代替資本的占压倒优势的活动能力，才能希望这种工人階級踏踏实实地进行生产。

但是，从那个时候起，工人階級不但沒有組織起来，而且也缺少必要的理智和紀律。因为战争及其后果已使无产階級中最无知和最落后的部分兴奋到了最瘋狂的地步，情况就显得格外突出。可以肯定，俄国的工人已經从他的农村公社获得了高度的团結一致的观念；但是他的势力范围像村社本身一样是很有限的，因为它事实上只限于他自己的同志們的一个非常狹小的圈子。比較扩大一些的社会上的团結一致，对他來說是一件无关重要的事情。布尔什維主义者引以为憾的，正就是从这种情形所产生的不幸的后果。托洛茨基在其所著《工作、紀律和秩序可以挽救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一书的第 17 頁上說：

“革命在最受压迫和蹂躪的人們的心中喚起了人格感，因而它在这种感觉觉醒之初自然就帶有明显的无政府主义的性质。人格的一些基本本能的这种觉醒，往往表現出一种濃厚的自利自私的性质，或者用哲学的術語來說，即自我中心的性质。它力图为自己获得一切可能获致的东西。它只想到它自己，根本不願重視整个階級的观点。这样就产生了我們特別在全国下层群众的較广范围内以及在早期軍隊中和工人階級某些成員中所看到的各种各样扰乱秩序的叫嚷以及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和貪婪的傾向的泛濫。”

这些性质和巴黎公社中表現的性质截然不同，因为那里人們都滿足于最微薄的工資，以便促进社会主义。可是在俄国的情况下，在被沒收充公的企业中，生产所采取的方式是很清楚的。工資尽量提得很高，因而只存在着一种劳力的节省。为了实行方便起見，通过協議規定的工作被取消了。于是就有可能出現像彼得堡波契洛夫工厂的那种情形。那家工厂在向国家領取九千六百万卢布津貼的期間，总共生产了价值五千万卢布的产品。只是由于漫

无限制地使用紙幣，才得以避免似乎无法避免的破产。如果說在那些工厂里确是作出了一点成績的話，那显然就是工人們已从討厌的、骯髒的和費勁的劳动中抽身出来。鉴于这种劳动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怎样确立和保证这种劳动，就成为引起一切时代的社会主义者注意的問題。傅立叶认为解决的办法是雇用那些喜欢在泥坑里打滾的“拣垃圾的”青年来做骯髒工作。但是这种滑稽的解决办法显然不能令人滿意。事实上，既符合社会主义原則而又可以收效的唯一解决办法，是依靠技术科学来消灭在本质上令人生厌的、有損健康的工作中一切有害的和討厌的成分。如果这一点不能办到，那么除掉利用某些特权、即或者特別提高工資或者特別縮短工时来使这部分的劳动具有吸引力以外，沒有其他的途徑。

布尔什維克发现了一个新的解决办法。这个办法根本与社会主义的原則不符，而只是迎合了異常兴奋的劳动大众的群众心理。換句話說，他們推行了强迫劳动，但这种强迫劳动并不是为那些至今以工資为生的劳动者規定的。为什么要对他們实行强迫劳动呢？在新的局勢的影响下，許多工厂或者由于原料缺乏或者由于运输困难，不得不接二連三地宣告关門，因此失业工人的人数增加了。噢，不是的！强迫劳动只加在以他們不工作、即他們是資产階級为借口而已經剝夺了一切权利的那些人身上。苏維埃共和国不是建立正式的普遍民主制度，而是建立了无产階級的民主制度。只有那些工作的人才應該享受政治权利；只有他們才應該吃飽穿暖，并受到国家保护。懶汉应当被剝夺一切权利。

这显然是一个帶有一点小小錯誤的偉大社会主义的想法。工人代表苏維埃的共和国已經將近有两年只投工人們的票了。但是直到这一天为止，“一个工人的性格是什么？”这个悶葫芦还没有打开。我們从不同的共产党人那里得到不同的回答。起初，这些工人代表苏維埃不外是大工厂的工資劳动者的代表机构。它們以这个名义形成了对革命來說非常重要的明确的但有限的組織。“苏維

埃的观念”便开始以工人代表苏維埃的中央委员会来代替由普选产生的国民議會。虽然如此，如果中央委员会的建立仅以大工厂的工人代表苏維埃为限，它的基础就很不稳固了。但是，当他们走出这个范围，并且还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的时候，他们就立刻变得十分为难了。中产阶级同工人阶级的界线永远无法划分得很准确。在这种努力中，总会发生一些专断的行为，实际上使得苏維埃的观念特别容易变成纯粹独裁和专断统治的基础，而很少有助于建立并建成一个有系统的、鲜明的国家制度。

例如，就受过教育的阶级(知识界)来说，便完全要靠苏維埃当局来决定他们是否应当算作属于中产阶级。同样的原则适用于他们的选举权以及他们是否应从事强迫劳动。

在苏維埃共和国，资产阶级不仅必须遭受被无偿地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痛苦，也不仅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他们同时还是压迫的受害人，只有他们才要从事强迫劳动！在俄国，只有他们被迫工作，而同时又因他们不工作被剥夺了选举权！不仅如此，在苏維埃俄罗斯，一个人被划分为工人阶级或资产阶级，不是根据他当时从事的职业，而是根据革命以前他所担负的工作。在这一方面，资产阶级在苏維埃共和国似乎是一个特殊的人种，他们的特性是不能根除的。正如一个黑鬼始终是个黑鬼，一个黄种人始终是个黄种人，不论他容貌如何或穿什么服装一样；一个资产阶级分子也始终是个资产阶级分子，即使他变成一个乞丐或靠他的劳动生活。而他又是过的什么样的生活啊！

资产阶级被迫工作，但他们却无权选择最适合于他们的能力的为他们所熟悉的工作。相反地，他们不得不从事那种最骯髒最讨厌的劳动。他们所得的酬报，不是数量有所增加的口粮配给，而是几乎不足以疗饥的最低的定量。他们的食物定量只抵到士兵和受雇于苏維埃共和国所经营的工厂中的工人的定量的四分之一。如果后者可以得到一磅面包，前者就只能领到四分之一磅；如果后者可以得到十六磅马铃薯，前者只能领到四磅。从所有这些事实，我

們看到的不是一種想把無產階級放在較高水平以努力達到一個“新的較高的生活方式”的跡象，而只是無產階級以最原始的形式渴望復仇的表現。無產階級能夠踐踏那些由於自己的命運而曾經處在比較順利環境中的、現在在教育程度和衣着居住條件方面還比他們自身優越的人們，並且想用這個辦法來獲得幸福。

在解放作為革命動力的這種“意志”的過程中，布爾什維克在某些事情上所實行的放任自流，甚至大大地超過了他們原來的希望。因此，比如說，過去的資產階級現在已經變成被剝奪了一切權利的牛馬這一想法，使得以前受僱於這種資本家的工人們發布了摩爾齊洛夫卡的工人代表蘇維埃的如下布告：

“蘇維埃茲責成格雷戈里·薩列葉夫同志根據自己的選擇和命令，征發資產階級和金融家階級的已婚和未婚婦女六十名，並送往兵營，供駐紮在布里安茨區摩爾齊洛夫卡城的炮兵師之用。一九一八年九月十六日。”^①

把發布這個布告的責任放在布爾什維克身上，那是不公平的，因為這件事情肯定是違反了他們的意願，正如九月屠殺違反了巴黎國民議會的人們的意願一樣。但是，一想到在一個地方蘇維埃組織里，對於資產階級的仇視和輕蔑竟能達到這種程度，委實叫人毛骨悚然；因為這些人不但被剝奪了一切政治權利，而且甚至被剝奪了人類尊嚴的最起碼的尊重。

無產階級的發展

甚至布爾什維克都不能完全聽從採取這種形式的群眾心理，那是很自然的事。在他們剝奪了資產階級，說他們“像空氣一般自由”，並使無產階級變成一個“神聖的實體”之後，他們企圖教導一些改進這個“神聖的實體”的必要的方法，而事實上這種教育工作

^① 納特·文希-馬列葉夫博士編：《布爾什維克在干些什麼？》，洛桑 1919 年版，第 10 頁。

本来是应当作为一切社会化和沒收财产的行動的先决条件的。

“前一个时候我們已經知道，”托洛茨基說，“我們缺乏必要的組織、必要的紀律和必要的历史教育。所有这一切我們都知道，但它絲毫也沒有妨碍我們力求全神貫注地為我們自己取得政权。我們那时相信，总有一天我們會学习并安排一切事情的。”^①

但托洛茨基是否想爬上火車头并开动火車，相信他会在中途学习和安排一切呢？毫無疑問，他是完全有能力这样做的，但他是否有必要的時間呢？火車是否有可能立刻出軌或爆炸呢？在你想要开动一辆機車以前，你必須取得某种为駕駛機車所必需的技能。同样地，如果无产階級想要担任這項任务，它也应当取得那些在組織和生产工作方面必不可少的技能。因为这种組織工作不容許有真空，不容許有空虛的情形，也不容許停止不动；尤其是不容許繼續保留那种由战争所造成的状况，因为战争已經剝夺了我們的一切設備能力，以致我們由于生产停頓，不得不做一天吃一天，而有餓死的危險。列宁本人也已經认为有必要阻止采取剝夺的方法。

“如果我們現在仍然想用以前的速度繼續剝夺資本，那我們一定会失敗，因为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知道，我們組織无产階級的統計和监督的工作，显然落后于直接‘剝夺剝夺者’的工作。”^②

可是列宁不是个容易死心的人。相反地，他仍旧宣布，虽然有这一切情况，苏維埃人仍将贏得“反对資本的战役”；因为俄国无产階級的发展过程正在大踏步地前进。他說道：

“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一个条件，就是发展人民群众的文化教育事业。由于人民的內心已經开始表现出促进人生的‘动力’和首創精神，这个事业現在正在突飞猛进。”^③

① 托洛茨基：《工作、紀律和秩序将拯救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第 17 頁。

② 《苏維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225 頁。

③ 同上书，第 235—236 頁 [考茨基对这段引文稍有窜改。——譯者]。

提高人民群众的教育，可以采取双重的形式。它可以通过各级学校有步骤有系统地进行。在这方面，俄国还须完成大量的工作。一个适当的普及教育制度要求大量的资财和繁荣的生产状况，可以为这种事业提供巨额剩余。但是俄国的生产状况带来十分恶劣的后果，以致学校系统不得不受到严重的影响。当然，布尔什维克一向不遗余力地在群众中间传播艺术和科学的知識；但是他們的一切努力却深受他們所处的改变了的經濟状况的妨碍。由此显然可以看出，教育固然可以迅速地和很好地促进生产，却没有希望立即加以提高。相反地，这种生产的提高倒是教育的提高的先决条件。一般說来，成年人多半不再在国家或社会所設立的学校中学习，而是更多地在一生的学校获得知識。一个民主国家为他們提供最优良的教育方法，因为在这样的国家里，非常重视发表和討論意見的绝对自由。这就使每一个政党負有爭取解放人民的思想以及让社会的每一个成員能够研討各方面的論证的责任，以便每一个人通过这种方法养成独立判断的能力。

最后，阶级斗争从民主制度吸收它的最好的特色；因为在民主制度下，每一个政党都是向全社会发表自己的意見的。每一个政党当然为一定的阶级利益辯护；但它不得不指出这些利益与整个社会的一般利益息息相关的各个方面。这样，现代国家的民主政治要比狭隘的乡村教会政策和党同伐异的职业政治来得优越。在民主制度下，群众由于参与政治而大大地扩展了眼界。如果像苏维埃共和国那样把民主政治束之高阁，一味推行工人代表苏维埃的那种剥夺每一个“资产者”的权利并取消出版自由的独裁政治，那么，所有这些教育人民的可能性就会真正遭到損害。工资收入者的具体利益这样就同一般社会利益分开，同时工人本身也不能独立研討在各个阶级和政党的斗争中产生的种种論证。因为这种研討已由一个神气活現的当局替他指派好了，这个当局竭力想不让他知道各种可能使他怀疑苏维埃制度的神圣性的思想和感情。十分自然，这正是为了真理而应该发生的事情。一家资产阶级的

报刊拥有它的一切庞大的、强有力的机器，不应当让可怜的、无知的人民受这种报刊的欺骗和毒害。可是在今天的俄国，这种使资产阶级报纸对布尔什维克的报纸占据优势的强有力的机器在哪里呢？撇开这一切不谈，布尔什维克用以奴役报刊的严酷手段，不仅针对着资产阶级报纸，而且针对着并不效忠于现行政治制度的全部的报刊。

为这种制度辩护的理由不过是从这样一个天真的假设出发的，即：确实存在着一种绝对真理；只有共产党人才掌握那种真理。它也从另一个假设出发，即：所有的新闻记者根据他们的本性来说都是撒谎者；只有共产党人才是真理的狂热的拥护者。到处都有那种把他们所看到的事情信以为真的撒谎者和盲信者。可是，在那些不必担心受到压制而又只有某种倾向的报刊才有权利发言的地方，最容易滋生谎言。这样，报刊就简直有了撒谎的护身符，这种情况还鼓励了那些喜欢骗人的家伙。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权者的地位越是不稳，他们就越害怕真理。关于报导的真实性并不会由于取消了出版自由而有所加强。相反地，它还因此受到最不利的影响。讲到概念和观念的真实性，我们必须用彼拉多^①的话来问：“究竟实情如何？”世间没有绝对真理这样的东西。只存在着一种认识过程，并且这个过程以及人们求知的可能性处处都受到损害，如果一派利用它的权力来壟断它自己的概念，把它们当作唯一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真理，并竭力压制其他任何的见解的话。不容怀疑，布尔什维克中间的理想主义者十分真诚地相信：他们完全掌握了真理，只是刚愎自用的偏执性格才使别人抱有不同的想法。但我们必须同样认为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的那些人也是真心诚意的。人民群众中间的文化和教育的高涨肯定是在它的制度下受到了刺激。

宗教裁判所的法官当然还不同于苏维埃共和国的领袖。前者

^① 审判耶稣的总督，见《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译者

并不希望在这尘世上来改善群众的物质和精神状况。他们只希望保证他们的灵魂能够享受来世的幸福。苏维埃人则相信他们能够利用宗教裁判所的方法从各方面提高人民群众的地位。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正在大大地降低人民群众的身分。此外，群众中间的高标准的普及教育和高标准的“道德”，乃是实行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这种道德不仅在有关团结一致、同情和自我牺牲的强烈的社会本能和感情中表现出来，而且在这些感情从个人同志们的狭隘的范围扩大到一般人类的过程中表现出来。我们曾经看到巴黎公社的无产者中间有力地显现出这种道德。而在那些主要构成布尔什维克无产阶级的人民群众中间则根本缺少这种道德。

可是这种“道德”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建立起来，所以托洛茨基说：“同志们，我们有责任宣传、支持、发展和建立这种共产主义的道德。那是我党在共一切活动部门中最高尚、最重要的任务。”^①

然而，托洛茨基是否真正相信你能花一夜工夫就把道德建立起来呢？那只能慢慢地加以发展。另一方面，对于生产的鼓励却是刻不容缓的。如果共产党人的道德在开始社会化以前没有形成，那么在剥夺资本以后再来加以发展，就未免太迟了。它该怎样发展呢？应该用宣传的办法。仿佛这个世界的一切东西都是从道德的训诫中产生出来的。无论在什么时候，只要马克思主义者拿他们的希望寄托在道德的训诫上面，他们就只是表明他们已经怎样深深地陷进了死胡同里。可是事实上这种新的道德不但应该加以宣传，而且还应该加以支持。但仍旧要问，该怎样支持呢？“道德”是我们的生活和活动的产物。它从生活和活动取得它的养料和形式。斗争的无产阶级所发展的较高的道德依靠两个因素。无产阶级是社会最穷苦、最薄弱的成员，因而它只有通过最亲密的合作才能主张自己的权利。在无产阶级的队伍中，个人的同情心和自我牺牲精神被认为是最高尚的品质；与此相反，在资产阶级中，

^① 托洛茨基：《工作、纪律和秩序将拯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第 21 页。

个人不擇手段地損害群众的利益以发财致富。可是，如果團結一致的强烈感情仅限于一个力求牺牲社会的其余成員以取得利益的狹小的圈子，如貴族、官僚或一个軍官团，甚至这种感情也会产生直接反社会的效果。把现代无产阶级的團結一致的精神提高到社会道德的水平的途徑，是把这种精神扩大到全人类。團結一致精神的扩大是从这样一种自觉中产生的，即：无产阶级如果不解放全人类，就不能解放自己。多年以前，青年的恩格斯便希望从人們对于这一事实的了解上找到提高无产阶级道德的最大的助力。他在所著《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說：

“无产阶级所接受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愈多，革命中的流血、报复和殘酷性将愈少。在原則上，共产主义是超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間的敌对的；共产主义只承认这种敌对在目前的历史意义，但是否认它在将来还有存在的必要；共产主义正是以消除这种敌对为目的的。所以，只要这种敌对还存在，共产主义就认为，无产阶级对他們的奴役者的憤怒是必然的，是正在开始的工人运动的最重要的杠杆；但是共产主义比这种憤怒更进了一步，因为它并不仅仅是工人的事业，而是全人类的事业。没有一个共产主义者想到要向个别的人复仇，或者认为某个资产者在現存的条件下能够有不同于現在的行动。英国的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正是从不归咎于个别人的原則出发的。因此，英国工人所接受的社会主义思想愈多，他們現在的憤怒就愈快地成为多余的（如果这种憤怒今后仍然表現在以前的那种暴力行动中，那它无论怎样也不会有什么結果），在他們反对资产阶级的发动中粗暴行为和野蛮行为也就愈少。假如能够在斗争展开以前使全体无产阶级共产主义化，那么斗争就会很和平地进行。但是現在这已經不可能了，太晚了！^①然而我认为在英国現在已无法避免的穷人反对富人的完全公开的、直接的战争爆发以前，至少也能使无产阶级对社会問題有

^① 恩格斯在一八四五年預料革命即将爆发，但它是于一八四八年在大陆上而不是在英国来到的，并且革命本身也不是无产阶级性质的。——原編者

个清楚的了解，使共产党能够在有利的情况下逐渐克服革命中的野蛮的成分并预防热月九日^①的重演。”^②

恩格斯希望防止与此相类的崩溃，因此他劝告一切共产党人在着手工作时消灭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对待资产阶级的粗暴行为和野蛮行为，把人类的一般的利益放在首位。显而易见，恩格斯所理解的共产主义的意义和今天的布尔什维克所理解的完全不同。恩格斯所希望实现的事情，正就是那些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俄国社会主义者现今正在争取的事情。布尔什维主义使未来工人运动的残忍和残暴行为成为“革命的动力”，从而压倒了它的社会敌手。布尔什维主义之所以能够达到这个目的，是由于它降低了社会运动的价值，把人类的事业变成单纯工人的事业，并宣布权力仅仅归于工资收入者（以及乡间最穷苦的农民）；而且，它宣告要剥夺所有那些不同他们一鼻孔出气的人的权利，使他们落入最不幸的境地；最后，它还废除各种不同的阶级，而实际上把现在的资产阶级变成一个新的奴隶阶级。因此，由于把那本来应该成为争取自由、争取提高全体人类的地位的社会斗争的运动变成了一种导致最可怕的凌辱和虐待的残暴与复仇的爆发，布尔什维主义已经败坏了无产阶级的道德，而不是把它提高到更高的道德水平。“剥夺剥夺者”同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组织这两件事是密切相关的，只有互相配合才能形成一种社会思想，而布尔什维主义由于把这两者截然分开，已经进一步败坏了道德。剥夺的过程立刻从对于生产资料的剥夺扩展到对于消费资料的剥夺。从这一步很容易走上抢劫的道路，像在斯青卡·拉辛的事迹中一向被人理想化的那样。

“群众已经毫无困难地了解了布尔什维主义叫人不必斗争的消极纲领。布尔什维主义不再承认任何义务。你只要占据、攫取和

① 热月九日是罗伯斯比尔被推翻和巴黎的恐怖统治崩溃的那一天。

②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86—587页。

剝奪你所能够弄到手的東西就行了；或者像列寧十分令人奇怪地說明的，你应当竊取曾經被竊取的東西。”^①

蘇維埃共和國已經有人紀念那位盜魁，這是符合上面所說的那種想法的。這樣，布爾什維主義“支持”並宣傳了非此即不能建設社會主義的新的共產主義道德。它只能意味着俄國的無產階級有更多的人在道德上日益斫喪。這是布爾什維克中間的理想家們感到恐懼的一個特征；但他們只能看到現象而看不出它的原因，因為那樣就意味着要推翻他們的整個政治制度。他們到處拚命地尋找可以使群眾具有共產主義道德的方法。除了舊社會力圖用以推卸自己罪責的那種卑鄙手段——法庭、監獄和處決——即恐怖主義以外，他們這些馬克思主義者、這些冒失的革命家和改革家什麼也找不到。列寧在我們已經引述過幾次的《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這本著作中寫道：

“法庭是教育人民遵守紀律的工具。群眾還沒有充分意識到這樣一個簡單而明顯的事實：俄國的主要苦難既然是飢荒和失業，那麼要戰勝這種苦難，決不是憑一時的情緒和暴力就能收效的，只有從各方面普遍地進行全民的組織工作，加強紀律，才能達到目的；所以在任何有關的事業部門或任何事情上，凡是破壞勞動紀律的人，就是造成飢荒和失業痛苦的罪人；應該善於查出這種罪人，提交法庭，嚴厲懲辦。”^②

因此，俄國的無產階級要用无情的懲罰硬把它所缺少的共產主義道德塞進自己的隊伍，以便使自己成熟起來，可以實行社會主義。但道德卻從來不是靠无情的懲罰可以提高的。相反地，那種道德的殘余都已蕩然無存了。從前，人們無法求得較高的道德和較好的生活條件，不知道除採用嚴厲的懲罰以外還可以採取什麼辦法，那時嚴厲的懲罰就成為舊制度的必然的弊害。一個社會主

① 加弗隆斯基：《俄國布爾什維主義的消極因素》，柏林 1919 年版，第 39 頁。

② 參閱《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244 頁[考茨基對這段引文稍有竄改。——譯者]。

义制度除利用严厉的审判程序以外竟找不到其他任何办法来启发无产阶级，使他們提高道德，这只能证明它自己的破产。

独 裁

看来好像列宁本人也并不希望靠他自己的法庭来获得任何鼓励道德的力量；因为他对这种法庭提出他的要求以后，又立刻要求“给与一切企业的个别领导人以独裁的和无限的权力”。“任何大工业——即社会主义的物质的、生产的泉源和基础——都要求无条件的和最严格的統一意志。可是怎样才能保证意志有最严格的統一呢？这就只有使成千人的意志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在共同工作的人們有很理想的自觉性和紀律性的情况下，这种服从就很像随着音乐指揮者的灵巧的指揮一样。如果没有很理想的自觉性和紀律性，这种服从可以通过严厉的独裁形式来实现。”^①

直到現在为止，我們始終假定，工人阶级的自觉性和紀律性是无产阶级的成长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这种条件，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列宁本人在我們剛才引述的那本书的开头說道：

“这种革命，只有在人民大多数、主要是工人阶级大多数的合作下，才能順利实现。”在他指出了社会主义不能依靠少数人而只能依靠人民大多数、不能专门依靠而只能“主要”依靠工人阶级大多数才能完成之后，在他承认这一点而違反自己的意志为民主制度作了辯护之后，他接着說：“只有在无产阶级和貧苦农民能够表現充分的自觉性、思想性、坚定性和忘我精神的情形下，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才有保障。”然而，看来它的胜利是必須通过法庭和工厂首脑的独裁来保障的。

“革命剛剛粉碎了那种最陈旧、最牢固、最沉重的镣铐，使群众

^① 参閱《苏維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46—247頁[考茨基对这段引文略有删节。——譯者]。

不再受束縛和鞭笞。这是昨天的事。但是在今天，同样是这个革命，正是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却要求群众无条件地服从劳动过程中的领导者的統一意志。”^①

既然群众分明还没有表现出充分的“自觉性、思想性、坚定性和忘我精神”，他们昨天为自己赢得的自由就要在今天被剥夺掉。那本书在开头曾经指出，由于缺少这些品质，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在后面，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却又要求未成熟的群众“绝对服从”独裁的领导者。群众的地位将因此低于他们在旧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占据的水平。因为在那个制度下，他们从属于资本，然而并不绝对服从。列宁说，这种独裁与旧的资本主义管理制度不同，它将由于工人群众和以前被剥削者的合作而成为可能，并将通过那些在结构上足以唤起群众以及依靠群众的积极努力来最后达到具有历史意义的目的的组织而成为可能；他说这番话，当然不过是想安慰他自己和公众罢了。据说苏维埃组织就是属于这一类的组织。前面已经指出，排斥和压制任何种类的批评会怎样促进群众的觉悟和鼓励他们从事创造性的活动。苏维埃组织在这方面并没有作出什么改变。这种责成“群众绝对服从”的个人独裁的铁的形式，怎么能够通过那种把群众组织起来以从事个人活动的办法求得实现呢？无论是谁，如果他必须由群众选出或罢免，或者必须由群众再度加以推选，就始终会依赖群众，因为他无法贯彻任何不受他们欢迎的事情。如果在那推选他出来的组织中有个别成员同多数人的意见相反，他当然可以想法打破他们的固执；但是，如果他违反多数人的意愿，想要强迫他们接受他自己的观念和命令，他就会立刻感到智穷力竭。因此个人独裁和民主制是水火不相容的。就苏维埃民主制来说，情况也是如此。列宁确实认为这些话应该受到批评，但是在他的论证中，激昂的情绪代替了力量，因为他只能回答说：

^① 参阅《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47页[考茨基对这段引文略有删节。——译者]。

“如果我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那我们就应该承认必须有国家，也就是承认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时必须采用强迫手段。”

对于这一点，我们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甚至民主制度本身也并不排斥某种程度的强迫；但它所承认的唯一的一种强迫是少数必须服从多数。大多数工人对少数资本家的强迫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强迫；但是在列宁本人提到的革命第二阶段，即无产阶级已经粉碎了它的枷锁以后，情况就不是如此。这里是个别少数人对工人群众所实行的强迫的问题。列宁不想指出这种形式的强迫是与民主制度绝不相容的。他反而竭力想用一种魔术来使它们不发生矛盾，企图指出：既然广大群众必须对个别资本家实行强迫，以便实现社会主义，既然这种社会主义完全同民主制度相一致，那么，为了推行社会主义而可能采用的各种强迫形式就都是同民主制度相一致的，即使那些形式代表着一些个人的支配群众的绝对权力。他说道：

“所以苏维埃的（即社会主义的）民主制与实行个人独裁之间，绝无任何原则上的矛盾。”

那也许是这样；不过它只是表明，苏维埃民主制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结构，人们可以利用这个结构来主张任何形式的专断统治，只要他们把它称为社会主义就行了。如果要使一个企业里的工人无条件地服从他们的领导，那个领导就不应当由工人们选举产生，而只应当由某一个地位比他们高的权力加以委任。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中的代表苏维埃就不应当有所主张。而且，任命这些独裁者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本身就得具有独裁的权力；因此那些苏维埃就会变成徒有其名的组织，而由它们所代表的群众也将丧失一切实际的权力。一个缺少“自觉性、思想性、坚定性和忘我精神”的工人阶级本身是没有能力选择它自己的独裁者的，但它却必须靠他被提升到较高的水平，并且，如果他要求它作出那种需要“自觉性、思想性、坚定性和忘我精神”的行为，它必须屈从他的意志。这是工人

階級斷然做不到的，正如閔肖森^①不能用他自己的頭髮把自己從泥沼中救拔出來一樣。哪里能夠找到這些具有必要的精神力量以及高人一等的智力的獨裁者呢？每一種專斷的統治形式都帶有掌權者本身貪污腐化的種子，不管那是一個單獨的个人還是一個小的派系。只有異乎尋常的性格才能始終避免有害的影響。我們是否要假定俄國的獨裁者們是百分之百的這樣的人物呢？列寧斷定他們是要經過審慎的選擇的。

“我們走自己的道路，力求盡量仔細地耐心地去考驗和識別真正的組織家，即那些具有清醒頭腦和實際本領的人才，他們既忠實於社會主義事業，又能埋頭苦幹（不管別人的忙亂和喧嚷）使蘇維埃組織下的很多人都能堅強地團結起來，和衷共濟地工作。只有這種人才，經過多次考驗之後，才應該提拔起來，從擔任最簡單的任务到擔任最困難的任务，使他們能擔負領導人民進行勞動的職務，領導管理工作的職務。我們還沒有學會這一點。但是我們一定能學會的。”^②

他沒有說明這個“我們”究竟指誰。顯然不是無知的、沒有修養的、忙亂的群眾；比較可能的是較高的當局，即中央執行委員會。但即使是這個機構也還沒有學會正確選擇工人群眾的領導人的本領。它答應要學會這種不容易掌握的本領。沒有說出確定的期限。只有這一點是肯定的，即在目前，這些領導人的選擇工作是以一種十分難以令人滿意的方式進行的。居于領導地位的人們缺乏必要的資格，正如群眾缺乏必要的成熟程度一樣。

他們一直從事剝奪資本的工作，現今正在着手進行組織工作，在此以後，他們才覺得他們還必須首先開始學習——甚至學習怎樣正確地選擇國家經濟的高級行政管理人員。

① 德國作家魯道夫·拉斯普所撰荒誕不經的故事中的人物。——譯者

② 《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40—241頁。

貪污腐化

什么样的成分正在暗中钻进那新的制度啊！“任何一个广泛的翻天覆地的人民运动都不免要带些髒东西，都不免会有些野心家和騙子、吹牛和夸口的人混杂在还不老练的革新家中間，不免有些荒唐混乱的現象，干些糊塗事，空忙一陣，不免有个別領袖企图百廢俱兴而一事无成的現象。”^①

毫无疑問，每一个大的人民运动都不免要受到这种有害的影响。我們在德国也不能不感到这一点；但俄国苏維埃制度除此以外还表现了某些特有的性质。首先，我們的革新家决不像俄国的那样“还不老练”。那是不可避免的。在以前专制制度的統治下，所有努力向上的人都沒有机会扩大眼界，更不必說参加国家和社会的行政管理工作，参加各种形式的高級組織和行政活动了。

革命者、特别是其中最急躁和最激烈的分子，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对于警察和秘密阴謀的斗争上面。当他們突然掌握政权的时候，我們沒有权利責备他們还不老练。但是这种缺乏經驗的情况代表一个特征，证明俄国在革命爆发的时候时机尚未成熟，不宜立刻实行社会主义。負有指引道路責任的革新家越是缺少經驗，就越是不能由无知的、沒有修养的群众来实行社会主义。这进一步证明了，群众及其領導人的民主教育和訓練，乃是实行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不可能从专制制度一步跳进社会主义的社会。而且，苏維埃制度和早期的大規模群众运动的区别还在于：苏維埃制度已經廢除了揭露野心家、騙子、吹牛和夸口的人的最好手段，即出版自由。这些討厭的分子因而可以不受具有专门知識的人的一切批評。他們只須应付无知的工人和士兵，以及还不老练的革新家，于是他們就一帆風順了。布尔什維克的領袖們当然已經开始在学

^① 《苏維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40頁。

习怎样区别小麦和麸皮，怎样辨别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和骗子与坏蛋。但是在他们“学会”这一点以前，由于俄国工人阶级的落后状态，生产早已发生问题，甚至有完全趋于停顿的危险。他们把阻止这种奇灾大祸的唯一希望寄托在领导人员的独裁上面，但他们必须在无法作适当选择的情况下给予这些领导人以独裁的权力。因此这种从一开始就容易受到很多批评的独裁只会起有害的作用。正如他们首先滥行剥夺资本，然后才开始进行组织工作一样；他们现在指派独裁者，以后才想法学会正确选择那些独裁者的方法。只要他们不联系实际情况而贸然开始推行社会主义，这种矛盾总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苏维埃制度之所以面临危险，还不仅是由于它无法正确地加以审查和判断的“野心家和骗子”的入侵。它还面临着另一个同样严重的危险，因为它疏远那些具有最高尚的品德并在学问上居于最杰出的人们之列的人员。如果没有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的合作，社会主义在目前的生产阶段是不可能实现的。只要社会主义还处在宣传阶段，只要社会主义还不过是使无产阶级意识到它在社会中的地位以及它对于由此而产生的前途的任务和义务的问题，社会主义就需要有受过教育的分子——无论这些人是出身于中产阶级的受过多方面的教育的人们，还是无产阶级出身的刻苦自学的人们。但它只是需要他们来实行和推广它的理论。这里不是量的问题而单纯是质的问题。

可是现在，当我们处在必须以切实可行的方式推行社会主义的时期，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和资本主义国家如果没有大批可靠的有本事的人的帮助，就不能存在，同样地，由工人阶级所控制的社会生产和国家制度也同样迫切地需要这种帮助。如果没有这种帮助或反对这种帮助，任何社会主义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对于实际参加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发展和宣传社会主义理论来说，是否抱有誓为解放全人类的伟大事业而奋斗的热诚是无关系要的。顶顶必要的是，他们至少有一大部分人相信社会主义的生产是可能的并且是有好处的，因此如果有人希望合作，就

不必牺牲这份知識力量。假如說在体力劳动方面采取任何种类的、强迫劳动不可能改进生产，則在腦力工作方面情况就更其如此。

消除知識界对于实际推行社会主义的疑虑，知識分子願意在必要的权力产生时共同合作来建設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些都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可以获得进步（即使不是宜于实行社会主义的成熟时机）的条件。社会主义的其他必要条件越是具备，上述这些条件的重要意义就越是明显；所以，有了可以实行社会主义这一認識之后，沒有偏見的知識階級就会相信社会主义是十分合理的。

布尔什維克起初並沒有認識到知識階級的重要性。既然在开头的时候他們所起的作用只是增加士兵、农民和城市工人的盲目热情，广大的知識分子从一开始就对布尔什維克抱有敌意，甚至在社会主义者中間也是如此；因为他們認識到俄国的时机还没有成熟，不宜实行布尔什維克所提出的立即社会化的方針。他們並沒有多費心思去考虑“知識分子”会受到什么待遇。比如說，一个属于这个階級的人会从工人想要单独掌管的工厂里排除出去。他被剝夺了一切政治权利，因为工人苏維埃的权威方面只把选举权給予体力劳动者。只要他有财产，他便遭到剝夺，并丧失了他的过优雅生活的一切手段。他甚至后来被判定要从事强迫劳动，死于饥饿。

布尔什維克起初认为沒有“知識分子”、沒有专家也能照样生活下去。沙皇制度就认为一位將軍即使沒有取得任何特殊的資格或受过任何特殊的教育，也能充任国家的每一种职位。除了其他許多观念以外，苏維埃共和国也从沙皇制度承接了这个观念；不过他們把无产階級代替了將軍罢了。布尔什維克中間的理論家把这个办法称为“社会主义从科学发展到行动”。如果我們說它是“社会主义从科学发展到半瓶醋的知識”，可能更恰当些。

苏維埃共和国听任自己受单纯本能的指导，而不去认真地深入研究实际的情况，这是屡見不鮮的事。因此就发生这样的事情：在孩子掉进井里去之后，他們所发现的必要措施是把井掩盖起来，

于是他們就想这样做了。他們曾力图使知識分子不再像以前一个时期那样从事强迫劳动，而确实去做一些他們所了解的并适合于他們的工作。因此为政府服务的知識階級便不再算作資產階級，也不再被当作資產階級来看待和虐待。他們由于从事“生产性的”和“有益的”工作而在“积极和工作的”人們的圈子里出头露面。他們可以不受剝夺，并且領取适当的薪金。既然迫使这些知識分子参加政府工作的是对于虐待的恐惧，而不是心悅誠服的觉悟，他們的工作事实上既不是很有生产性的又不是很有用的，也就没有什么奇怪了。比如說，托洛茨基在前面引述过的《工作、紀律和秩序将拯救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一书中便对这一点表示不滿；他說：

“反对（知識分子的）搗蛋的斗争的第一个时期是无情地摧毁搗蛋者的組織。那是必要的，因而也是正确的。現在，在苏維埃政权已經有所保证的时期，这个反对搗蛋者的斗争就必须采取把昨天的搗蛋者变成公務員、行政管理人員和技术人員的形式，如果新政权有此需要的話。”

所以，托洛茨基的意思是說，把这些知識分子变成公務員和社会化的領導人員的“必要的因而是正确的”方法，是首先无情地把他們踏在脚底下。他自己告訴我們这样做的結果是：

“我們已經摧毁了以前的各种各样搗蛋的行为，并且用一把铁帚扫除了旧的官吏。代替这些旧官吏的人們在任何行政管理部門看来都决不是头等的人才。一方面，已經出缺的职位由各党各派的同志們充任，他們做过大大小小的艰苦工作，在革命中間受过鍛炼。他們成为最优秀的人員、战士、可敬的人們、不求私利的人們。另一方面，还出現了一批找財路的人們，他們在旧政权底下一向是社会上的失意者，可以說是无业游民。因此，当我们有必要一下子吸收成千成万剛經過审查的工作人员时，难免就有許多不相干的人能够钻进新政权里来。我們也必须承认，現今在各个不同崗位和机关工作的許多社会主义同志們，並沒有表明自己經常能够組織創造性的、精力旺盛的劳动。我們可以看一看行政机关的这种

同志們、特別是十月布尔什維克的队伍中的这种同志們的态度，他們每天做四、五个钟头工作，并且工作也不很紧张；而我們的整个形势却要求人們以高度的責任感而不是出于畏惧心理来从事最奋发的劳动。”

如果爭取知識階級的政策不是通过提高人們的觉悟，而只是通过既从前面又从后面拳打脚踢的办法，上述情况就是这种政策的必然的、虽然决不是适当的后果。

所策划的另一种手段是增加积极的工作人員的物质供应。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减低了国家公務人員的报酬，規定最高薪給为六千法郎。苏維埃共和国也想这样办；可是这个办法行不通，因此他們不得不重新采用旧的方法。列宁就这个問題发表意見說：

“現在我們不得不采用旧的資產階級的方式，同意付給資產階級最大的专家以很高的‘酬劳’金。显然，这个办法是一种妥协，是离开巴黎公社和任何无產階級政权的原則的。这种办法显然不只是在相当部門內，在相当程度內停止一下向資本的进攻，而且还是我們社会主义苏維埃国家政权向后退了一步。”^①

列宁表示說沒有其他的办法，他的这种話是完全正确的。提高薪給的必要性可能是由两种原因产生的。企业的規模愈大，工人的人数愈多。所以在同样的情况下，企业所交付的总价值的数量就具有大得多的意义。如果工人每天生产的价值等于五先令，雇有一百工人的企业将每天生产五百先令的价值，而雇有一千工人的企业就将每天生产五千先令的价值。企业的規模愈大，組織和領導的工作就愈加困难，在其組織方面也就愈不容易产生必要的效率。但是厂主可以用来雇用具有这种特別才干的人員的資財也就愈加充足。所以，这些大工业部門越是增多，它們的領導人的薪給就愈高，最后达到了极大的数額。对于这种情况，国家的行政部門不能不加以慎重考虑。如果它不相应地提高它的高級公務人

^① 《苏維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27頁[考茨基对这段引文略有删节。——譯者]。

員的薪金，它就一定要準備看到私營企業把他們吸引過去——只要他們確實幹練，不是什麼尸餐素位的人。這樣，國家行政部門就會變得虛弱無力，而這也就是國家的經濟無法同私營企業競爭的原因之一。

當公社已經成立，當工業在公社領導下已經按照資本主義的路綫向前發展而不是變成有可能實現的國有化的時候，他們是否還能維持這種把工資固定在六千法郎的制度，那是值得懷疑的。四月二日公布的法令表現了那時巴黎工業的小資產階級的性質。而且它也證明了公社成員的廉潔無私。我們前面已經提到財政部長茹爾德的著名的例子。可是，由蘇俄的繁榮而強大的私營工業所產生的競爭，不可能促使技術最熟練的“專家”的工資得到提高；因為這種工業不是受到剝奪和摧殘，便是使私方廠主喪失其一切價值。高工資只能有一個目的。人們指望用它來克服知識分子中間最能幹的一部分人內心隱藏着的不肯為蘇維埃共和國服務的心理，同時引起他們對新政權發生興趣。

既然提高人民的覺悟的辦法不發生效力，既然飢餓的鞭撻得不到任何可驚的效果，剩下來唯一的可行的辦法就是收買人民，即供給他們至少相當於他們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所享受的那種物質待遇。我們現在看到，將要成為蘇維埃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生產的領導人的是些什麼成分。一方面是少數老的密謀起義者、心地純潔的可敬的戰士，但在業務上只是並不老練的革新家；另一方面是為數眾多的知識分子，他們違反自己的信仰，或者作為力求適應新政權的單純的謀職者，正如他們遇有機會也會適應其他任何政權一樣；或者為恐懼、飢餓和懲罰所逼，勉強為政府服務；或者甘心受高工資收買。像托洛茨基所承認的，他們決不是頭等人物。而且，即使他們有點學識，也並不屬於知識分子中最出色、最優秀的一類。在他們中間，既有堅強性格又有業務知識的人簡直是鳳毛麟角，不可多得。現在為了拯救社會主義，獨裁的權力已經被交托在這些人的手裡。這是工人們必須順從地承認的權力，這種權力甚至會

使最好的人受到腐蝕。在這方面，權力還往往交給那些從一開始就貪污腐化的人們。

在普遍困苦和普遍剝奪聲中，他們把新的資本主義的萌芽聚集在自己的手里。當然，商品生產在進行着，並且也非進行不可；因為被當作民營事業的農業活動事實上代表着商品生產，影响着全部的生活。由於這個緣故，農村可供出賣的剩餘農產品越來越少。蘇維埃共和國把一個村莊的全部權力交給貧農，這些人只有很少一點土地，生產不出剩餘的糧食。於是就必須無償地征發富裕農民的一切剩餘商品，交由國家糧倉支配。這個辦法實行起來只能成功一次，因為到了第二年，富裕農民就會打好算盤，將產量限制在他們所需要的範圍之內。這樣，農業的報酬就會受到限制。而且，不論農民生產多少剩餘產品，他們都把它隱藏起來，只偷偷地把它賣給投機商人。

與此同時，工業也趨於停頓。因此政府的開支就只能靠發行新紙幣來彌補。於是，正像在法國革命時期一樣，也正像在目前的德國一樣（雖然沒有那麼嚴重），投機商人、奸商和走私者的活動十分猖獗。從前他們是被送上斷頭台的。今天的方式是把他們槍斃。但終於逃不出失敗的命運。唯一的結果是：在目前，正如在一七九三年一樣，騙子手們由此而獲得的資本的不可靠性以及新的獨裁者所需索的賄賂的數量都有所增長，因為，如果有一個冒失鬼偶然落進那些獨裁者的羅網，他們就可以拿到賄賂。即使是這種錢財，又成為聚斂新的財產的新的基礎。

如果有人想進一步了解俄國新官僚政治的這種賄賂風氣，他應當讀一讀加弗隆斯基的《俄國布爾什維主義的消極因素》。在這本書的第五十八頁及以後幾頁里，充滿着有關賄賂和貪污的記載。

該怎樣壓抑工人群眾要對之俯首帖耳地屈從的這些新的“獨裁者”呢？像在“啟發”群眾的道德的努力中一樣，蘇俄政府不知道除用法庭來恫吓以外，還有其他“啟發”它的領導人的道德的辦法。如果說，無產階級的組織者們的獨裁應當凌駕在無產階級的獨裁

之上，那么法庭的独裁又将凌駕在无产阶级的組織者們的独裁之上。

苏俄已經組成了一系列革命法庭和非常委員會，“以反对反革命和投机活动以及濫用职权的行为”。它們具有专断的权力，可以宣告任何被控到它們那里来的人的罪名，随意决定枪毙那些不受它們欢迎的人們；也就是說，可以枪毙它們所捉到的一切投机商和奸商，以及他們在苏維埃公務人員中的同謀犯。它們的手段并不到此为止，而是連累到每一个胆敢批評它們的可怕虐政的正直人士。在“反革命”这个集合名詞下，把各种各样的反对者都包括了进去，不問这是发生在哪一类人中間，产生的动机是什么，用的是什麼手段，抱的是什麼目的。可是非常不幸，这种即决裁判手續沒有效果。

这些非常委員會是革命清洗工作的最后希望，当布尔什維克中間的真誠战士知道这些委員會本身也是貪污腐化的时候，他們往往万分憤慨。加弗隆斯基在他那本书的第六十一頁上引述了非常委員會周报的下列呼声：

“四面八方傳來消息，不但是庸碌之輩，而且还有真正的罪犯，正在想方設法鑽進委員會里来，特別是鑽進各个地区的委員會里来。”加弗隆斯基还在第六十二頁上提到一些人，这些人已經表明，那种鑽进去的企图不仅見諸行动，而且多半获得成功。所以革命共产主义的机关报《劳动意志》在一九一八年十月十日的一篇文章里說：

“我們至今記憶猶新的是，各个地方苏維埃已經千真万确地处在特殊和非常苏維埃的恐怖統治之下。当然，选拔工作是做过的。在各个苏維埃里，还留有一批比較正派的人員，但在各个非常委員會里，却是一伙伙准备干各种搶劫勾当的匪徒。因此，按照布尔什維克的方針用社会主义来革新人类的綱領已經蕩然无存，只有两三个心地純潔的人士在日益严重的无知、貪污和自暴自棄的泥淖中掙扎着，这种泥淖越来越扩大，最后非使他們陷进深处并慘遭沒頂不可。”

布尔什維主义的改变

西方的許多革命家揚揚得意地指出，布尔什維主义还大权在握，并且，甚至在我撰写这几行文章的时候（一九一九年五月），它显然从表面上看来还是完整的；但是，布尔什維主义的一些批評家在它統治之初便預言它不久必将崩潰。如果布尔什維克严格按照他們的綱領办事，这种崩潰早就实际发生了，他們由于接二連三地拋棄了他們的綱領的某些部分，才能勉强維持下来，因此他們最后实现的事情与原定的目标完全相反。例如，为了攫取政权，他們一古脑儿拋棄了自己的民主原則。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他們不得不让自己的社会主义原則走民主原則的道路。他們已經作为一些个人而站稳脚跟；但他們已經牺牲了自己的原則，表明自己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者。

到目前为止，布尔什維主义已經在俄国获得胜利，而社会主义則已經遭到了一次失敗。我們只須看一看在布尔什維克統治下发展起来的、一經应用了布尔什維克的方法就必然如此发展起来的社会形式。

讓我們現在扼要地叙述一下发展的情形。我們在今天的布尔什維克的俄国看到一种建立在无限私有制和最充分的生产可能性的基础之上的农民。这些农民过他們自己的生活，同城市的各項工业沒有任何有机的联系。既然这些工业不能为鄙野的乡村生产剩余的商品，自願地和完全合法地把农产品运进城市的現象就越来越受到妨碍。为了补偿起見，已經采用了征发、即无偿地掠夺的办法；另一方面又借助于非法的走私，这种行动終於把过去一个时期城市所积累的工业产品一扫而空。

在破坏了大的庄园以后，布尔什維主义对于农民不再有什么帮助了。事实上，农民对于布尔什維克的好感不久便变成了对于城市工人的憎恨，因为那些工人并不工作，不能提供农业所需的商

品；他們也憎恨執政的有力人物，因為這些人派遣軍隊到農村去征發物資；他們也瞧不起城市的投機商和走私者，因為這些人竭力用種種騙人的交易方法把各種各類剩餘的商品奇貨可居地兜售給農民。

除掉在全國各處可以看到的這種純粹資產階級的情形而外，在各個城市里已經產生了一種堅持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社會的形式；不過它力圖廢除階級的差別。它從侮辱和摧殘上層階級入手，因此它事實上有最後變成一種新的階級社會的危險。它實際是由三個階級構成的。最下層的一級包括資產階級、資本家、中小階級以及所謂知識分子，如果後者表示任何反對的話。他們被剝奪了一切政治權利，喪失了一切謀生的手段，常常不得不去干那種最討厭的強迫勞動，而他們所得的酬報則是完全可以稱為最惡劣的飢餓口糧、或者說得確切些是挨餓口糧的那種食物配給。這種類似地獄的奴役狀態只能同資本主義所表現出來的最可怕的極端行動相比擬。而這種局勢的產生乃是布爾什維克的最有代表性的別出心裁的行動。它代表着他們走向解放人類這一目標的第一步。

在這最低階級之上的是以領取工資的工人為代表的中間階級。這個階級享有政治權利。根據憲法的明文規定，只有它才享有在城市投票選舉的權利；並且它也享有出版方面的充分自由，以及將其成員組成聯合團體的權利。這個階級的成員可以選擇他們自己的職業，憑自己所選擇的工作取得十分優厚的報酬。或者說得更確切些，過去是這樣的情況；因為過不多久，事情越來越明顯：由於俄國廣大工人羣眾的水平很低，這些措施有日益使工業完全喪失其作用的危險。因此，為了拯救工業，不得不形成一個新的官吏階級，並使它掌握支配工人的權力。這個新的階級逐漸把一切實際的和事實上的控制權抓在自己手裡，把工人們的自由變成純粹虛假的自由。自然，所有這些事情的发生不能不引起工人本身的反對；而且這種反對變得格外強烈，因為由於工業和運輸方面的普遍衰落以及鄉村對城市的日益疏遠，糧食問題越來越無法解決，

即使工人的工資有所增加，他們也同樣受到影響。所以工人一批接一批地對於布爾什維克喪失了熱情。可是工人們的反對始終是沒有組織的和分散的，不能形成密集的队伍來反對具有更高度的組織的官僚政治。工人們無法同他們抗衡。

從工人代表蘇維埃的獨裁權力中產生了一個新的統治階級的獨裁權力，這個新的統治階級的組成部分是：以前工人代表蘇維埃的代表、由他們任命的人員以及一種硬性規定的新式官僚系統的成員。這個新的統治階級是在共產主義老的理想家和戰士的領導下組成的。

舊的官僚政治的專制獨裁已經以一種新的但據我們看來決不是有所改進的形式復活了；除這種專制獨裁以外，還正在產生一種新的資本主義的萌芽，而這種新的資本主義是應該對真正的犯罪行為負責的，並且事實上比舊時代的工業資本主義的水平要低得多。現在不再存在的只是舊式的封建莊園制。廢除俄國封建莊園制的條件早已成熟了，但廢除資本主義的條件卻沒有成熟。資本主義制度正在復活，但它所採取的形式對無產階級說來是比舊的形式更加暴虐和更加有害的。現在私人資本主義已經帶有走私、謀取暴利、銀錢投機等最惡劣、最腐朽的形式，以代替較高的生產形式。工業資本主義現在已經從私人的體系變為國家資本主義。從前，政府的官僚和私人資本的官僚即使不是直接對立，也往往是互相挑剔的。結果，工人有時可以利用一方，有時可以利用另一方。可是現在政府和資本家的官僚體系已經合併成一個體系。這就是布爾什維克所推行的社會主義大變革的最後結果。它代表着俄國歷史上有過的一切專制形式中最暴虐的形式。為“剝奪剝奪者”這一運動服務的工人代表蘇維埃曾以專制統治代替了民主政治，現在這種統治已經讓位於一種新的官僚政治的專制統治。於是後者的這種統治終於能夠使工人的民主完全成為一紙具文，因為工人階級已經被迫比過去任何時候更在經濟上處於從屬的地位。

而且，这种自由的丧失并不因繁荣的增加而得到补偿。当然，新的經濟独裁所起的作用，比在此以前的势必导致急剧崩潰的經濟无政府状态来得好些。这个結局只是被独裁的統治推迟了，因为从經濟上看，这种新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发生作用的。

这个新組織的作用之如何不能令人滿意，主要可以从交通人民委員克拉辛先生最近在《真理报》上发表的下列呼声中得到证实。他的声明如下：

(1)現有的铁道管理制度連同五年战争所造成的其他客观困难已使交通運輸事业彻底破产，無論何种运输都有完全陷于停頓的危險。

(2)它的崩潰不仅是由于錯誤的組織形式和管理方法，也不是由于工作人員能力的減低，而且还由于組織和管理方式的經常改变。

(3)我們当前的任务是恢复运输系統，至少使最低限額的口粮配給和工业的需要与要求得到滿足。这项任务只有依靠十分果斷地結合和調动铁道系統所能聚集的一切力量这一办法才能担当起来。

(4)这个工作刻不容緩，必須立即进行，否則我們將眼看革命的成果毀于一旦。

(5)集体管理事实上是完全不負責任的，必須建立个人負責管理的原則和提高責任感，以代替集体管理的形式。每一个人，从勤杂人員到管理部的成員为止，必須正确无誤地、毫无偏差地执行对他的全部指示。一切的改革必須停止进行，在可能的情况下应維持旧的人員，不予变动；在中心及其一切分支部門的原有技术設備必須加以恢复和維持原状。

(6)有必要实行計件工資制。

在苏俄的一切政府官吏中，克拉辛表現了用一种由經驗得来的英明的科学方法进行組織工作的杰出才干。铁路工人看来是俄国工人階級的精华。早在沙皇統治时代，它就已經发展成为一个

經常表現出巨大智慧的良好組織。可是尽管有这一切，目前的情况却是如此！

这个声明清楚地表明了，那种贫困的状况并不像一般人所主張的那样應該單純由战争的后果負責。战争的后果不过是加剧了緊張的程度罢了。看来要葬送革命的一切成就的，是現存关系的不成熟状态。为了拯救革命，似乎絕對有必要拋棄改革，恢复旧的局面，把旧的机构放在原来的地位——換句話說，要取消铁道系統的革命，以便拯救革命的人們。十分自然，这个法令也像过去其他任何法令一样，将很少能够改变执行法令的人員。

像旧的資本主义一样，这个新的“共产主义”已經自行产生了它自己的“掘墓人”。但是旧的資本主义并不單純产生这些掘墓人；它还給与这些人以力量和生产能力，使他們把新的生命注入垂死的軀体。

在俄国目前的情况下，共产主义只会危害現有的生产力。它的“掘墓人”将无法創造某种較高的生活方式，而不得不重新开始过那正在出現的野蛮的生活方式。这种制度用訓練有素的盲目服从的軍隊这类强有力的暴力手段来加以維持，也只是苟延殘喘而已。布尔什維克所建立的，正是这种制度，并且甚至在作这个决定时，他們的希望自身得救的原則也不得不遭到失敗。他們一开始就决心要摧毀現成的国家机器，以及它的一切軍事和官僚机构。然而他們在解决了这个問題之后，发现他們自己不得不为了自保而重新建立同样的机构。他們作为通过士兵代表苏維埃以瓦解軍隊的先驅而获得政权。同工人代表苏維埃一起，那些可以随意任命軍官以及仅仅服从自己所願服从的人們的士兵代表苏維埃构成了布尔什維克的全部政策。他們打算用这个方法掌握一切权力。可是在采取了这一步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布尔什維克遇到公开的反对时，他們立刻需要一支軍隊来进行斗争：一支願意服从任何命令的軍隊，而不是一支正在瓦解的或者各个营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决定作战行动的軍隊。起初，热情似乎順利地代

替了單純的盲目服从；但是，当工人的热情开始衰退，当志願参加的人越来越少，当个别的几师軍隊开始不受节制时，该怎么办呢？在工业方面，經營管理的民主制要求物质和精神条件的一定程度的成熟发展。从本质上說，民主制度应当出現在一支需要加以充分发展使之具有高度战斗力的軍隊之中。战争历来总是民主制的坟墓；即使是內战，如果它繼續进行了一个时期，也总是如此。布尔什維克必然要对內战負責，并且也必然要对士兵代表苏維埃的廢除負責。由于制造种种困难来阻撓新的选举，由于排除了一切可能出現的反对力量，布尔什維克的独裁已把这些工人代表苏維埃变成名存实亡的組織。可是它已經剝夺了这些士兵代表苏維埃的一切最重要的职能，甚至剝夺了他們的选举自己的軍官的权利。像旧时代一样，軍官現在是由政府任命；同时因为志願参军的人数不足，他們已經采用了义务兵役制，像布尔什維主义存在以前的时代那样。这就形成了人民与政府之間发生矛盾的另一根源。許多次的农民起义都是由这种情况造成的，它也使得軍隊的扩充成为当务之急。成群結队地开小差的事情相当流行，对他們惩罚的办法是大批判处死刑。

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九日的《人道报》上发表了一篇以一个在俄国亲眼目覩的人的观察为依据的十分同情布尔什維主义的报道。这篇題目叫做《共产主义的原則及其应用》的文章在末尾有这样一段話：“紅軍是协約国造成的。布尔什維克的政权已經一再宣布它的反黷武主义的态度。爱好和平的人們今天厌恶战争，正如他們在昨天和过去的任何时期都厌恶战争一样。他們正在竭力反对征兵——紅軍中开小差的事件像从前沙皇軍隊中一样多。往往发生这样的情况：一个团沒有完成規定的任务，因为一切有关的人員都已逃走了。”

紅軍的这种态度十分稀奇古怪地表达了它对布尔什維主义的热誠。即使我們只是限于說明事实，沒有給与这些事实以辯解的基础，我們也仍然可以看出，在軍事方面，旧的沙皇制度的种种情

形已經恢复,不过所表現的形式比以前格外恶劣罢了;因为这种新式的黷武主义无疑地正在比旧的發揮出大得多的活动能力,虽然它宣布了反黷武主义的紀律。

因此,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为共和国变成拿破侖帝国鋪平道路的情形正在重演。但可以肯定的是,列宁最后决不会成为俄国的拿破侖。拿破侖第一由于領導了法国的胜利旗帜席卷欧洲整个大陆,获得了法国人民的拥戴。表明革命的原則是征服欧洲,这使有些人感到滿意。因为当时法国軍队正在掠奪整个欧洲,他們的战利品正在使法国富裕起来,也許还有許多人格外感到滿意。但俄国現在是采取守势。可以遏制入侵軍队的同样的运输困难,使得俄国不能让它自己的軍队順利地通过边境。列宁也未尝不想把他的革命的旗帜胜利地插遍欧洲,可是沒有这样的希望。布尔什維克的革命的黷武主义不会使俄国富裕起来。它只会变成貧困的新的根源。目前,俄国的工业就其已經开工的部分來說,是为了軍队而不是为了任何生产的目的工作的。事实上,俄国的共产主义在这方面已經变成一种“兵营社会主义”。

布尔什維克的方法在經濟上以及随之而来的精神上的失敗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这种失敗最后归結为軍事的崩潰,那只会把真相掩盖起来。任何世界革命和任何外援都不能挽救布尔什維克的方法的經濟上的失敗。和共产主义相反,欧洲社会主义的任务是完全不同的,即:它力求使社会主义某一方方法所产生的精神上的灾难不致引起整个社会主义的灾难;而且,它力图在这些方法和馬克思主义方法之間划清界綫,使群众了解这种区别。如果一家激进社会党的报刊向群众宣布布尔什維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同一回事,使他們相信現在的这种苏維埃共和国由于它公然在工人階級和社会主义的万能旗帜下大模大样地活动因而便是确实在实现社会主义,如果这家报刊真正认为自己是在通过这种行动为社会革命的利益服务,那么它一定是沒有懂得什么叫社会革命的利益。

恐 怖

我們剛才所描述的那種發展，當然並不是按照布爾什維克的意願而發生的。恰恰相反，它實際上同他們的願望背道而馳，並且他們也想盡一切辦法要阻止它的發展。但結果他們還是不得不採用布爾什維克的政權從一開始就竭力避免的那種辦法，即求助於不是極輕微的批評所能影響的少數獨裁者的專橫勢力。恐怖統治這樣就成為共產主義方法的必然的結果。這是它想避免它自己的方法所產生的後果的孤注一擲的努力。

在布爾什維主義已經負有責任的一些現象中，從廢除一切形式的出版自由開始到實行大批處死的辦法為止的恐怖主義，當然是最觸目驚心的和令人厭惡的一種。它是引起人們對布爾什維克深惡痛絕的原因。然而這實際上不過是他們的悲慘的命運而不是錯誤——如果在目前我們所經歷的如此巨大的歷史變動中可以允許我們談到錯誤或過失的話。無論如何，任何錯誤或過失歸根到柢只能是屬於個人的。不管是誰，如果他要討論罪責的問題，就必須着手考察個人的向某些道德律的挑戰行為；因為“意志”一詞按照最嚴格的意義來理解，只能是個別人的意志。一個群眾、一個階級、一個民族事實上並不會表示任何意願。它缺少表達意願的必要的能力。因此它是不會犯罪的。一群人或一個組織能夠採取共同的行動。然而，每一個實際有關的人的動機却可能是截然不同的。可是，在確定罪責的問題上，成為決定因素的是動機。

布爾什維克的動機當然是最好的。從他們開始掌握無上的權力起，他們就看起來充滿着人類的理想，而那些理想是起源于作為一個階級的無產階級的種種條件的。他們的第一道法令是有關廢除死刑的法令；但是，如果我們考慮一下他們的罪責問題，我們就會發現，恰恰在他們公布這項法令的時候，他們的罪愆就暴露出來了，那時他們為了取得政權，決定犧牲他們長年累月以百折不回的

决心加以爭取的民主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則。他們的罪愆也在这种时候暴露出来，那时他們像一八七三年西班牙的巴枯宁分子一样，不顾俄国的落后状态，宣布“立即彻底地解放工人階級”；并且，既然民主制度沒有滿足他們的期望，他們就抱着上述的目的，建立了以“无产階級专政”为名的他們自己的独裁統治。这里就是可以寻找他們的罪愆的地方。从他們开始走上这条道路的时候起，他們便不能不采用恐怖手段。不用暴力而建立一个和平的但又是真正的独裁統治的想法，乃是一种幻想。

恐怖主义的工具是我們已經提到过的革命法庭和非常委员会。二者都开展了同所謂軍事討伐毫不相干的可怕工作，受害的人数不可胜計。遭到非常委员会荼毒的人究有多少，恐怕永远不容易肯定。无论如何，他們的总数一定有好几千人。最低的估計数字是六千；有些人估計要加一倍，另一些人认为要加两倍；而远超过这些数目的，是那些已經被囚禁起来的或者虐待和拷打致死的无数的人們。

为布尔什維主义申辯的人們在辯护时指出，他們的反对者，即芬兰的白卫軍、波罗的海沿岸的貴族、沙皇反革命的陆海軍將領的行为也未必高明。可是，指出別人也在偷窃，难道就能为盜窃的行为辯解嗎？无论如何，假如这些其他的人为了要維持他們的权力而蓄意草菅人命的话，他們并不違反自己的原則；但布尔什維克則多半可以肯定是違反自己的原則的。因为他們这样做便背棄了他們自己所公开宣布的有关人类生命尊嚴的原則，而他們正是利用这种原則才能取得政权并使自己的行动具有理論根据的。我們所有的人事实上都同样反对这些貴族和將軍，难道这不正是因为他們視人命如草芥，把它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嗎？也許有人认为所抱的目的使情况有所不同；认为較高的目的可以使不正当的手段也成为正当的手段，而在单纯追求权力的人的方面，則由于其目的不純，手段也就变成可耻的和不正当的了。但是正当的目的并不能够证明任何的手段都是无可指摘的，而只能肯定那种与目的

相一致的手段。同目的相反的手段并不会由于目的正当而变成正当的手段。如果人們牺牲那种給与生命以内容和意义的东西，他們便很难保卫自己的生命；同样地，如果人們放棄原則，他們便很难談得上保卫自己的原則。良好的意图可能会原諒那些求助于錯誤手段的人們；但是这些手段却始終是不可寬恕的，因为手段越是錯誤，它們可能造成的損害愈大。

可是，甚至布尔什維克的目的也决不是无可反对的。它的当前的企图是要保存它所建立的政权的黷武的官僚机构；但多半可以断定的是，只有反对那种在官僚机构内部所表現出来的贪污腐化現象，他們才能保存那个机构。

在一九一九年四月一日的《真理报》上，杜克尔斯基教授坚决认为布尔什維克党和政府机关应当清洗所有那些与共产主义共命运的、只是为了他們自己的罪恶目的才利用共产主义的坏蛋和野心家。列宁于是答复說：

“写信的人要我們純洁我們的党和我們的政府机关，清除那些‘毫无良心的临时同路人、自私者、野心家、走狗和强盜’。这是正确的要求。我們早已提出并在实行这个要求。……我們現在和今后都会枪毙那些被捕获的强盜、自私者和野心家。但是，为了使清洗工作进行得更彻底更迅速，就需要真誠的非党知識分子在这方面协助我們。”^①

枪毙——这是共产党政府的全部智慧。可是，难道列宁本人不是号召“知識分子”帮他进行斗争来反对坏蛋和野心家嗎？当然他是这样号召的；但他沒有給他們唯一有效的手段、即出版自由。

只有报刊所行使的在各方面不受拘束和妨碍的监督，才能打击那些必然紧抓住任何拥有无限权力而随意自由行动的政府不放的坏蛋和野心家。事实上，这些寄生虫往往是在缺少出版自由的情况下更加猖獗起来的。

^① 《对一位专家的公开信的答复》。《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02頁。——譯者

現今的俄國報刊完全掌握在那些被壞蛋和野心家盤踞的政府機關手里。在目前的情況下，列寧有什麼把握不讓這些壞蛋和野心家設法鑽進革命法庭和非常委員會，從而推波助瀾，使真誠的非黨“知識分子”遭到槍殺呢？擁有至高無上的最專制的權力的，正就是這些被設立起來同貪污腐化現象作鬥爭的非常委員會。它們完全不受任何形式的監督，也就是說，它們大部分是在確實有利於貪污腐化現象的情況下活動的。

一七九三年的革命法庭擁有甚至在那個時候前所未聞的專斷權力。顧全被告權利的保證達到最低限度。然而，那時的法庭還至少是公開發揮作用的，所以人們可以對它的活動實行某種監督。可是蘇維埃共和國的非常委員會卻採取秘密審議的辦法，被告的合法權利是沒有絲毫保障的。被告並非絕對需要受審，更不必說是傳訊他的證人了。只要有人告發，只要有一點嫌疑，就足以使他腦袋搬家。

這個禍害波及的範圍很廣，以致大有非廢除不可之勢。因此當局作出決定，規定這些委員會非經審訊不得再行執行死刑。可是，虐政是獨裁統治的基本要素，如果不同時廢除獨裁，就不可能廢除虐政。因此，這項法令由於規定一個例外，即如遇“明顯反革命陰謀”時得容許就地正法，便自行宣告無效。這樣自然就為各種專斷的處決大開方便之門！然而，即使這項決定能在適當範圍內獲得遵守，它也只會保護盜賊和壞蛋而不會保護真誠的非黨“知識分子”，因為正是由於“知識分子”的出現，政府機關才需要清洗的。這樣的清洗工作如果不是對付反革命，又是对付什麼的呢？稍微有一點不滿的表示，就會像任何壞事那樣受到嚴厲的對待。任何的反措施都不會使這種威脅煙消雲散，因為它所涉及的問題是真誠的共產黨人和壞蛋們同樣發生興趣的。他們在挑剔蘇維埃制度方面攜手合作。因此根本談不到有什麼修正。例如，就在最近，“全俄肅反非常委員會”作了如下的宣告：

“最近爆發的一系列叛亂證明了，克拉斯諾夫以及左翼社會革

命党人和左翼孟什維克分子所获得的荣誉，并没有使他們停止活动。他們一心想要暗中伤害我們的军队（布里安斯克、薩馬拉和斯摩棱斯克），破坏我們的工业（彼得格勒和土拉），并通过铁路罢工来破坏我們的交通运输工具和粮食供应。‘全俄非常委员会’茲宣布：以后将不再区别克拉斯諾夫军队中的白卫軍和属于左翼社会革命党人与孟什維克分子的白卫軍。非常委员会将以同样严厉的手段来惩罚任何一方。我們所逮捕的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分子将被作为人质扣押起来，他們的命运将完全取决于这两派的态度。”——全俄非常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①

因此，由于军队中存在着明显的分崩离析的迹象，由于产业工人和铁道雇員中間日益滋长的不满情緒，非常委员会就要把非布尔什維克的社会主义者的主要人物逮捕起来，以便在发现无产阶级再有絲毫反对的迹象时立即把那些人就地枪决。镇压心怀不满的无产阶级——这就是企图用以使大规模执行枪决这一愚不可及的手段在俄国成为正当手段的崇高目的。它决不可能把經濟的失败变成一种胜利。它只会导致这样的結果，即：俄国的广大群众可能不会像过去全体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理解第二巴黎公社的复灭那样来理解布尔什維主义的复灭；布尔什維主义的复灭毋宁說是会像法国全体人民所理解的一七九四年热月九日罗伯斯比尔的复灭，也就是說，会被看作是救民于水火，而决不是令人深感痛苦和悲哀的失败。

苏維埃共和国的前途

列宁的政府面临着另一个热月九日的危險，但危險也可能以另一种方式产生。历史是不会重演的。一个政府如果抱有在当时条件下无法实现的目标，可能以两种方式垮台。如果它坚持自己

^① 摘自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消息报》，1919年3月1日第59号。

的綱領，它會終於被人推翻，連同那個綱領一起冰消瓦解。但如果它把自己的綱領作相應的修改，最後完全加以放棄，它就可以保全自己。不管發生什麼樣的情況，無論是前者還是後者，就事情的本身來說，都將導致失敗。可是，對於那些有關人士而言，他們把國家政權保留在自己手里，還是要像在敵人的忿怒下被打倒的偶像那樣聽憑別人擺布，乃是有很大的區別的。

羅伯斯比爾在熱月九日垮台了，但並非所有的雅各賓派都遭到他同樣的命運。由於能夠明智地適應環境，他們有很多人飛黃騰達，身居高位。拿破侖本人原先也是屬於恐怖分子一伙的，並且還是羅伯斯比爾的弟弟的一個朋友。他們的姊妹後來說，“波拿巴是一個共和黨人。我甚至還可以說他那時是站在‘山岳派’一邊的。他對我哥哥的讚美，他同我弟弟的友誼，也許還有他對我的不幸遭遇所表示的同情，使我能向執政府領取三千六百法郎的津貼。”^①

可是不僅僅是個人。整個的黨派也能改變自己的性質，從而可以不僅平安無事地、而且威信更高地從一個脆弱的地位上擺脫出來。俄國共產主義試驗的失敗，也並不是不可能同樣改變布爾什維克的性質，保全他們作為執政黨的地位的。他們已經在改變了。作為講究實際的徹底的政治家，布爾什維克在他們統治的過程中已經顯著地表現出他們的適應環境的本領。他們本來是根據平等的普選原則選出的國民議會的热心宣傳者。可是當國民議會對他們有所妨礙時，他們便立刻把它打入冷宮了。他們是死刑的堅決反對者，可是他們却建立了血腥的統治。當以前俄國的国家生活中正在拋棄民主原則時，他們是在無產階級內部實行民主制度的熱心擁護者，但他們現在却正在利用個人的獨裁日益壓制這種民主。他們以前廢除了計件工資制，現在却正在恢復這種制度。在他們執政之初，他們宣布他們的目的是粉碎那個代表舊政府的

^① 羅斯：《拿破侖一世》，1916年版，第一卷，第50頁。

权力手段的官僚机构；但他们却已经建立了一种新的官僚统治来代替旧的。他们曾经依靠瓦解军队的纪律并最后瓦解军队本身的方法取得了政权。他们现在已经建立了一支经过严格训练的新的军队。他们本来力求把各个阶级置于同一水平，相反地，他们却已经一手制造了新的阶级差别。他们已经造成了一个地位低于无产阶级的阶级，而把无产阶级提高到特权阶级的地位；他们又使另一个阶级出现在无产阶级之上，这个阶级领取高薪，享受种种非一般人所能想望的特权。他们本来希望在农村中利用给与最贫苦的农民以政治权利的办法来使有产农民丧失活动能力。现在他们却已经给与这些有产农民以某种程度的选举代表的权利。他们最初无情地剥夺资本，目前却正在准备把半个俄国的矿藏交给美国资本家，以便取得他们的帮助并在各方面同外国资本妥协。法国从军记者吕多维克·挪多最近在《时报》上发表了一篇他同列宁的谈话，后者除抒述了其他的意见以外，还这样地说明了他对资本的友好态度：

“我们很愿意提出：我们一定承认我们的外债并支付利息；由于我们缺乏其他的支付手段，这种付款将采取交付小麦、石油和其他各种原料的形式，一旦我们俄国的工作充分开展起来，这些东西无疑是有大量剩余的。我们也已经决定想根据我们的合同——当然这类合同必须首先得到外交上的批准——给与协约国的公民以开发森林和矿山的权利，这自然要看对方是否承认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基本政治基础的情况而定。我们知道，英国、日本和美国的资本家正在竭力争取这种权利。”

访问录并不是绝对可以凭信的文件，可是我们上文谈起的对于苏维埃共和国的看法，也由研究俄国问题的其他负责的记者所证实。布尔什维克看来对于实际生活具有强烈的现实感；但同时也表明他们已经放弃了自己的共产主义纲领，因为，如果他们准备把俄国的一部分租给外国资本家八十年，那个纲领就要推迟到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以后才能实现。共产主义作为立即解放俄国无产

階級的手段來說，現在已經失敗了。現今有待揭曉的問題是：是否列寧的政府會以一種隱蔽的方式宣布布爾什維克的方法的破產，從而力求維持它的地位；還是一股反革命的勢力將起來推翻這個政府，並用一種十分殘暴的方式來宣布它的破產。我們自己倒是情願看到前一種的局面，即布爾什維主義會再度自覺地把自己建立在馬克思主義進化論的基礎上，相信各個自然發展階段是不能越過的。這將是痛苦最少，同時對於國際無產階級也最有好處。可是，十分不幸，世界歷史的進程並不總是按照我們的意願發展的。布爾什維主義的因襲的罪惡一向在於通過一種政體、即獨裁來扼殺民主，而獨裁如果不代表一個人的或緊密勾結的一小撮人的無限的專制權力，便沒有任何意義。應當像對待戰爭一樣來對待獨裁。德國有些人受到俄國方法的影響，正在玩弄獨裁的計劃，而不去細心深究它必然會產生怎樣的後果；這些人應當牢牢記住上面那句話。如果掌握了國家政權，要開始實行獨裁，就像發動一次戰爭那麼容易。但是一經採取了這種步驟，無論哪一種都很难隨意加以阻止。你必須在兩者之間作出抉擇，不是取得勝利，便是以慘敗收場。俄國現在亟需外國資本，但是，除非它主張召開國民議會和贊成出版自由，蘇維埃共和國是不可能馬上得到外國資本的援助的。這並不是說資本家們都是民主主義的理想家。他們毫不猶豫地拿出幾百萬金來接濟沙皇政府，但他們不大相信現在的革命政府有經營業務的能力。當它不准報刊發表批評意見，並且顯然得不到大部分人的擁護時，他們對它的政體產生了懷疑。蘇維埃政府是否會想法保護出版自由和召開國民議會呢？某些布爾什維克說過，他們既不怕出版自由，也不怕國民議會。那末為什麼他們不扶植它們呢？為什麼他們輕視這樣一種手段，這種手段如果用之得當，必將有助於大大地增加他們的精神力量以及別國人民對他們的信任呢？在前面提到的布哈林所著《共產黨人的綱領》一書的序言中有下列這段話：

“考茨基和他的一伙人想要強加在一次革命上面的條件似乎

是：革命当然有权向资产阶级发号施令，但同时它要保证给与资产阶级以种种便利，不論是通过出版自由还是通过国民议会，来宣扬它的怨言。一个博学多才的专家，如果不理会正义是否在他的一边，而只是盘算他是否能对他正在寻找的某一个人提出谴责，那么他的这种卓越的建議在抽象地加以考虑的时候也許是很可以实行而不致損害革命的。但是革命意味着一場內战，那些必須用大炮和机枪进行战斗的阶级很容易拋棄这种荷馬式的論爭。革命从来不同它的敌人一起討論問題。它消灭他們，反革命也采取同样的行动，双方都完全能够承受这样的指責：它們漠視了德意志帝国議会的規定。”

这种为屠杀作辯护和怎样对待反革命的言論，同作者在前几頁关于革命的见解相比較，就显得格外高不可攀了：

“以推翻资本家阶级为第一步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它結果只会是把资本主义制度变成一个为劳动群众謀福利的制度。这个过程在每一个国家至少要花一代的时间。这个时期正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即无产阶级一方面必須繼續粉碎资本家阶级而另一方面又能自动援助其他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时期”（第 18 頁）。

这就是說，革命和內战具有同样的意义，它等于一場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彼此毫不饶恕，一方总想打倒另一方，即使这还不能收到一劳永逸的效果，因为这个愉快的过程必須“至少繼續一代”。这种用机枪和毒气彈进行的带有严重毁灭性的內战，比从前三十年战争对国家所造成的破坏一定还要惨重；它使人民十成中死去一成，使他們的蛮横心理发展成为最疯狂的殘暴行为，并彻底堵塞一切生产的来源——这种战争事实上就要成为实现社会主义所代表的較高生活方式的道路！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这种卓越的想法，当然不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专家”而只是一个职业革命家的想法；在他看来，暴动和革命是同义詞，如果这种革命采取民主的形式而不是內战的形式，他就确实会丧失他的健康和生命。但有

一件事是肯定正确的。只存在着两种可能——不是民主便是内战。谁要是抛弃民主，谁就必须准备内战，反过来也是这样。他只能避开独裁，因为在独裁制度下，他必须对付那些完全绝望和冷淡的人民，并且独裁制度本来就是缺乏那种可以用来建造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合乎人性的物质基础的。

因为我们只有在民主和内战之间作出抉择，我自己就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社会主义看来不可能建立在民主基础之上，如果大部分人拒绝社会主义，那么实行社会主义的时机就还没有成熟。另一方面，布尔什维主义却论证说，社会主义只有用少数人强迫多数人的办法才能推行，而这一点只有通过独裁和内战才能办到。布尔什维主义自感在人民中间占据少数，这一事实说明了为什么它如此顽固地拒绝民主制度，尽管它相信民主制度不会“损害革命”。如果它认为自己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它就毋需丢弃民主，即使它确实以为动用大炮和机枪的战斗是革命斗争的唯一形式。而且，如果它有一个革命的国民议会作为后盾，这个斗争对于布尔什维主义来说就比较容易进行，正像一七九三年革命的巴黎人所做过的那样。可是这样一个国民议会是不会支持它的。当布尔什维克开始掌握政权的时候，他们处在可以左右工人、士兵和一大部分农民的高峰；然而在那个时候他们也不敢要求实行普选。他们不是解散国民议会并进行新的选举，而是单纯地把它打碎了事。从那以后，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呼声与日俱增。布尔什维主义的信徒对于各种非官方的报刊所表现的越来越胆小害怕的心情，以及把社会主义者的批评排斥于苏维埃范围之外的做法，表明了向恐怖统治的转变。在这种情况下，要推翻独裁制度而逐渐恢复民主制度是不可能的。所有这种努力至今都很快地成了泡影。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布尔什维克准备尽可能地向官僚主义、黠武主义和资本主义让步；而在他们看来，如果向民主制度让步，那就等于自杀。可是事实上却只有这样做才能结束内战，才有可能领导俄国重新走上导向某种较高生活方式的繁荣富强的道路。如果没有民

主，俄国就会四分五裂；可是通过民主，无产阶级也会彻底崩溃。最后的結果是完全可以断定的。它未必一定是另一个热月九日，但我耽心它会和热月九日沒有多大出入。

世界革命的前途

布尔什维克自己对于他們最后的胜利似乎沒有很大信心。然而他們已經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一件事情上面。因为如果俄罗斯不再是革命的选民，那么世界革命就一定是拯救俄罗斯人民的救世主。但是这个世界革命究竟是什么呢？可以从两个截然不同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你可以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思想在全世界的发展，无产阶级力量的加强，以及阶级斗争的格外激烈，因此社会主义将成为一个强大的力量，能够唤起全世界的人民，随着它的发展而影响越来越多的国家的生活。另一方面，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布尔什维克所了解的那种世界革命过程，即一切大国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否则苏维埃共和国就不再能够拯救革命。而且，这将意味着到处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剥夺一切非共产主义分子的权利。这将意味着共产党的专政，从而使全世界普遍燃起内战的火焰，至少在未来的一個世代中不会熄灭。

人們正在进行紧张的宣传来要求达到这样的結果。引起一場像布尔什维克所理解的那种世界革命，决不是他們能够办到的。但是如果他們得心应手，当然也能对西欧发生很大的影响，从而危害到另一种意义下的世界革命。因为照俄国人看来，世界革命宣传者的主要任务是在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群众中間掀起一場自相殘杀的战争。

布尔什维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党派紛爭的产物，并且經過一番同本国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的斗争才取得了政权，因此竭力利用那种变成兄弟鬩牆的内战来在俄国巩固自己的地位；同时，作为取得绝对統治权的最后手段，它还力图分裂至今保持团结一致的其他

一切社会主义政党，只要它們证明并不具有一个布尔什維主义的多数。第三国际的意义就在这里。他們希望用这个手段来实行世界革命。可是，这并不是一时的任性或單純的恶意的結果，而是从布尔什維主义自身的本质中产生的。那种本质同西欧已經为之完成开拓工作的較高的生活方式是水火不相容的。

在西欧，民主不像在俄国那样是明日黄花。它已經經歷了一系列的革命，排除了重重困难而向前发展；它是廢續几百年的斗争的結果。它已經被吸收到群众的血肉中去。因此，要剝夺任何社会的一切政治权利是絕對不可能的。在法国，农民是一股十分小心地照顾自己的私有财产而誰也不敢加以嘲弄的势力。而且，法国、尤其是英国的资产階級是一个慣于进行斗争的階級。俄国的无产階級的力量当然不及西欧的无产階級；但资产階級本身在帝俄时代还格外軟弱得无可比拟。在俄国，正如在其他地方有一个强大的軍事独裁政府当政的国家一样，资产階級一方面害怕国家政权，另一方面又盲目地相信自己可以受到国家政权的保护。于是就出現了今天的自由主义所处的不幸状态。国家政权的垮台，軍事“保护墙”的坍塌，国家的一切权力之落入无产階級手中，所有这些使得一向不慣于从事积极政治斗争的资产階級惊惶失措，終于完全瓦解，拱手把地盘让給它的敌手。

在西欧，由于持續了几百年的階級斗争，下层階級不仅教育了自己，也教育了上层階級。这些上层階級已經逐漸尊重无产階級；并且它們已經掌握了在适当时刻实行让步以应付任何攻击的方法，从而避免事态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在盎格魯—薩克逊族的国家，资产階級长期以来必須不用任何强大的常备軍而过着独立的生活。它在同国家政权和无产階級相处的过程中已經知道怎样来单独依靠自己的力量；因此，它在面临任何危險的时候是不会輕易逃走的。在这次战争中获胜的，正是这些国家。

这次战争沒有使这些国家的軍隊崩潰，像同盟国和俄国那样。在东欧，在軍隊瓦解的时候，始終是士兵代表了反叛的力量，不管

那些士兵原来出生于哪一个阶级。但是这股促成革命的巨大力量，也可以起一种使薄弱的革命因素过早地掌握政权的作用，从而使他们面临一些他们无力解决的问题。战胜的国家里是没有这股力量的。在那里，只有当社会主义在民主制度下变得十分强大，可以压倒其他的政党时，它才会为自己取得国家政权。在这样的一些国家里，它没有丝毫理由要放弃民主；因为正是在这些国家里，无产阶级中最高和最优秀的一层是决不会愿意接受独裁来代替民主的。他们知道，所谓独裁归根到底不过是一个人的独裁。可以肯定，在目前的法国，社会主义者中间同情布尔什维克的人声势很大；但他们之所以奋然而起，只是因为他们完全有理由反对他们本国的资本家的政府去挤垮外国的社会主义政府罢了。

还有许多人以为布尔什维克的方法对俄国是合适的；但他们不打算介绍这些方法，原封不动地在法国搬用。然而，即使在这里，布朗基主义的暴动传统和蒲鲁东主义的反议会制度传统也没有完全根绝。这两股敌对的力量通过它们在工团主义中某种奇怪的溶合，已经获得了新的生命。它们可能会给布尔什维克主义提供某种基础。但是要說它们能够掌握法国的无产阶级、甚或英国和美国的无产阶级，乃是绝对办不到的。当布尔什维克主义在那里面临着大规模的决定性斗争，而这些斗争只有通过紧密的团结和合作才能取得胜利时，它的发展就会以分裂告终。因此，正如我们曾经说过的那样，布尔什维克的关于世界革命的宣傳决不可能促进正在酝酿中的世界革命。它所能做到的，是危害世界革命。

共产主义由于具有多种多样的倾向，已经危及德国的革命。战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德国的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政党。它在一切成员所抱定的共同的、单一的社会方向的基础上团结了起来，等到它把追随教权党的天主教工人争取过来以后，就将得到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如果它占有了多数，争取民主的斗争、即争取普鲁士选举改革的斗争就会变成争取政权的斗争。如果这个斗争获得了胜利，社会民主党就可以立刻在财富方面收获到由它的活动争

取得来的最丰盛的果实；那个财富是德国资本主义增殖和积累起来的，可以用来迅速地改善人民群众的一般生活状况。世界大战把这个财富一扫而空。战后的德国处于万般无奈的境地。不管生产资料归谁掌握，根本不可能为群众创造较好的生活状况了。可是，由于军队的溃败和解体，这次世界大战也已经使得社会民主党依靠政敌的破产而不是依靠它自己的力量出人头地，虽然在这个时候，由于战争所造成的分裂，它本身已经削弱了。如果社会民主党想要变成占统治地位的政党，它就绝对有必要重新统一起来。人们本来可以认为，既然这个社会主义政党内部分裂的根源、即对于战争的态度现在已经消失，目前的要求可以格外迅速地实现了。

可是，十分不幸，由于苏维埃共和国的兴起，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已经在德国社会主义队伍中间打进了一个新的楔子；那个宣传要求我党放弃不可缺少的民主主张，建立工人代表会议的独裁制度作为一种政权形式。为了不致被人误解，布尔什维克不再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了。他们自称为共产党人，其目的显然是想同《共产党宣言》中所规定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形式结合起来。但是他们忘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四七年年底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并在几个月以后出版了《新莱茵报》作为民主主义的机关刊物，在他们的心目中并没有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对立。同革命以前存在的两个社会主义政党以及另一个政党、即共产党人的政党相呼应，德国已经产生了独裁和民主的对立。这种对立引起了那两个政党中任何一个在政治上的变化多端和分裂，并在独立党人中产生了强烈的布尔什维克倾向。而且，它终于在一部分右翼社会主义者中间引起一种反响来反对这些倾向，但是这种反响的火力偏高，没有射中目标，并且造成了倾向资产阶级政党的趋势，而右翼社会主义者由于战争政策的结果，已经和资产阶级政党有很多共同之处。

十一月九日的革命打破了同资产阶级的这种联合，产生了同独立党人的谅解。可惜这只是暂时的。在德国，要想推行一种包

括全部帝国在内的真正的、永久的和有效的独裁形式，同在西欧一样不可能。人民已经大有进步，不会听任建立这种制度。无产阶级的个别党派想要采取独裁的一切企图只会获得暂时的成功。那些企图必然导致一个结果、即加剧帝国的政治和经济的崩溃，并为反革命的军事独裁铺平道路。但是反革命的军事独裁也决不会变成一个永久的和绝对的政权。在德国，要继续实行违反工人利益的统治是不可能的。

诺斯克的警卫队在柏林所表现的极端行动，在慕尼黑爆发的可怕的狂暴，并不足以证明政府的独裁权力。这种行动倒是表明了政府对待那些人的态度是软弱无能的。那些人由政府召来，肯定能够不受任何惩罚地作出可怕的报复行动，但他们本身是沒有能力支配政府的。

无论左派或右派的这种争取独裁的努力，不会导致真正的独裁，而只会导致混乱和彻底的毁灭；当一切生产都将停顿、一切食物商品都将消耗净尽时，它不会给与我們較高的生活方式，而只会使我們产生残忍的心理。甚至在它能够达到这样的地步以前，也可能发生这种情况：所有想要采用独裁制的企图，只会增加用以进行政治和经济斗争的残酷与横暴的程度，以及增加受害者的人数，作为那种努力的一个结果。这种做法将使人们完全不可能从事任何积极的建设。诺斯克的统治和苏维埃的独裁都可以这么說。

目前，有人正在替某种形式的独裁作宣传，說它只会是暂时性的，无论如何不会采用暴力等等。这是一切可能的幻想当中最糟糕的一种。在一个国家，如果所有的阶级都已充分理解到政治生活的重要意义，任何政党只有利用专制手段才能行使独裁。不管他們的見解多么和平，也不管他們只把独裁当作为积极工作取得必要力量的手段的决心多大，不久就会发现，在他們开始统治以后，他們的种种独裁的方法都会被束之高阁，所剩下的不过是虐政而已。

只有民主制度才能提供避免虐政、促成某种平稳的积极建设

的唯一手段。但是在目前，民主制度已經在理論上被社会主义政党的左派所压倒，并在实践上被右派所压倒。国民議會本身决不是一种民主制度；因为如果没有由平等的普选产生的人民代表，任何民主制度都是不可能存在的。現今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使帝国团结一致的唯一制度，不是通过工人代表會議，也不是通过一个独裁的政府，而只有通过一个由帝国各部分的代表組成的国民議會才能产生。現在的組織当然是十分不能令人滿意的，可是誰选举了其中的多数的呢？这是积极的民众，也就是当工人代表會議在一个体系中被建立起来以后要去选举工人代表會議的那些人。独立社会民主党在那組織机构中的选票还不到国民議會总票数的十分之一。工人阶级代表着全国总票数的十分之九。

只要工人代表會議包括各大工业部門的工資收入者，它們的面貌就和国民議會迥然不同。就其本身而言，它們可以对进步的政策起重要的作用，并且对于一切国有化的努力來說也是不可缺少的力量。可是它們仅仅凭这种身分是不能够很好地代替国民議會的。因为，这种工人代表會議的制度越是扩展到大工业的全部領域，它越是把全体的工人群众包括在內，中央委員會在其組織上就愈加近似国民議會，但它沒有給与它的多数以国民議會的多数由于公开宣称自己是全国人民的多数而拥有的那种权力。

有一种說法认为議會制和民主制在本质上都是资产阶级的制度。这种說法最近也出現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三国际代表大会的討論中。沒有一种說法比这更錯誤的了。議會制和民主制的形式按照它們所代表的人們的性质，可以有絕對不同的內容。如果在一个議會里资产阶级分子占多数，那么議會制就会是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如果这些政党不起作用，它們的議會制也将是不起作用的。可是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多数一旦出現在議會里，整个的局势就根本改变了。現在有人說，即使实行最自由的和完全秘密的投票，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的多数也是不可能产生的，因为资本家統治着报刊并收买工人。但是，如果资本家真正能够这样地收买工人，特

別是在目前這樣的革命之後，他們也就同樣可以影響那些有權選舉工人代表會議的人了。另一種說法是：即使實行徹底的秘密投票，即使在群眾中獲得多數工資收入者的支持，由於資本家能夠對無產階級運用財政權力，社會主義者也不可能在任何議會中獲得多數。這種說法等於是把無產階級看作一幫軟弱而膽小的無知之徒，並宣告無產階級事業的破產。因為，如果無產階級具有這種可憐的不健康的素質，那麼，無論世界上有任何制度可以不理無產階級在精神和智力上的無能而被煞費心機地用來保證勝利，它對無產階級也是毫無助益的。

如果今天德國的國民議會具有明確的資產階級的性質，這在很大程度上應當歸咎於布爾什維克的宣傳。它已經在工人階級和獨立黨人中間造成對於國民議會的某種不信任，並且在選舉當中還損害了獨立黨人的利益。其他的工人階級成員、即正要同資產階級集團決裂的天主教徒也因而遭到削弱，聽憑資產階級的領導。

完全可以肯定，德國在目前的國民議會的領導下是決不可能恢復元氣的。如果反對現有的國民議會的鬥爭變成反對民主、反對普選、反對國民議會本身的組織的鬥爭，那就非但不會促進、反而只會阻礙德國的恢復過程。因為這樣就會造成一座障壁，使人們不能把鬥爭集中到可以進行改革、即選舉國民議會這一點上，而在新的國民議會中，無產階級的代表將組成多數，準備在可能範圍內盡量努力從事全國的國有化的工作。他們一定也會毫不猶豫地決定實行現在還不過剛剛開端的德國的民主化的工作。必須成為任何可能當政的純社會主義政府的綱領的，正是這種議會政治而不是獨裁政治。這樣，它也就能夠獲得天主教工人、甚至一切資產階級派系的擁戴，如果他們能從這個綱領中看到有辦法使共和國避免一場由於互爭雄長的政黨的獨裁傾向而已經發生的內戰的話。假如共產黨人說，民主制度只不過是資產階級的統治方法，那麼我們的答复是：民主的代替物、即獨裁本身只會導致一場革命，導致過去時代所特有的暴力方法。民主及其平等的普選制度並不

代表資產階級的統治；因為資產階級在它的革命時期所推行的，只是傳入法國、英國、比利時和其他國家的以人口調查為依據的選舉權，而不是平等的選舉權。經過了長期的艱苦鬥爭，無產階級才能獲得平等的普選權——這是一個非常著名的事實，可是所有的共產黨人和他們的朋友們似乎已經把它忘得一干二淨了。民主及其平等的普選制是把階級鬥爭從交手仗變為運用理智的戰鬥的方法，在這種戰鬥中，一個階級只有和它的對手處於同樣的知識和道德的水平上，才能取得勝利。民主制度是賴以實現較高生活方式的唯一方法，也是社會主義所說的文明人的權利。獨裁制度只會導致一向被稱為亞洲式的社會主義的形式；可是這個稱謂並不公道，因為亞洲誕生了孔子和佛陀。稱之為鞭撻式的社會主義，或許更確切一些。

德國工人階級沒有從他們自己的勝利中得到什麼收穫，沒有懂得怎樣利用民主制度作為解放自己的適當的工具，其所以如此，世界大戰的可怕後果自然負有較大的責任，但除此以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共產黨人的顛覆和破壞活動，是由於他們用無益的冒險行動浪費了無產階級的實力。

民主制度為西歐和美國的社會主義提供遠為美好的前景。這些地區、特別是盎格魯—薩克遜族國家，戰後在經濟上不像其他地區那樣虛弱。無產階級的每一種進步的形式和每一次權力的獲得，必然會直接帶來生活狀況的改善。

但與此同時，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世界的鬥爭也一定會採取比戰前更加強烈的形式。

戰爭和戰後的勝利所引起的愛國熱情橫溢的時期正在很快地成為過去。變化已經開始，等到和約簽訂以後還將以越來越高的速度繼續下去。因為，不論和約給戰敗國增加了多少沉重的負擔，既然現在到處的注意力都將從對外問題轉到國內政策的問題，戰勝國的人民所蒙受的犧牲也是會同樣被感覺到的。

在這種場合，無產階級的對抗經常會隨著覺悟程度的提高而

帶有越來越堅強的形式。德國的、尤其是俄國的革命在這方面起了誘發的作用。不管你對於布爾什維克的方法抱有何種看法，一個大國的無產階級政府已經不但掌握政權而且還能在可以設想的最困難的條件下維持了將近兩年，這一事實自然滋長了各國無產階級中間的權力感。因此，對於世界革命來說，布爾什維克在這方面比他們通過特派人員和宣傳人員作出了大得多的工作，因為那些人員應該負責的，是對於無產階級事業的損害而不是革命的成就。

全世界的無產階級現在已經被發動起來了，它的國際壓力很大，足以使得將來一切的經濟進步沿着社會主義的而不再是資本主義的路綫發展。

因此，在這方面，世界大戰已使這個時代具有重大意義，因為它意味着資本主義發展的終結和社會主義發展的開端。顯然，我們不可能從資本主義世界一步跳進社會主義世界。社會主義不是一架可以按照預先畫好的圖樣裝配起來的、一經開動就能正常運轉的機器。相反地，它實際上是一個社會合作的过程，正如其他任何形式的社會活動一樣，有它自己的特殊規律；但是，那個过程在這些規律的範圍內可以採取多種多樣的形態，並且也能比較充分地發展起來，其結果是我們在目前無法逆料的。

我們現在沒有“可以根據民眾的決定來實行的現成的烏托邦”。現今所發生的事情是那些標明社會主義發展的開端的力量之解放。如果我們因為這件事情正在全世界發生而願意稱之為世界革命，那麼我們肯定是面臨着一場世界革命。它的進程不會按照獨裁的路綫，也不會利用大炮和機槍，也不會通過消滅自己的政治和社會的敵人，而只會通過民主制度和人道主義。只有這樣，我們才有希望實現那些有待無產階級努力完成的較高的生活方式。

譯名对照表

三 画

万多姆广场 Place Vendôme
凡尔赛 Versailles

四 画

巴枯宁 Bakunin
巴斯特利卡 Bastelica
巴士底 Bastille
巴茨 Batz
孔博尔 Combault
丹东 Danton
丹东派 Dantonists, the
日拉丹 Gerardin
文希-馬列叶夫, 納特 Wintsch-Male-
jeff, Nath

五 画

布朗基派 Blanquistes, the
布里安斯克 Briansk
布列塔尼人 Bretons, the
布列塔尼 Brittany
布里安茨 Briantz
布倫斯威克 Brunswick
加斯科尼人 Gascoigners, the
加茨契納 Gatschina
加弗隆斯基 Gavronsky
卡麦利納 Camelinat
卡諾 Carnot
皮奧扎, 高尔蒂埃·德 Biauzat, Gaultier
de
皮阿 Pyat

圣馬尔, 德 St. Mart. de
圣西門 St. Simon
瓦揚 Vaillant
瓦尔兰 Varlin
艾庇戈尼 Epigone
弗兰克尔 Frankel
兰多瓦, 古斯塔夫 Landauer, Gustav
卢梭 Rousseau
台里薩, 馬丽亞 Theresa, Maria

六 画

亚尔薩斯 Alsace
亚尔薩西亚人 Alsatians, the
达米昂 Damiens
达尔布阿 Darboy
米奧 Miot
米拉波 Mirabeau
托馬, 克列芒 Thomas, Clément
托倫 Tolain
托洛茨基 Trotsky
列康特 Lecomte
列日尔 Regère
吉倫特派 Girondists, the
伏尔泰 Voltaire
华斯貝恩 Washburn

七 画

阿伯尔派 Hebertistes, the
阿貝尔 Appert
阿夫里亚尔 Avrial
阿尔努, 阿杜尔 Arnould, Arthur
阿克雪里罗得 Axelrod

克雷芒, 維克多 Clément, Victor
克洛茨, 阿納尔夏西斯 Cloots, Anar-
chasis

克倫斯基 Kerensky
克拉斯諾夫 Krassnoff
克魯泡特金 Kropotkin
杜布勒伊, 路易 Dubreuilh, Louis
杜瓦尔 Duval
杜克尔斯基 Dukelski
杜邦 Dupont
杜伊勒里 Tuileries
貝雷 Beslay
肖戴 Chaudey
狄德罗 Diderot
劳塞 Lauser
利沙加勒 Lissagaray
呂叶 Lullier
麦茨 Metz
門德尔松 Mendlessohn
里果, 拉烏尔 Rigault, Raoul

八 画

拉加尔德 Lagarde
拉法格 Lafargue
拉姆巴尔, 德 Lamballe, de
拉斯普, 魯道尔夫 Raspe, Rudolph
拉索尔斯 Lasource
拉薩尔 Lassalle
拉凡德 La Vendee
拉辛, 斯青卡 Razin, Stenka
法蘭德斯人 Flemings, the
法夫尔, 茹尔 Favres, Jules
波尔多 Bordeaux
波尔根, 佐治 Bourgin, Georges
波納 Börne
波契洛夫 Poutilof
彼得堡 Petersburg
彼拉多 Pilate
罗伯斯比尔 Robespierre
罗斯 Rose
罗斯巴赫 Rossbach
朋让 Bonjean
欣东 Genton

若累斯, 让 Jaurès, Jean

九 画

洛桑 Laussane
洛姆布罗索 Lombroso
洛林 Lorraine
洛特 Lot
科尔台, 夏洛特 Corday, Charlotte
科萨特, 路德維希 Kossuth, Ludwig
科斯塔, 沙利·达 Costa, Charles da
香丽榭 Champs Elyseés
查理一世 Charles I
勃朗, 路易 Blanc, Louis
茹尔德 Jourdes
祖里克 Zurich
挪多, 呂多維克 Naudeau, Ludovic

十 画

馬隆 Malon
馬拉 Marat
馬拉斯特 Marrast
馬尔菲尔德 Marsfeld
馬尔蒂尼埃, 里科·德·拉 Martinière,
Riccaut de la
馬扎斯 Mazas
夏尔东 Chardon
夏蒂昂 Chatillon
夏洛騰堡 Charlottenburg
特里东 Tridon
特罗居 Trocus
庫格曼 Kugelmann
庫莫夫 Kumow
俾斯麦 Bismarck
爱德 Eudes
格瓦 Gois
热克尔 Jecker
索姆布魯伊, 德 Sombreuille, de
泰斯 Theiss

十一 画

閔肖森 Munchausen
菲加斯 Figeac
菲奧 Fiaux

菲力普四世 Philip IV
菲利普逊 Phillipson
盖拉德 Gerard
盖德 Guesde
海涅 Heine
梯也尔 Thiers

十二画

普罗托 Protot
普托 Puteaux
普列汉诺夫 Plechanoff
费烈 Ferré
傅立叶 Fourier
雅各宾派 Jacobins, the
梅尼蒙坦 Ménilmontant
涅克尔 Necker
斯摩棱斯克 Smolensk

十三画

路易十四 Louis XIV
路易十六 Louis XVI
路易-菲利浦 Louis-Philippe
蒙马特尔 Montmartre
蒙瓦拉里昂 Mont Valerien
奥尔良派 Orleanists, the

福隆台党 Frondes, the
蒲鲁东 Proudhon
塞纳河 Seine, the

十四画

维努亚 Vinoy

十五画

德盖里 Deguerry
德勒克吕兹 Delescluse
诺曼底 Normandy
诺斯克 Noske
摩尔齐洛夫卡 Murzilovka

十六画

萨马拉 Samara
萨列叶夫, 格雷戈里 Sareiff, Gregory
萨比亚 Supia

十七画

赛拉叶 Serailier

十八画

魏马 Weimar
魏特林 Weitling

K. Kautsky

TERRORISM AND COMMUNISM

A Contribution to the Natural History of Revolution

Translated by W. H. Kerridge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 London, 1920

根据伦敦乔治·艾倫和恩文公司一九二〇年版轉譯。原著以德文出版。原著名称是 *Terrorismus und Kommunismus*。柏林 Verlag Neues Vaterland 1919 年出版。

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

〔德〕卡尔·考茨基著

馬清槐譯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1963年6月第1版

1964年1月北京第2次印刷

統一書號 3002·102 定價(七) 0.80 元

印數 2,001—3,000

内部发行■

统一书号：3002·102

定 价：0.80 元